



毛泽东全集

张迪杰 主编 第15卷



润东出版社



MAO ZE DONG QUAN JI

毛泽东全集

主任：流星
策划：树旺
编审：黄惠丽

主编：张迪杰
副主编：宋道 刘鸿玺 闫凤起
 陆 苹 杨健桢 听 伊
责任编辑：范磊峰 张 颖 杨 泽
编 辑：李长富 张瑜原 胡禹颐
 孟宪纲 张清斌 马豪帅
 王中阳 李美艳 赵道洽

编辑委员会

版式设计：杨健桢

装帧设计：听 伊

排 版：庞丽娟 郑俊艳

校 对：《毛泽东全集》校对组

调 图：李宏艺 李向阳

文字供稿：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图片资料：毛泽东著作博物馆

凡 例

张迪杰同志主编的《毛泽东全集》52卷，是他付出36年心血在世界上130多个国家收藏毛泽东著作10.2万册、1.5万种版本的汇集精选，是他被授予“毛著收藏吉尼斯世界之最”“中国毛著收藏第一人”等荣誉的集中体现，也是他与编委会同志潜心编纂20余年完成本书，填补党和国家文献空白，在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矗立的一座崭新的丰碑。本书内容全面系统，真实可信。收录了毛泽东自1901年至1976年的著作和反映他一生的照片、绘画等。其中，有30%的内容被大多数人熟知，有50%的内容仅在小范围公开，有20%的内容为首次发表。特别是张迪杰同志千辛万苦收藏的被专家学者称为“珍品、极品、罕品、孤品”的国宝文物，这次也编入本书，使本书的适用价值、研究价值和珍藏价值等巨幅攀升。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的题词：“雄文瑰宝，永放光芒。”

一、本书中毛泽东著作的收录标准：1. 凡是由毛泽东签名的，包括毛泽东本人签名和与其他人一起签名的，全部收录。2. 没有毛泽东签名的，有根据可以确定是毛泽东著作的，全部收录。3. 毛泽东相关的谈话、宣言、法令、电报、通讯、消息、评论、修改稿等，全部收录。4. 未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作，有其全文及摘要的，全部收录。

二、在收录过程中，广泛收集了每篇著作的各种版本，经考证

选择，以其中最好的作为底本。其原则为：1. 发表时间较早，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版本优先。2. 最全面的版本优先。3. 最早的版本优先。

三、本书按时间顺序编排，分卷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原则上根据执笔、演讲的时间排列，不能确定执笔时间的，根据其发表日期。个别文章，无具体时间的，按其月份、年份放在当月、当年的最后；未能考证出时间的，放在全集的最后。照片全部按照时间顺序及所反映的内容排入相关的著作中；无具体时间的照片按其所表现的内容，排在相应的著作之后；无相关著作的照片，作为“资料图片”放在相应时间的文章之后。手迹包括诗词、题词、书信、文稿等，排到相应的著作之后，并注明名称。绘画类包括油画、中国画、宣传画等，都按照其所表现的内容和照片编辑在一起。

四、编排过程中，对已公开发表的权威版本和有毛泽东手稿的，均保持版本的原貌。讲话、谈话的记录稿，只作技术性的整理。某些主题相同的谈话、电报、书信，作了适当的编排，按照首篇的时间排序。

五、批注、谈话、修改稿中，毛泽东的内容采用宋体排印，其他内容采用楷体排印；诗歌、联句采用楷体排印。

六、编入本书的著作标题，一般按照原稿刊印；凡原件无标题或标题不确切的，重新拟定、修改，并加以说明；标题旁加*的表示根据编者的推测而收录。

七、对于某些著作的时间与作者以及文内的个别词句，作了初步考证，并作了注释。原稿中有标点的，一般照原样排印，只对明显有误的加以订正。无标点或标点不全的，由编者加了标点并加注释说明。同时，为了便于阅读，对著作中的一些文件、地名、人名

等作了注释。各种注释详略不一，根据排版需要排于当页下部或文后。

八、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对原版本中的错字、漏字、模糊字、衍字等，尽可能根据权威资料加以更改和补充。更改方法：〈〉表示改误；〔〕表示补漏；□表示模糊字；『』表示去衍。另外，出版时不便于公开的人名和数字等用□代替。

九、本书使用中国统一制定的简化字排印，个别未明文废弃的异体字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通用的字，均按原件排印。

目 录

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题词·····	1
(1940年4月)	
为马进题词·····	3
(1940年春)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	5
(1940年5月4日)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	7
(1940年5月4日)	
致刘少奇电·····	13
(1940年5月4日)	
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	14
(1940年5月5日)	
对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发展中原根据地的指示·····	17
(1940年5月5日)	
致刘少奇电·····	19
(1940年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20
(1940年5月22日)	
对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及扩大整训武装的指示·····	21
(1940年5月23日)	

我们要争取中间派	23
(1940年5月29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24
(1940年5月30日)	
对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	25
(1940年6月1日)	
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	27
(1940年6月1日)	
和陈嘉庚的谈话	28
(1940年6月1日)	
同意中原局的建议	29
(1940年6月5日)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30
(1940年6月10日)	
致王震电	31
(1940年6月11日)	
争取东北军工作是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	32
(1940年6月13日)	
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	33
(1940年6月21日)	
关于部队合编问题给八路军总部的信	34
(1940年6月27日)	
为叶志强题词	35
(1940年7月1日)	
团结到底	37
(1940年7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40
(1940年7月7日)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45
(1940年7月7日)	
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	53
(1940年7月12日)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	55
(1940年7月13日)	
改编反正军的方针问题	62
(1940年7月16日)	
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	63
(1940年7月20日)	
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	64
(1940年7月20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	65
(1940年7月30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	66
(1940年7月)	
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题词	67
(1940年7月)	
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题词	69
(1940年7月)	
为《大众习作》题名	71
(1940年8月1日)	
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	72
(1940年8月1日)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73
(1940年8月13日)	
为追悼张自忠大会题词	76
(1940年8月15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8
(1940年8月1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79
(1940年8月18日)	
致贺龙、关向应电	80
(1940年8月19日)	
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	81
(1940年8月28日)	
为陇东中学题名	83
(1940年9月)	
集中全力整训部队	84
(1940年9月2日)	
关于目前时局致周恩来电	85
(1940年9月5日)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的信	86
(1940年9月5日)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90
(1940年9月6日)	
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	92
(1940年9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3
(1940年9月11日)	

复叶挺、项英电	94
(1940年9月11日)	
为《抗战日报》题写报头	95
(1940年9月18日)	
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电	97
(1940年9月19日)	
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致叶挺等电	98
(1940年9月22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99
(1940年9月25日)	
致刘少奇电	100
(1940年9月30日)	
挽徐谦先生联	101
(1940年9月)	
为延安清真寺题名	102
(1940年9月)	
致周恩来电	103
(1940年10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104
(1940年10月5日)	
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	105
(1940年10月8日)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	106
(1940年10月9日)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	107
(1940年10月11日)	

关于留用俘虏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给陈毅等的指示·····	108
(1940年10月12日)	
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109
(1940年10月12日)	
致叶挺、项英等电·····	111
(1940年10月13日)	
致陈毅电·····	112
(1940年10月14日)	
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	113
(1940年10月14日)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114
(1940年10月14日)	
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16
(1940年10月14日)	
致陈毅、刘少奇等电·····	117
(1940年10月15日)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118
(1940年10月18日)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	120
(1940年10月18日)	
致北方局等电·····	121
(1940年10月18日)	
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	122
(1940年10月18日)	
致刘少奇电·····	123
(1940年10月20日)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	124
(1940年10月23日)	
致陈毅、粟裕电·····	125
(1940年10月24日)	
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	126
(1940年10月25日)	
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电·····	129
(1940年10月25日)	
为《新文字报》题词·····	130
(1940年11月1日)	
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	131
(1940年11月1日)	
致周恩来电·····	134
(1940年11月1日)	
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	135
(1940年11月1日)	
致叶挺、项英电·····	136
(1940年11月1日)	
致项英电·····	137
(1940年11月1日)	
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	138
(1940年11月1日)	
致项英电·····	139
(1940年11月1日)	
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电·····	140
(1940年11月2日)	

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	142
(1940年11月3日)	
关于反对蒋介石投降致李克农等电·····	145
(1940年11月3日)	
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	146
(1940年11月3日)	
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致叶挺、项英电·····	148
(1940年11月3日)	
复周恩来电·····	149
(1940年11月3日)	
致刘少奇电·····	150
(1940年11月3日)	
复周恩来电·····	151
(1940年11月3日)	
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	152
(1940年11月4日)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153
(1940年11月4日)	
致周恩来电·····	157
(1940年11月5日)	
关于复何白电内容要点致周恩来电·····	158
(1940年11月6日)	
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60
(1940年11月6日)	
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	161
(1940年11月6日)	

军政委员会条例（草案）·····	162
（1940年11月7日）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64
（1940年11月7日）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168
（1940年11月9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电·····	174
（1940年11月9日）	
关于在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停止汤、覃两军东进问题致叶挺、项英电···	176
（1940年11月10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77
（1940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	178
（1940年11月12日）	
致周恩来等电·····	179
（1940年11月12日）	
致刘少奇等电·····	180
（1940年11月13日）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工作部署致彭德怀电·····	181
（1940年11月13日）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82
（1940年11月13日）	
目前只能做自卫的防御战·····	183
（1940年11月13日）	
复周恩来电·····	184
（1940年11月14日）	

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	185
(1940年11月15日)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187
(1940年11月16日)	
对黄埔系军人进行统战工作意义重大·····	189
(1940年11月16日)	
致彭德怀电·····	190
(1940年11月16日)	
关于巩固两李反正部队建立外围军致陈毅、刘少奇电·····	191
(1940年11月16日)	
致陈毅电·····	193
(1940年11月17日)	
批转陈毅关于统战工作报告的指示·····	194
(1940年11月18日)	
对苏北的作战部署·····	195
(1940年11月19日)	
致董必武电·····	197
(1940年11月19日)	
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	198
(1940年11月21日)	
认真准备北移·····	200
(1940年11月21日)	
致冯白驹电·····	201
(1940年11月23日)	
致萧克电·····	202
(1940年11月24日)	

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203
(1940年11月24日)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	204
(1940年11月24日)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	205
(1940年11月25日)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	206
(1940年11月27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07
(1940年11月27日)	
致王世英电·····	208
(1940年11月28日)	
致董必武电·····	209
(1940年11月28日)	
复叶挺、项英电·····	210
(1940年11月29日)	
致董必武等电·····	211
(1940年11月29日)	
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之方针·····	212
(1940年11月30日)	
给周文的信·····	215
(1940年11月30日)	
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致叶挺、项英电·····	216
(1940年11月30日)	
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	217
(1940年11月30日)	

给萧向荣的信·····	218
(1940年11月)	
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谈判条件·····	220
(1940年12月1日)	
在边区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22
(1940年12月3日)	
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致项英电·····	223
(1940年12月3日)	
致刘少奇等电·····	224
(1940年12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25
(1940年12月4日)	
致周恩来电·····	228
(1940年12月5日)	
致周恩来等电·····	229
(1940年12月6日)	
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	230
(1940年12月6日)	
致彭德怀等电·····	231
(1940年12月10日)	
致聂荣臻等电·····	232
(1940年1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33
(1940年12月13日)	
致周恩来等电·····	234
(1940年12月13日)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235
(1940年12月13日)	
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	237
(1940年12月14日)	
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	238
(1940年12月15日)	
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	239
(1940年12月16日)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曾山暂勿离开军队·····	240
(1940年12月18日)	
致叶挺、项英电·····	241
(1940年12月18日)	
致彭德怀等电·····	242
(1940年12月19日)	
致彭德怀等电·····	243
(1940年12月19日)	
叶挺应迅速过江·····	244
(1940年12月20日)	
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	245
(1940年12月20日)	
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	246
(1940年12月23日)	
复周恩来电·····	248
(1940年12月2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49
(1940年12月25日)	

组织机动突击兵团应付华中紧急局面·····	250
(1940年12月25日)	
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	252
(1940年12月25日)	
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	254
(1940年12月25日)	
论政策·····	255
(1940年12月25日)	
要有决心有办法达到北移之目的·····	263
(1940年12月26日)	
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	265
(1940年12月26日)	
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	266
(1940年12月27日)	
致李宗仁等电·····	267
(1940年12月27日)	
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	268
(1940年12月29日)	
关于缓复刘为章电等问题致周恩来电·····	269
(1940年12月30日)	
江南部队分批走苏南为好·····	270
(1940年12月3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271
(1940年12月30日)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272
(1940年12月31日)	

和程悦长的谈话·····	275
(1940年)	
为魏一斋大夫题词·····	276
(1940年)	
为金德崇题词·····	281
(1941年1月1日)	
叶挺宜于两周内渡过江北·····	282
(1941年1月2日)	
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	283
(1941年1月3日)	
新四军不宜在茂林久留·····	284
(1941年1月7日)	
致刘少奇、陈毅电·····	285
(1941年1月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286
(1941年1月7日)	
致刘少奇电·····	287
(1941年1月9日)	
致彭雪枫等电·····	288
(1941年1月10日)	
和巴苏华的谈话·····	289
(1941年1月上旬)	
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	290
(1941年1月11日)	
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	291
(1941年1月11日)	

- 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292
(1941年1月11日)
- 皖南部队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293
(1941年1月12日)
- 新四军由叶挺负责·····294
(1941年1月12日)
- 给英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295
(1941年1月12日)
- 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296
(1941年1月13日)
-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297
(1941年1月13日)
- 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298
(1941年1月13日)
- 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299
(1941年1月13日)
- 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300
(1941年1月13日)
- 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301
(1941年1月13日)
- 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皖南新四军情况·····303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304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305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给周恩来等的通报·····306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07
(1941年1月14日)
- 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308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的指示·····310
(1941年1月14日)
- 关于皖南事变的讲话·····311
(1941年1月15日)
-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312
(1941年1月15日)
- 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通报·····315
(1941年1月15日)
- 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316
(1941年1月15日)
- 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317
(1941年1月17日)
- 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318
(1941年1月18日)
-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319
(1941年1月18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讲话·····323
(1941年1月18日)
- 致周恩来电·····324
(1941年1月18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	325
(1941年1月18日)	
致徐海东电·····	326
(1941年1月18日)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	327
(1941年1月19日)	
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的指示·····	330
(1941年1月19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31
(1941年1月20日)	
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	332
(1941年1月20日)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	333
(1941年1月20日)	
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	340
(1941年1月23日)	
对《解放日报》一篇社论的批示·····	341
(1941年1月23日)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342
(1941年1月25日)	
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	344
(1941年1月25日)	
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	346
(1941年1月27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348
(1941年1月28日)	

致廖承志电·····	350
(1941年1月28日)	
给萧三的信·····	351
(1941年1月29日)	
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	352
(1941年1月30日)	
对《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的说明·····	354
(1941年1月30日)	
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	355
(1941年1月30日)	
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电·····	356
(1941年1月30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357
(1941年1月31日)	
为严正岗题词·····	361
(1941年1月)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	363
(1941年2月1日)	
复彭德怀电·····	367
(1941年2月1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368
(1941年2月2日)	
致周恩来电·····	369
(1941年2月2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	370
(1941年2月2日)	

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	371
(1941年2月2日)	
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	376
(1941年2月2日)	
致廖承志电·····	378
(1941年2月5日)	
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	379
(1941年2月7日)	
对日军进攻形势和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	380
(1941年2月7日)	
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	383
(1941年2月7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387
(1941年2月7日)	
前定会议决定缓开·····	389
(1941年2月10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390
(1941年2月11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	391
(1941年2月12日)	
致刘少奇电·····	392
(1941年2月12日)	
致彭雪枫电·····	393
(1941年2月13日)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394
(1941年2月14日)	

复周恩来电·····	397
(1941年2月14日)	
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398
(1941年2月15日)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	399
(1941年2月17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401
(1941年2月17日)	
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	402
(1941年2月18日)	
致彭德怀、罗瑞卿电·····	403
(1941年2月20日)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	405
(1941年2月20日)	
致周恩来电·····	406
(1941年2月21日)	
请张冲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意见·····	407
(1941年2月22日)	
复周恩来电·····	408
(1941年2月2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09
(1941年2月23日)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410
(1941年2月23日)	
致周恩来电·····	411
(1941年2月24日)	

-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412
(1941年2月25日)
- 为《中国文艺》题名·····413
(1941年2月25日)
-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414
(1941年2月26日)
- 复周恩来电·····415
(1941年2月26日)
- 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416
(1941年2月27日)
- 复周恩来电·····417
(1941年2月28日)
-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418
(1941年2月28日)
-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419
(1941年2月)
- 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几位青年题词·····420
(1941年2月)
-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422
(1941年3月1日)
- 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423
(1941年3月1日)
-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电·····424
(1941年3月2日)
-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电·····425
(1941年3月4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	426
(1941年3月4日)	
致廖承志电·····	427
(1941年3月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428
(1941年3月5日)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	430
(1941年3月8日)	
抗议美国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	432
(1941年3月10日)	
致福斯特贺电·····	433
(1941年3月10日)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434
(1941年3月12日)	
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	436
(1941年3月12日)	
对重庆参政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437
(1941年3月12日)	
给司徒美堂等的信·····	438
(1941年3月14日)	
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	440
(1941年3月15日)	
复周恩来电·····	441
(1941年3月15日)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给周恩来的通报·····	442
(1941年3月17日)	

-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443
(1941年3月18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46
(1941年3月19日)
-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447
(1941年3月19日)
-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电·····448
(1941年3月21日)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449
(1941年3月26日)
-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450
(1941年3月、4月)
-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457
(1941年3月)
- 给董必武的信·····458
(1941年3月)
- 读西洛克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459
(1941年3月至9月)
- 致周恩来电·····498
(1941年4月1日)
- 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题词·····499
(1941年4月4日)
- 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501
(1941年4月5日)

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及蒋介石演词发表意见·····	503
(1941年4月5日)	
致周恩来电·····	505
(1941年4月8日)	
致周恩来电·····	506
(1941年4月9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507
(1941年4月9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508
(1941年4月10日)	
致周恩来电·····	509
(1941年4月10日)	
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	510
(1941年4月11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511
(1941年4月12日)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	512
(1941年4月13日)	
致周恩来电·····	513
(1941年4月14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514
(1941年4月16日)	



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 第一期毕业生题词

(1940年4月)

制药疗伤，不怕封锁，是战胜敌人的条件之一。

毛泽东

製良藥療傷。必指
封鎖。是戰勝
敵人的條件
之一。
毛澤東

毛泽东为八路军制药厂制药训练班第一期毕业生的题词。

为马进题词^[1]

(1940年春)

正确的方向，艰苦的作风，胜利是我们的。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给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员马进（后曾任山东省工业厅副厅长）的题词。

正確的方向
與艰苦
的斗争
勝利
是我們
的
馬進全
毛澤東

毛泽东为马进的题词。

为“五四”青年节题词

(1940年5月4日)

目前中国青年的唯一任务就是打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泽东

司刻制中國青年
的唯一任務就
是打勝日本帝
國主義
毛澤東

毛泽东为“五四”青年节的题词。

放手发展抗日力量， 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

(1940年5月4日)

(一)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2]，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中共中央东南局的指示。在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这个指示的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的思想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没有坚决实行中央的方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对国民党的反动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因而缺乏对付这个反动进攻的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中央这个指示到达后，中共中央东南局委员、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立即执行了；项英却仍然不愿执行。他对于国民党的可能的反动进攻，仍然不作准备，以致在1941年1月间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在皖南的新四军9000余人遭受覆灭性的损失，项英亦被反动分子所杀。

[2] 华南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当时广东省几支抗日游击队的总称。后来发展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韩江纵队、粤中人民抗日解放军、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

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1]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中央前要你们在今年一年内，在江浙两省敌后地区扩大抗日武装至十万人枪和迅速建立政权等项，不知你们具体布置如何？过去已经失去了时机，若再失去今年的时机，将来就会更困难了。

（二）在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坚决地执行其防共、限共、反共政策，并以此为投降日本的准备的时候，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因此，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也就是目前每一具体斗争的防御性、局部性和暂时性。对于反共顽固派的一切反动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我们应提出针锋相对的办法和他们作坚决的斗

[1] 顾祝同，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辖区包括浙江、福建、苏南、皖南、赣东。冷欣，当时任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辖区包括苏北、皖北以及鲁南的小块地方。

争。例如,他们要四、五支队^[1]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2]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例如,张云逸对李品仙,李先念对李宗仁^[3],均是下级向上级提出强硬的抗议,就是好例。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

[1] 四、五支队,即新四军第四、第五两个支队,是张云逸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主力。当时他们正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淮南铁路以东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

[2] 叶、张两部,这里指叶飞率领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和张道庸(即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当时他们在江苏中部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

[3] 1940年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均属桂系),派军队向在安徽、湖北抗日的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当时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都曾经强硬地抗议他们破坏抗日的行为,并且在军事上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

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1]。

（三）在估计目前时局的时候，应懂得，一方面，投降危险是大大地加重了；另一方面，则仍未丧失克服这种危险的可能性。目前的军事冲突是局部性的，还不是全国性的。是彼方^[2]的战略侦察行动，还不是立即大举“剿共”的行动；是彼方准备投降的步骤，还不是马上投降的步骤。我们的任务，是坚持地猛力地执行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三项唯一正确的方针，用以达到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如果对时局的估计和任务的提出发生过左过右的意见，而不加以说明和克服，那也是绝大的危险。

（四）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向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彭雪枫支队在淮北的坚决斗争，叶飞在江北的发展，以及八路军二万余人南下淮北、皖东和苏北^[3]，均不但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而且是使顾祝同不敢轻易地在皖南、苏南向你们进攻的必要步骤。即是说，

[1] 指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

[2] 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

[3] 1940年3月，中共中央为增援新四军在淮北、皖东和苏北的抗日斗争，打退国民党军队向新四军的进攻，命令八路军调遣部队南下。同年夏，南下部队2万余人到达豫皖苏边区，与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和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等会合，先后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开辟了苏北淮海抗日根据地。

江北愈胜利、愈发展，则顾祝同在江南愈不敢轻动，你们在皖南、苏南的文章就愈好做。同样，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五）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在全国的方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在敌后建立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央关于政权问题的决定，你们应该坚决执行。

（六）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则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其与顽固派斗争的策略，是在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利用国民党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在党员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时，即加入之；对于地方保甲团体、教育团体、经济团体、军事团体，应广泛地打入之；在中央军和杂牌军^[1]中，应该广泛地展开统一战线的工作，即交朋友的工作。在一切国民党区域，党的基本方针，同样是发展进步势力（发展党的组织和民众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杂牌军队、国民党内的中间派、中央军中的中间派、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各小党派，共七种），孤立顽固势力，用以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

[1] “中央军”主要指蒋介石集团的部队。“杂牌军”主要指国民党地方军阀的部队。“杂牌军”受蒋介石集团的歧视，他们的待遇与蒋介石集团的部队不同。

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在国民党区域，党的机关应极端秘密。东南局^[1]和各省委、各特委、各县委、各区委的工作人员（从书记至伙夫），应该一个一个地加以严格的和周密的审查，决不容许稍有嫌疑的人留在各级领导机关之内。应十分注意保护干部，凡有被国民党捕杀危险的公开或半公开了的干部，应转移地区荫蔽起来，或调至军队中工作。在日本占领地区（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如上海、南京、芜湖、无锡等地）的方针，和在国民党区域者基本相同。

（七）以上策略指示，经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请东南局和军分会诸同志讨论，传达于全党全军的全体干部，并坚决执行之。

（八）此指示，在皖南由项英同志传达，在苏南由陈毅同志传达。并于接电后一个月内讨论和传达完毕。对于全党全军的工作布置，则由项英同志按照中央方针统筹办理，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1] 东南局是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中国东南地区工作的代表机关。这个地区包括浙江、福建两省的全部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的一部分地方。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5月4日)

望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至二万人枪。严令叶飞定出分期实现计划，立即动手在高邮、泰县、泰兴、清江等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的组织。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 苏南苏北广大地区^[1]

(1940年5月5日)

项英、陈毅二同志：

甲、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

乙、新四军一、二、三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在郎、广、两溧只应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员机关，并须在适当时机取得该地政权。

丙、在吴淞口、镇江之间，镇江、南京之间及芜湖以西之沿江南北两岸，控制多数渡口，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立地方游击部队，务不使敌人切断渡江交通。应责成四、五支队恢复无为县。

丁、速令叶飞^[2]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和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的电报。

[2] 叶飞，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辖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司令员。

韩德勤李明扬^[1]之反对。

中央书记处

微酉

[1]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

项英、陈西台、及胡服化

A M301. M302. 1342

项英陈毅 = 所(甲) 同志军部 后方机关 及渡南庄
 力移至苏南 惟情比 意院南力 不要太弱 在次被
 置 既保 指挥机关 以保 坚持 皖南 陆地

在 其 展 之 (乙) 新 第 一 二 三 支 队 之
 力 仍 在 苏 南 方 向 靠 不 是 梁 陈 梁 水 部
 梁 德 等 亦 在 此 区 而 是 在 苏 南 苏 北
 产 六 旅 人 员 分 散 十 个 部 尤 其 是 长 江 以 北
 方 针 部 队 亦 分 散 十 个 部 尤 其 是 长 江 以 北
 机 关 两 部 部 队 亦 分 散 十 个 部 尤 其 是 长 江 以 北

部 队 人 员 机 关 亦 分 散 十 个 部 尤 其 是 长 江 以 北
 林 德 等 亦 在 此 区 而 是 在 苏 南 苏 北
 南 北 两 岸 控 制 各 教 区 口 甚 多 亦 在 此 区 而 是 在 苏 南 苏 北
 速 气 乘 机 在 北 岸 扩 大 部 队 建 立 政 权 不 要 产 生 停 顿 动
 志 师 播 之 反 对 中 央 喜 悦 之 一 部 队 亦 在 此 区 而 是 在 苏 南 苏 北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陈毅电的手稿。

对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 发展中原根据地的指示^[1]

(1940年5月5日)

德怀、克诚、陈、罗、雪枫、胡服：

韩德勤进攻皖东虽因失败退返淮河以北，李品仙受我李先念纵队五个团向大别山脉攻击之威胁，而有停止进攻皖东之意，蒋介石亦有停止军事冲突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之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黄率三四四旅在现地休整并与胡服、雪枫取得电台联络后，应遵朱彭令开入淮河北岸，胡服已先到该地等候，该旅到达后即听胡服意见部署兵力布置工作，彭吴支队亦听胡服、克诚意见向苏北出动，从徐州附近逐步南进，先占盐城、宝应以北各县。三四四旅与彭吴支队南下口号，仍是救援新四军与配合友军抗日，如届时李品仙已撤退进攻皖东部队，并恢复立煌办事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给彭德怀、黄克诚、陈光、罗荣桓、彭雪枫、胡服（刘少奇）的指示。

处，释放张夫人（张云逸的夫人韩碧）及一切被捕党员，退回军款，则我军暂时可不开入淮南，第一步以盐城、宝应、蚌埠、蒙城为界。如韩、李来攻则消灭之。如韩、李愿让该线以北为我防区，则暂时妥协之。如彭吴兵力不足，则三四四旅协助之。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凡扬子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北，开封以东，陇海路以南，大海以西，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责成三四四旅，彭吴支队，雪枫支队，罗、戴支队，陈毅之叶飞部，配合地方党负其全责，凡军事行动统归朱彭两总及胡服同志指挥之，一切具体部署，政治口号，政权建设，发展计划，及统一战线方针，统由胡服负责会商克诚、雪枫考虑决定，报告朱彭及中央军委。

毛 王
微酉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5月11日)

武汉敌人分三路向鄂豫进攻，已占确山、竹沟、泌阳。豫南宜发展，请令李先念路西部队派部队及干部向北发展。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5月22日)

青年工作是整个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部分，各种民众工作的共同目标是抗日，要与整个工作联系起来。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冯文彬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对巩固发展苏北根据地 及扩大整训武装的指示^[1]

(1940年5月23日)

胡服、陈毅、克诚、雪枫、云逸：

(一) 胡服、雪枫两号电均悉。

(二) 目前重点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三) 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用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

(四) 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能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要积极准备一切，包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

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

（五）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六）目前敌人正向涡河以西进攻，正是雪枫区域扩大整训军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皖东区域，除以有力一部对付莫德宏部的侵入并派得力人去指挥外，亦应照此方针布置。

（七）要扩兵与巩固根据地，就要发动基本群众，而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必须镇压反动分子。在这里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到党派的与社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另方面对于妨碍我们发动基本群众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镇压（当然不是每个都杀死），否则发动群众与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于土匪必须加以剿除。

毛 朱 王
漾辰 延安

我们要争取中间派^[1]

(1940年5月29日)

目前时局有拖与好转的可能，当然也要警惕有逆转与发生突然事变的可能性。朱总司令说得对^[2]，我们还要努力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势力也要争取与分化，就是打了他们也还要争取他们。不要把顽固派当作汉奸打，不能把中间派当作顽固派打。目前顽固势力削弱，中间派的势力增大，国民党军队的多数军官也是中间派。要争取中间势力，就必须有统一战线的办法，如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等，同时在理论上也要多作说明。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朱德报告国共磨擦问题后讲话的一部分。

[2] 朱德在报告中说，从打退国民党这一次反共磨擦中，我们得到一个大的教训，这就是争取中间力量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报告中还提出，对顽固势力我们也要争取。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5月30日)

战地写生队沈逸千等拟由榆林转赴晋西北工作，请加以保护。

[1] 这是毛泽东致贺龙、关向应电的主要内容。

对华北华中的战略部署^[1]

(1940年6月1日)

彭，杨，左，并告陈、罗，克诚^[2]：

甲、确占华北为敌人之已定方针。敌之“扫荡”使我部队困难增加，扩大不易，而部队之财政、粮食、枪枝、弹药等亦日见困难。

乙、国民党政策是把我们封锁在敌后方与敌拼消耗，防止我部队南移，隔断我部队可能进入我后方地区的道路。

丙、因此在战略布置上，我们有下列意见：

(1) 在北线即冀中、冀察晋、晋西北等区，主要方针是坚持斗争，而不是扩大部队。因部队扩大，给养、枪枝均无着，反而使斗争的坚持发生困难，所以这些地区的主力部队之一部应向南移动，而地方武装则应大大加强，游击战争应大大发展。在这些地区的主力军队，应确保六成枪枝的限制，力戒人多枪少的现象。

(2) 在南线即晋东南、冀南、山东等地区，除山东外，很大的扩大亦是困难的。克诚纵队及彭朱支队^[3]应立即转往华中，其原防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

[3] 彭朱支队，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由一二九师及北线南移部队接替。

(3) 华中是国共必争之地，现在情况虽然不十分紧张，然而目前是我们部队南移的最好时机。如谈判略有结果，则不好南移了。彭朱支队及黄克诚纵队应立即出发。黄应亲率全部或至少两个旅南下。在华北略有损失可以补充，而华中如失时机，将来全部困难很大。以上请德怀考虑电复。

毛 朱 王
东日

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1]

(1940年6月1日)

对华中我兵力布置，军委已有原则电报^[2]，今后一切具体行动由胡服之命令实行之，克诚、雪枫、彭、朱^[3]等均应服从胡服之指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朱德致刘少奇、彭雪枫、黄克诚并彭明治、朱涤新电的主要内容。

[2] 指6月1日给彭德怀、杨尚昆、左权并告陈光、罗荣桓、黄克诚的电报。

[3] 彭，指彭明治，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司令员；朱，指朱涤新，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政治委员。

和陈嘉庚的谈话^[1]

(1940年6月1日)

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

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蒋委员长是全国抗战的领袖，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三民主义，组织基础就是国共两党，二者失去了任何一方，统一战线都不能设想。因此，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1] 5月31日下午5点多钟，陈嘉庚一行到达延安，受到5000多名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天下午，毛泽东在杨家岭会见陈嘉庚，并与他亲切交谈。陈嘉庚首先表明海外华侨希望国共两党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意愿。他对共产党进行反磨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这是毛泽东关于此问题和陈嘉庚谈话的一部分。

同意中原局的建议^[1]

(1940年6月5日)

你们的战略部署须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的建议，陇海铁路以北的党和军队的领导，仍归还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陇海路以南则归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等关于中原局的意见问题致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6月10日)

目前形势，欧战将扩大，形成英、法、美对德、意、日的对抗。欧战已影响到中国，最近国民党搞磨擦也减少了。写“七七”抗战三周年的文章，要解答一些实际问题，例如政权问题，应当公开说明“三三制”问题，说明只有统一战线政权才能争取中间力量。目前党内错误倾向主要是“左”倾，表现在政权问题、土地问题、群众工作等方面，要发一个中央关于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我们在党内要紧，但党的政策要宽。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纪念“七七”抗战三周年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指出，必须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主要是：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没有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经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款滥征捐；在政权问题上不执行“三三制”政策；对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对党外干部不接近、不信任。

致王震电^[1]

(1940年6月11日)

涧峪岔高双成部队决不能打，此间即派南汉宸^[2]去榆林交涉。顽固派正挑拨高双成向我磨擦，我们决不可中计。绥德、清涧、安塞、吴堡等四县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县政府及专员公署人员分配实行“三三制”。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王震电的主要内容。

[2] 南汉宸，当时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争取东北军工作是 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1]

(1940年6月13日)

东北军在抗日战争中是一支较可靠的友军，在国共斗争中基本上是一种中间势力，且有可能为我争取。我们对东北军的关系好坏，对于我们争取广大友军工作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把争取东北军工作看成党争取全国友军工作的重要环节。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等关于争取东北军工作致中原局、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在延安新哲学会 第一届年会上的讲话^[1]

(1940年6月21日)

今天开这个会，我心里很高兴，回想前年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的那一天到现在，已两年了。工作有了成绩。今年开过了这个年会之后，一定会更好。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然很落后，这是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的太不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现在人的条件比过去好了，有许多文化工作者与哲学家都会聚在这里。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我们要求全国在这方面加以努力，首先要求延安的人多多努力，年会开了以后，新哲学会的前途是光明的。

[1] 延安新哲学会，是在毛泽东倡导下于1938年夏秋之际成立的。1940年6月21日下午，延安新哲学会在文化俱乐部举行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等50余人参加。这是毛泽东在会议上的讲话。

关于部队合编问题 给八路军总部的信^[1]

(1940年6月27日)

彭、刘，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等：

同意彭雪枫、黄克诚两部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以彭雪枫为司令员，黄克诚为政治委员。活动于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以对日寇作战、巩固豫皖根据地、扩大与整训部队为中心任务。彭雪枫部，对外仍旧保存新四军第六支队名义，黄克诚部不必改新四军。请陈光、罗荣桓令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到徐州以东南下，活动于津浦路东地区。彭雪枫、黄克诚应设法抽调一部兵力过津浦路东，帮助苏北发展，俟彭朱支队到达后，苏北部队再行合编，成立一八路军纵队。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现在华中部队统归刘少奇指挥，苏北、淮北之纵队可归彭雪枫、黄克诚指挥。

毛 朱 王

二十七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八路军各部队合编问题给彭雪枫、刘少奇并告八路军总部，陈光、罗荣桓等的电报。

为叶志强题词

(1940年7月1日)

天天求进步。

毛泽东

天天求道
步步求道

毛泽东为叶志强的题词。

团结到底^[1]

(1940年7月5日)

抗日战争的三周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周年。我们共产党人今天来纪念抗战，更感到自己的责任。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我党中央已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个宣言的中心是号召抗战到底，团结到底。这个宣言希望得到友党友军和全国人民的赞同，而一切共产党员尤其必须认真地执行这个宣言中所示的方针。

一切共产党员须知：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因此，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我们所反对的，只是敌人和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对其他一切人，都要认真地团结他们。而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我调查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成分，在那里办事的有一千三百人，其中坚决反共的只有四十至五十人，即是说，不足百分之四，其余都是希望团结抗战的。我们对于坚决的投降分子和反共分子，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对他们容忍，就是让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所以必须坚决反对投降派，对于反共分子的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地打退之。如果我们不是

[1] 这是毛泽东为延安《新中华报》写的纪念抗日战争三周年的文章。

这样做，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但对于凡非坚决投降和坚决反共的人，则必须采取团结政策。其中有些人是两面派，有些人是被迫的，又有些人是一时之错，对于这些人都应争取他们，继续团结抗战。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那就是“左”倾机会主义，也是对于团结抗战不利的。一切共产党员须知：我们发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必须坚持这个统一战线。现在国难日深，世界形势大变，中华民族的兴亡，我们要负起极大的责任来。我们一定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我们一定要把中国造成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要达此目的，必须团结全国最大多数有党有派和无党无派的人。共产党人不许可同人家建立无原则的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所谓溶共、限共、防共、制共的一套，必须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但同时，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在抗日原则下团结一切尚能抗日的人，必须反对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

为此目的，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在军队问题上，我党宣言中已表明：继续执行“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某些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的，应即加以纠正。凡不向八路军新四军举行军事磨擦的军队，应一律

采取友好态度。即对某些举行过磨擦的军队，在其停止了磨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这就是在军队问题上实行统一战线政策。

其他财政、经济、文化、教育、锄奸各方面的政策，为着抗日的需要，均必须从调节各阶级利益出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均必须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帝国主义战争正向世界范围内扩大，由帝国主义战争所造成的极端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将必然引起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我们是处在战争和革命的新时代。没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苏联，是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援助者。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国抗战的。但同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一切共产党员必须和友党友军团结一致去完成这个任务。我们相信，在我党全体党员和友党友军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之下，克服投降，战胜困难，驱除日寇，还我河山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

(1940年7月7日)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

当此伟大抗战的三周年纪念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最诚恳最热烈的心怀向我全国同胞，前线将士，各党各派抗日同志致民族革命的敬礼，向我三年以来的殉国烈士致无限的哀悼，向我负伤将士与被难同胞致深切的慰问。

英勇抗战的三周年证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必然要崩溃的，中国决不会亡，最后胜利必然属于我中华民族。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已在我三年英勇抗战中大大削弱了，中国抗战到底的意志已凝结于全民族的心目中，而目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

但是抗战的空前困难时期也到来了。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向中国进攻，并宣布了他的东方门罗主义。中国抗日阵线中的一部分人正在发生动摇，而从国际方面袭来的阴谋，则有由德意的劝和政策代替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向中国进攻，与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飞机大炮互相呼应，企图借此达到他们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重新分配世界与奴役世界人民。而英美法帝国主义则在一贯执行其反苏反共与对德意日让步的自杀政策下，使法国遭受了亡国惨祸，使英国遭受

了严重失败，而在美国则使其太平洋大西洋上的利益同时受到严重的威胁。帝国主义大战现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帝国主义相互间的冲突没有完结。而由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空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正在袭击全人类的生存，必然要引起世界革命的爆发，革命危机正在一切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中间深刻的酝酿起来，我们是处在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一切帝国主义战争都是屠杀人民的战争，惟有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漩涡的伟大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才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与被压迫民族的真正援助者。中国抗战的可靠的朋友，正是苏联与全世界人民。

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之下，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这些人头脑昏聩，意志薄弱，熬不住艰难困苦，看不清抗战前途，一遇危难，就想动摇，这些人是抗日阵线中最危险的人物。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应当隐蔽这种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向全国提醒这种危险与困难，并指出：全国应该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危险与困难。

汪精卫的投降是破产了，他同他的党徒现在已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手中下贱的玩具。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是把全法国人民变成了希特勒的奴隶，投降是绝对没有出路的。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情法国人民的境遇。中国共产党坚信，在法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之下，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是不会灭亡的，法国人民的斗争将与中国人民的

斗争配合起来，战胜外来的压迫者。

全中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任何敌人的进攻必须抵抗，任何困难必须克服，任何投降阴谋必须反对，任何投降分子必须同他奋斗到底，全国必须加紧团结，内部磨擦必须消除，国共关系必须调整，内战危险必须根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巩固，全国人民必须在蒋介石先生的领导下抗战到底，各党各派的诺言必须实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同胞及友党同志声明：我们是始终实践自己的诺言的。我们在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等项，我们都已认真执行，从来没有违背。我们在陕甘宁边区内，在敌人后方各抗日根据地内所执行的政策，完全是符合于三民主义的政策，没有任何一项超出了三民主义的范围。我们现在重复声明：在整个抗日战争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时期内，我们将始终执行三民主义的政策。一切责备共产党违背诺言的，完全是恶意的诬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尊重他自己的诺言，认真实践其允许过人民与允许过我党的一切政治上与具体问题上的条件，以利团结与抗战。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在团结抗战与国共合作期间，采取任何对内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是绝不许可的。我们始终拥护蒋介石先生及国民政府抗战到底的国策，始终执行不暴动不破坏的诺言，一切关于共产党又将采取过去内战时期的暴动政策与破坏政策的流言，完全是奸人的造谣。同时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亦应放弃对于共产党的破坏政策，以保证两党的团结一致与长期合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约束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队

伍，将其行动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其他地方作任何足以引起友军冲突的行动，而在战区及敌人后方则与一切抗日友军协同作战。但要求各抗日友军对其部下亦应加以约束，勿向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足以引起冲突的任何行动，以保证抗日战线上的团结一致。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极力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因为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抗日游击队乃是位于国防最前线的军队，而在三年以来八路军新四军进行了大小一万余次的英勇战斗，坚持了广大敌后地区的抗战，钳制了全国百分之四十至五十的敌人，而其处境则是最险恶的，其生活则是最困苦的，其弹药则是最缺乏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声明：我们继续执行本党六中全会在民国二十七年十一月所作“不在一切友军中发展党的组织”的决定，一部分地方党部尚未严格执行此决定者应即加以纠正。本党对待一切抗日友军的政策是团结与巩固他们，而不是分裂与破坏他们。但是我们要求中国国民党及各抗日友军亦以同样政策对待八路军与新四军，以求泯去猜疑，齐心抗战，而使一切军队同在最高统帅指挥之下担负杀敌救国之任务。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即将到来的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取消现在存在着的“反共”“限共”“溶共”“防共”“制共”的政策，因为在这个政策的执行中已经产生了削弱抗战力量，引起人心不安的严重结果。须知抗战决不能采取既要对外又要对内的两面作战政策，这样政策实无异于自杀，法国达拉第政府的反共覆辙，中国应该引为深戒。

本党同人认为：要克服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必须改变在抗战中的许多作法，必须实行抗战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必须释放一切被捕的共产党员与爱国分子，必须承认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权，必须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必须废止有害的特务作风，必须改变不适时宜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与兵役政策，必须把抗战的重心放在自力更生上面，而不应依赖任何不可靠的外援。

全国的同胞们，将士们，各党各派的抗日同志们！空前的投降危险与空前的抗战困难是到来了，我们必须克服这些危险与困难。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这些危险与困难是完全能够克服的，中国存在着克服任何危险与困难的一切必要条件，只须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善于去利用。中国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决非阿比西尼亚与西班牙可比，更非荷兰与比利时可比，亦非法国可比，而日本则远不如德国。中国还保存着数百万大军，有国共两党与全国大多数人民的团结，有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可以利用，有强大的苏联与世界革命斗争可以为援。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整整一百年中，经历了无数的危难，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孙中山先生的英勇奋斗，尤足为我全民族的模范。当此民族危难深重之秋，我们一定要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教，执行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执行他的临终遗嘱，打破一切悲观动摇与没有出路的情绪，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地奋斗下去，则投降危险必然克服，抗战必然胜利，建国必然成功，中华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到底！

团结到底！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

(1940年7月7日)

目前形势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都表示出我们是处在新的巨大变化的时期中。

(一) 目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三大阵线的斗争。第一个是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第二个是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第三个是苏联和平阵线。两大帝国主义阵线的多数国家为着重分世界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进到生死斗争阶段，而苏联领导的和平阵线，则因苏联的强大国力与正确政策，未被卷入帝国主义战争，而超脱于战争之外，这是目前形势的最基本特点。

(二) 两大对立的帝国主义阵线，由于德国进攻，意国参战，法国投降，英国已退出欧洲大陆的结果，陷于严重的不平衡状态中，目前双方都在重新组织力量，准备进行新的巨大冲突。德意准备向英国进攻，英国收集法国殖民地准备抵抗德意，日本准备在太平洋参加德意战线，美国正在加紧武装起来走上战争轨道，帝国主义战争有由欧战扩大到世界范围的趋势，帝国主义互相间的冲突没有完结。

(三) 超脱于帝国主义战争之外的苏联，则正在进一步解决其在

波罗的海方面、在巴尔干方面、在近东方面的安全巩固问题，正在准备着最伟大的革命力量，为应付世界巨大事变与争取世界永久和平而斗争。

（四）空前激烈的搅乱整个世界秩序的帝国主义战争，正在引起各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大众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迅速革命化，革命正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与印度深刻的酝酿起来，第二国际正迅速破产，共产党在群众中的信仰正迅速增加，苏联在全世界人民中的信仰正迅速高涨。

（五）由于日本切断我西南国际道路并积极向正面进攻，企图用增大的压力分裂中国内部，压迫中国投降，这样就使中国抗战局面亦处于新的环境中，空前的困难时期与空前的投降危险快要到来了。但同时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也增加了。

（六）投降危险的来源，主要的现在已不是英美法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而是日本的压力与德意胜利对于日本的鼓励以及可能的劝和政策，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又大大的削弱了自己，因此，国民党内部的再分裂，新的汪精卫派的产生，已经不可避免，全国人民中无出路的情绪必然会增加。

（七）但国际国内存在着许多有利条件，便于我们去执行克服投降争取好转的任务。这些条件是：1. 英美法已不复是引诱中国投降的重要因素，英美虽想牺牲中国保存南洋，但日本已不能听命，我们可以利用英美法与德日意两个帝国主义阵线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日美在太平洋上增长着的矛盾。2. 日本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困难，其力量已在我们三年抗战中大大削弱了。3. 苏联的无比强大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这是中国抗战的可靠朋友（以上是三个外部条件）。4. 我党抗战中的力量是大大增加了，这是克服投降争取〔时局〕好

转的主要决定因素。5. 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抗战的积极性（这些中间势力是：国民党中的多数党员，中央军中的多数军官，多数的杂牌军，中等资产阶级，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上层小资产阶级，各抗日小党派）。6.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其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矛盾，使其无法统一地进行投降与统一地进行“剿共”（以上是三个内部条件）。所有这些条件，给了我们以充分可能性，去避免统一投降与统一剿共的危险，而使时局逐渐走向好转。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情绪必须在认识这些条件上加以克服。

（八）增加了的投降危险与增加了的好转可能性，将表现于抗日阵线内部的分化。首先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分化，一部分人因为日本的压力、抗战的困难与对于共产党及民众的恐惧，必然分裂出去变为投降派，其另一部分人则可能因为种种原因（特别是我们的政策）实行好转，变为较前积极些的抗日派。这种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好转，虽然只能是在不损害其根本阶级利益条件下的好转，不能有彻底的好转，但延长合作抗日的时间是可能的。其次是中间势力中也会发生分化。我们的任务，在于争取一切可能好转的部分，争取国民党的主体延长合作时间，而孤立与驱逐一切投降派。

（九）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全党必须紧张起来，把自己变为团结全国抗日力量的核心，认真的明确的执行中央的政策，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

党的政策

根据上述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全党应当执行下列各项党的

政策：

（一）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某些人一样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抗战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二）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指出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的覆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

（三）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特别强调苏联的强大，强调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强调中国抗战力量远非法国可比，宣传中国人民在三年中英勇奋斗的成绩，以打击悲观情绪，孤立投降派。

（四）强调自力更生。为此必须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在抗战中的作法，例如应即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取消反共政策，改变特务作风，改变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及兵役政策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模范实例。

（五）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

间的延长。

(六) 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这是完全必要的)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便想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生活,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 在一切友军中(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以便建立党的信誉,扩大交朋友的工作,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

(八) 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我们没有违背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停止土地革命,取消暴动政策,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自己这个诺言的。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例如对于党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承认边区问题,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等等,都与其诺言相违反,我们应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而打破“共产党违背诺言”的欺骗宣传。

(九) 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乱打汉奸,财政经济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捐等的过“左”政策;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对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怠工;对根据地不作长期打算,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表示怀疑与不执行;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

政策：

（一）主要的不是强调英美法东方慕尼黑政策的危险性，而是强调在日本压力下一部分人悲观失望与实行投降的危险性。不是如同国民党某些人一样蒙蔽事实真相，说什么“一切皆于中国有利”，而是指出抗战困难与投降危险空前严重，号召人民为克服这种困难与危险而斗争。

（二）指出英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反苏反共，指出法国投降的悲惨教训，今后中国如欲反苏反共，必然重蹈法国的覆辙。过去的反共政策已使抗战力量大为削弱，如不改变这个政策，抗战胜利是无望的。

（三）强调抗战的有利条件。特别强调苏联的强大，强调世界革命形势的有利，强调中国抗战力量远非法国可比，宣传中国人民在三年中英勇奋斗的成绩，以打击悲观情绪，孤立投降派。

（四）强调自力更生。为此必须要求国民党改变其在抗战中的作法，例如应即召集民主的国民大会，取消反共政策，改变特务作风，改变错误的财政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及兵役政策等，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依靠民众自力更生的模范实例。

（五）强调团结一致。我们在过去一时期内强调自卫斗争是完全必要的，非如此不能打退当时的反共高潮，促成顽固派的重新觉悟。现在是反共高潮下降时期，故又应该强调团结，过去的斗争也正是为着争取团结。必须使党员懂得：现在强调团结并不是停止一切斗争，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一天不停止，我们站在自卫立场上的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但现在我们斗争的主要火力应该向着真正的投降派，而不是向着一般的顽固派，在反共高潮已经降低，某些顽固派初步表示某些好转之时，我们应对他们强调团结，以便争取合作时

间的延长。

(六) 我们军事力量的发展 (这是完全必要的) 限制在战区与敌人后方及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境内, 而不向国民党后方作任何可以引起冲突的行动。某些部队不愿深入敌后, 而在时局严重时便想向国民党后方行动, 便想恢复内战时期的游击生活,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七) 在一切友军中 (包括中央军杂牌军在内),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最后无保留的确定不发展党的组织的政策, 原有党员一律停止组织生活, 以便建立党的信誉, 扩大交朋友的工作, 争取二百万友军继续抗战。对于这种交朋友工作毫无成绩的地方, 须受到党的严重责备。

(八) 向国民党及全国声明: 我们没有违背自己在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 (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 停止土地革命, 取消暴动政策, 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 苏维埃改为地方民主政府), 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是坚决执行自己这个诺言的。而国民党则违背了它的诺言, 例如对于党派的合法存在权问题, 承认边区问题, 实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等等, 都与其诺言相违反, 我们应要求国民党实践其诺言, 而打破“共产党违背诺言”的欺骗宣传。

(九) 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中的左倾错误。一年以来在反磨擦斗争中发生了许多“左”的错误。例如在军事斗争中有些地方未能坚持自卫原则, 乱打汉奸, 财政经济工作中侵犯商人财产滥罚滥捐等的过“左”政策; 不执行各阶级联合政权的原则, 对中央建立“三三制”政权的指示怠工; 对根据地不作长期打算, 不爱护根据地, 浪费人力物力; 对中央“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表示怀疑与不执行; 对待顽固分子只有斗争没有团结; 把国民党看成都是顽

固派，而不懂得国民党多数党员都是中间派并有许多进步分子，顽固分子只占极少数，甚至把顽固分子看作汉奸，把中间分子看作顽固分子，要求中间分子有进步分子一样的表现，不承认中间分子的地位；对非党干部表示不信任，不接近，没有同非党干部共同工作的习惯，以及杀戮被捕的顽固分子、杀戮侦探等等。这些都是从狭隘思想出发的“左”倾错误表现，如不严格纠正，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要受到危害的。但同时，对右倾错误亦不应放松。例如对时局的悲观情绪，无原则的迁就国民党，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发展抗日力量取消极态度，对国民党内奸政策无警觉性，混同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原则差别，干部的发财思想，贪污腐化，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与事务主义，以及惧怕自我批评等，如不纠正，便将丧失党的独立性与革命的前途。

(十) 对全党加强统一战线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的重要一部分。既须使党员明白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又须使党员明白无产阶级如何同其他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共同的敌人，二者是党的教育不可分离的两方面，决不能随便放弃一方面。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单纯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的单纯化现象。应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作为成绩考成的重要标准。

(十一) 继续巩固党的工作。目前组织上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巩固而不是发展，注重质而不是注重量。必须严格审查干部，肃清内奸，以便有效地防止国民党的内奸政策。必须从党内将内奸分子（敌人及国民党派来的与收买的分子）、投机分子（为个人利益混进党内表现严重的贪污腐化与脱离群众的分子）与太落后分子（不到

会、不缴党费、又不做任何工作的挂名党员)这三种人洗刷出去,而对于其他分子则加强教育。必须使党员懂得“党内要严党外要宽”两个不同的原则,而这样两个不同原则正是相辅为用的。目前则存在着相反的现象:党内反而是宽的,党外反而是严的,这种现象必须纠正。

(十二)加强各个根据地内的组织工作。现在有些根据地内如晋察冀边区等有了好的组织工作,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上了轨道。而在另外许多区域,则由于对支持长期斗争认识不足,还存在着很大弱点。必须认识今后的斗争是异常艰苦的,而要长期支持就必须改变过去粗枝大叶的工作作风,代之以有计划的细心的组织工作,并在各方面执行党的正确政策,否则必然要失败。

(十三)必须继续扩大与巩固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这是保证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扩大的方向是敌人占领区域。在人力物力已经发生困难的区域主要的方针是巩固,而在其他区域则主要的方针是扩大,并于扩大中巩固之。

(十四)在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作战地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瓦解敌军与伪军的指示,必须在今后一年中表现瓦解敌伪军的业绩,必须认识过去三年在这方面的成绩是微弱的。

(十五)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必须严格执行党的组织上的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而对党外则执行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以便揭穿与孤立投降派。

(十六)在日本占领区域则须认真建立党的组织,并须同样执行隐蔽政策与精干政策。对党外则在于谨慎的组织群众,加强工人运动,积极瓦解敌伪军,争取两面派汉奸,以便孤立日寇汉奸而最后驱逐之。

(十七) 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

中央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执行上述各项政策而斗争，果能如此，则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是有保证的。

目前华中应切实发展苏北^[1]

(1940年7月12日)

恩来，胡服，项英，陈毅，雪枫、克诚^[2]：

恩来电悉，我们均同意。

一、叶管部^[3]已将顽军击溃，陈毅已抵苏北，并令粟裕^[4]率江南指挥部及二六两团过江，津浦路^[5]东淮北部队亦正往援中。

二、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6]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7]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不要截断皖省从敌区运私货孔道。并请雪枫保护于学忠^[8]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周恩来、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报。

[2] 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陈毅，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雪枫、克诚，即彭雪枫、黄克诚，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3] 叶管部，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下辖之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纵队司令员叶飞、副司令员管文蔚。

[4] 粟裕，当时任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

[5]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6]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7]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8] 于学忠，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

运饷弹道路，不要禁止通过，如通知我们时，我军应负责保护。

三、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毛 朱 王

十二日

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1]

(1940年7月13日)

一 战争与革命问题

(一) 关于苏联不加入战争

两派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阻止不了时，人民就起来反对战争，而苏联就不加入。这一不加入计划的实现，是苏联二十年来斗争的结果，是世界人民拥护苏联的结果，是苏联善于利用帝国主义相互间矛盾的结果，是无产阶级世界战略上最伟大的胜利，因为它不但保护了苏联，而且保证了世界革命的胜利。

这一胜利完成于德苏、苏芬两个协定^[2]，以后的任务则是巩固之。

(二) 关于帝国主义两大阵线

所谓帝国主义两大阵线，两大统一战线，不是说双方同盟诸国间没有矛盾与斗争，矛盾与斗争是存在的，而且是严重的。例如英、美、法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是有矛盾与斗争

[1] 这是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的会议上所作结论的要点。

[2] 指1939年8月23日和1940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苏芬和平条约》。

的。又如德、意、日三国相互之间，三国与其他小国之间，也是有矛盾与斗争的。

也不是说各个阵线是固定的，不生变化的。相反，它们是不固定的，要生变化，而且已经生了变化。

一方面，有北欧、荷、比、巴尔干的变化，有法国的大变化，表现了阵线的减弱，这就是英美法阵线。

一方面，则表现了阵线的增强，这就是德意日阵线。

于是造成了目前的不平衡状态。

日本一会儿亲英、美，现在又有亲德、意之势，这是由于日本内部法西斯派将代替英美派之故。

双方都没有完全固定的同盟条约，例如美之与英、法，英、法之与北欧，及荷、比，德、意之与日本。

这就是所谓阵线内部的矛盾、斗争与变化。今后还会有矛盾与斗争，也还会有变化。

如果不管这一切，则一方面德、意、日欲打破现状，一方面所谓民主国（包括荷、比）则欲维持现状，双方各有利害共同点，因而可以结成一种统一战线，则是实际上已经有了的，双方都有几十个或十几个国家。目前以地域、经济力与海军而论，仍以英、美为强，而德、意、日则因德国战争胜利与占领地区之广，表现其强。

无论东方与西方，现在两个帝国主义阵线的斗争主要已不在大陆上，而移到海洋上，在这方面尚未决战，因此尚有巨大的冲突。

假令英国屈服，亦尚有美国的海上霸权。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

德、意都是海军较弱的，加上法国投降，也未改变这种状态。

德、意与日本，不破坏英、美的海军，是无法管理英、法、荷、比的殖民地的。

一方面，凡尔赛与华盛顿体系，又一方面，反对这个体系而企图建立新凡尔赛与新太平洋体系。这个斗争现在尚未完结。

就是说，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尚有可供革命利用之矛盾，因此，必须利用之。苏联必须利用之，印度必须利用之，中国必须利用之，一切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必须利用之。

现在是世界大震动大变化时代，不是什么“和平”与“资本主义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早已完结，以后也永远不能建立。

如果看不见这一点，就因为对下列诸点估计不正确：

1. 对反革命估计过高。(1) 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由于战争而展开了，不是缩小了；(2) 各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在人民中失去信任；(3) 社会民主党失去信任；(4) 战争的破坏性等。

2. 对于革命力量估计不足。(1) 苏联的存在；(2) 中国革命的存在；(3) 印度革命运动的高涨；(4) 欧洲及各国共产党的存在。

(三) 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1. 德、意战胜英、法，等于打断两条帝国主义锁链，而新的帝国主义锁链，则可能在刚刚套上或来不及套上就被打断。资本主义战线可能有三处被冲破——欧洲、印度与中国，这就等于基本上冲破整个资本主义战线。

2. 在欧洲，单纯的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了，在那里，只能是十月革命加苏联红军。而这样的时机，目前还未到来。

3. 目前是苏联的八小时工作制与世界革命形势的成熟，而不是世界革命。目前还应该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目前是世界革命的前夜。

二 中国问题

(一) 好转问题

1. 初步好转——两党两军的外部合作，目的在唤醒广大民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2. 彻底好转——只有在共产党参加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政权成立之时。

3. 除去悲观——初步好转与彻底好转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的同盟军是广大的，目前民族资产阶级还是同盟军。

4. 除去幻想——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政之时，不能有彻底好转。

(二) 后退问题

目前是战略进攻中部分的策略后退（隐蔽政策）。但在战略上，在总的方面，仍然是进攻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

(三) 民族与民主革命问题

1. 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

2. 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有区别，也有一致的。大体上可分为片面抗战与全面抗战两个阶段，然而都在抗战过程中。目前是抗日除奸的整个革命阶段，没有另外单纯的土地革命阶段。是抗日除奸问题，不是单纯的土地革命问题。

3. “一切革命的基本问题是政权问题”。

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抗战建国”。

战略策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有四种形式的统一战线——（1）在国民党区域：在野的与在朝

的统一战线。(2) 在八路军与新四军区域：我们与其他党派、阶级在政权内的统一战线。(3) 国民党政权与我们政权之间的统一战线。(4) 在敌人占领之大城市：下层统一战线。

4. 目前是部分的统一战线政权，将来应该是全国的统一战线政权。没有这种政权，就没有抗日胜利。

5. 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同时的，不是民族革命过去之后，再来一个民主革命阶段。

五台山^[1]——一类——在抗日的前期与中期。

全国——在抗日的后期。

反磨擦——民族革命中的民主革命。

(四) 中间派问题

1. 就世界范围分：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派，但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同盟军。

2. 就抗战营垒（与敌人营垒区别）分：顽固派或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则是统治的阶级，动摇的阶级，不是中间派，把它们当做中间派，混淆了人民的视听。

中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中间派。

下层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进步派。

(五) 强调团结与斗争问题

1. 我们历来是强调团结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抗战派。

2. 我们历来是强调斗争的，今后还是一样——对付一切投降派。

[1] 这里的五台山，指在五台山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民主政权。

3. 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

4. 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

5. 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

6. 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有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

7. 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

（六）倾向来源问题

右倾——从地主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左”倾——从农民小资产阶级影响来的。

客观的——上列二种。

主观的——教育不足（自我批评不足）。

（七）边区问题

两个上了轨道的根据地——陕甘宁边区与晋冀察边区。因为党、政府、军队的努力。

缺点：革命秩序不足；统一战线太少；官僚主义太多。

加强：中央、边区，大家的努力。

（八）学习问题

1. 我们是处在战争与革命的新时代。

2. 一切皆在变化中，不应该用顽固的形式的观点，而应该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

3. 例如此次决定，即有许多新东西，这不是说过去不对，而是

说客观变了，主观要适应此种变化：国际，德、意、日的优势，苏联在战外，革命的酝酿；国内，新的困难，新的投降危险，初步好转的可能性，反共高潮的下降（已有三个月），“左”倾危险的发展等。

4. 三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战时期。

前两期都有成绩，但都有错误——陈独秀的绝对主义（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与内战后期的绝对主义（一切打倒，对某些可能部分没有正确策略）。现在应扩大成绩，避免错误。

加紧争取同盟军又不失自己立场的策略教育是必要的，老大与形式主义都是无用的。

从什么年月学好了，或者什么天才，都是骗人的。有用的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具体环境与具体策略，用点苦功。

改编反正军的方针问题^[1]

(1940年7月16日)

我们对于这些大批反正过来的军队，应该把他看作一种八路军、新四军的外围军方式去处理。这一创造外围军的工作，是和更加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本身的工作分不开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改编反正部队方针问题致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1]

(1940年7月20日)

一、与李品仙力求缓冲突；韩德勤部南下进攻可能性很大，我华中部队应增援陈毅，压下韩的攻势，发展苏北。

二、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的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但应极谨慎，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均没收其土地财产，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

三、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对苏北顽固分子的方针问题致中原局、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 土地财产问题的指示^[1]

(1940年7月20日)

汉奸首领及参加暴动之反动分子头目的土地财产可以没收，交民主政权，具体处理。但应极谨慎，仅仅对付极少数个别的汉奸首领及发动暴动首领，且应经过当地革命政权之正式判定和群众之拥护，而不应对一切汉奸、一切反动分子、顽固分子均没收其财产土地，变成相当普遍的没收土地与分配土地运动。又指出，极力扩大统一战线工作，拉拢一切动摇分子，只打击当前直接向我进攻的某一部分，以暂时中立其余部分。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没收汉奸及参加暴动首领土地财产问题发出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0年7月30日)

关于苏北战略，我们同意胡服意见。韩德勤部南下攻我时，我应大举反攻，一举而驱逐或消灭韩部，发展苏北。还指出：同意陈毅意见，对两李^[2]应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其对我同情或中立，因此目前不应进攻两李部队。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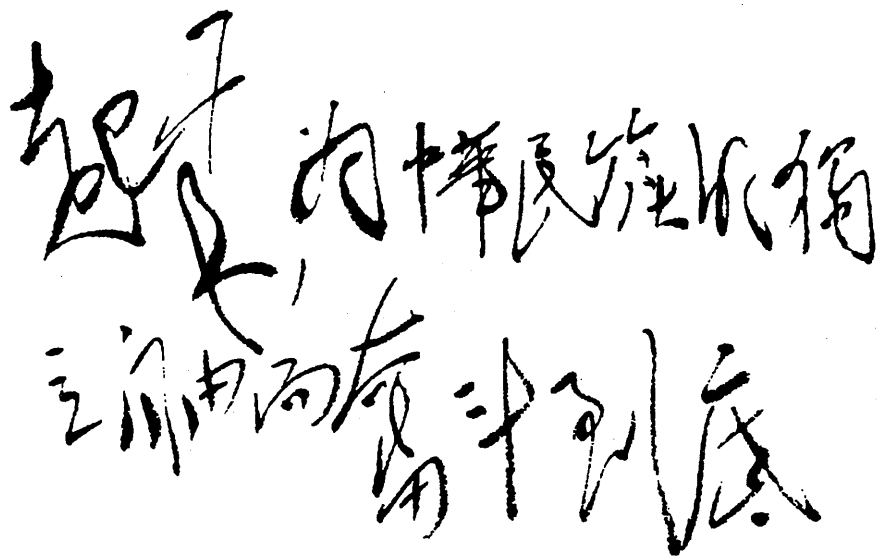
[2] 两李，指李明扬、李长江。李长江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题词

(1940年7月)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毛泽东

A large, expressive handwritten calligraphic inscription in black ink. The characters are bold and fluid,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The text reads: '起来，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Come up, fight to the end for th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haracters are arranged in two main lines, with the first line being longer and the second line starting further to the left.

毛泽东为《美洲华侨日报》创刊的题词。

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题词

(1940年7月)

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

以
華國者大觀也民族
統一戰綫
毛澤東

毛泽东为美国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的题词。

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题词^[1]

(1940年7月)

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

[1] 1940年7月，在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之际，正是陕甘宁边区的极度困难时期，为了鼓励工人们克服困难努力生产，毛泽东亲笔为通信材料厂题词一幅。

发展创造力，
克服困难，
毛版，通
讯材料种的
自研，
地证明。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通信材料厂成立两周年的题词。

为《大众习作》题名^[1]

(1940年8月1日)

大众习作

[1]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办《大众习作》，毛泽东为它题写刊名。

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 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1]

(1940年8月1日)

为了八路军、新四军今后发展的需要，必须培养高级和上级干部，而且现在各部队也可能抽出少数人员受训，故决定在延安军政学院设高级干部班，以培养团级以上干部为目的；在八路军总部设上级干部班，以培养营级以上干部为目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彭德怀联名发布关于举办军队干部的高级干部班和上级干部班的命令的主要内容。

对八路军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

(1940年8月13日)

彭，杨，罗、陆，聂，彭，朱^[1]：

你们会议^[2]应详细讨论中央七七决定^[3]及最近中央与总政各种指示以外，我们还有下列意见：

(一)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在抗战中应有其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是根据党的政策与共产党在民族斗争中的独立性而来的。因此模糊我们政治工作的独立性的原则，无视国民党军队的传统与作法对我们的恶劣影响是不对的。然而所谓政治工作的独立性并不是要我们抄袭内战时期一切作法，相反的我们应当根据民族战争的环境来确定政治工作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我们应当使军队的

[1]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罗，指罗瑞卿，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陆，指陆定一（1906—1996），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聂，指聂荣臻，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朱，指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 指八路军野战政治工作会议。

[3] 指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决定》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十七条重要政策。

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 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 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四) 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五) 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六) 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毛 朱 王 谭^[1]

八月十三日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政治工作变成实现党的每个政策的有力武器。

(二) 军队政治机关与军队各级干部，尤其是军政干部，必须了解与掌握党的政策与策略。应当承认军队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与掌握是非常不够的，因此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军队对居民必须有最严格的纪律。在政权及地方党未建立起来的地方，军队政治机关应负全责建立政权与地方党，而在建立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地实行党的政策。在政权及地方党已建立完备的区域，军队不应干涉地方政权及党的工作，而应尊重他们，成为遵守法令的模范。应当与军队中破坏对居民纪律的行为，不爱护根据地，浪费人力物力，不尊重政府及地方党，以及一切脱离党的政策的行为，作严格的斗争。

(三) 为坚持敌后的艰苦斗争，必须团结全党干部，因此明确地规定下列关系是必要的：

甲、在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中，应更多更严格地要求军队党负责任，如遇争执事件，应更多地责备军队党。

乙、在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外地干部。

丙、在老干部与新干部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老干部。

丁、在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中，在老部队与新部队的关系中，应更多地要求和责备正规军和老部队。

(四) 估计到部队的分散环境和政治工作现状，因此政治工作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应注意：

甲、全般性。反对只顾局部利益与本位主义。

乙、进步性。多研究，多总结，反对保守不求进步。

丙、复杂性，多样性。反对遇事简单公式主义，敷衍了事。

丁、计划性，组织性。反对急躁盲动乱来一顿。

戊、统一性。以使分散与集中、自动与命令求得一致。

己、实际性。反对不着重实际，铺张夸功。

庚、精细性。反对粗枝大叶只顾表面。

辛、战斗性。以求政治工作真正适应于战斗环境。

(五) 敌伪军锄奸工作，总政已有电示。

(六) 关于干部工作、民运、宣传教育等，总政当陆续有电示。

毛 朱 王 谭^[1]

八月十三日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1907—1988），湖南湘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为追悼张自忠大会题词^[1]

(1940年8月15日)

尽忠报国。

毛泽东

[1] 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延安各界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

忠
忠
報
國

毛澤東

毛泽东为张自忠的题词。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8月16日)

日本企图以截断中国西南交通迫使中国言和，而蒋介石没有外援将不能继续抗战，所以中国抗战有和平妥协的可能。要准备这一年多是国际国内的大的转变关头，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我们在思想上要有各种准备，政策要非常谨慎。

[1] 这是毛泽东参考莫洛托夫报告、日本松冈报告、蒋介石告沦陷区民众书等材料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国际国内形势时讲话的一部分。松冈，即松冈洋右，当时任日本外相。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8月18日)

绥米地区，要发动民众的春耕秋收运动，使民众得到利益。今后收税，不能增加太多，陕甘宁边区公粮不能收十万担。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取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关于中央和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后讲话的一部分。

致贺龙、关向应电^[1]

(1940年8月19日)

一

晋西北在新旧军斗争之后，由于未能妥当地实施政策，一部分地主出现对立现象，一般民众也动摇、彷徨，应引起严重警惕与注意。你们应与区党委共同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央七七决定，着重指出世界大事变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对于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并在会议中根据中央决定严格检讨自己的政策，号召干部从全局着眼认真研究党的政策。目前部队应以全力进行驻地周围的群众工作，达到安定秩序，巩固民心。

二

要解决粮食、经费的困难，部队应积极向敌占区扩张。同时，必须停止扩大，把中心力量集中在巩固部队，提高现有质量，不可只求数量的扩充。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关于一二〇师的工作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电的主要内容；本篇二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谭政关于晋西北财政困难问题致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告八路军总部电的主要内容。

山东根据地今后的任务^[1]

(1940年8月28日)

朱瑞，陈、罗，并告彭，杨，黎玉^[2]：

(一) 一一五师、山纵及山东地方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二) 我们认为山东今后应努力的是：

甲、巩固与扩大一一五师与山纵，使两部打成一片。坚持山东根据地，并在将来必要时，准备再调一部向苏北发展。故山东是你们的基本根据地。华中则是你们的准备发展方向，因此极力加强山纵，提拔山东本地干部，使山纵正规化是你们的共同任务。

乙、对山东抗战作长期打算，因此必须实行正确政策，尤其是财政经济政策。山东虽已提出了统筹统支，然据军政学院^[3]山东学生说（虽然他们离开了六个月不知近状），各部队仍多自筹自支，民众负担颇重，且无严格规定，民众有逃亡敌占区的，部队还有浪费的（如四支队）。因此，分局、一一五师及山纵应组织统一的财政经济委员会，确实整理财政收入与开支。各地区党政军亦应组织同样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黎玉，当时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

[3] 军政学院，指八路军军政学院。正式成立于1941年1月1日，院长王稼祥，教育长张如心。

的委员会。政策应当是集中的统一的，办理应当是分散的。

丙、开展山东统一战线，采取纯粹自卫原则，减少军事磨擦。但这不是要我们停止反对投降分子的斗争，而是要我们更努力地从政治上争取中间派，孤立顽固派。

丁、对敌人的行动应积极化，与敌人挤地盘，缩小敌占区，扩大我占区。

戊、对石友三、沈鸿烈、缪澂流^[1]等投降派部队，应取分化瓦解方针。惟分化部分仍以左翼军队面目出现，不属于八路，而是八路之外围军。

(三) 为统一山东领导，分局与师部应靠拢。请商决具体地点。

毛 朱 王

八月二十八日

[1] 石友三，当时任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缪澂流，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五十七军军长。

为陇东中学题名^[1]

(1940年9月)

陇东中学

毛泽东

陇东中学
毛泽东

毛泽东为陇东中学题写的校名。

[1] 1940年9月陇东中学成立时，毛泽东亲自为其题写校名。

集中全力整训部队^[1]

(1940年9月2日)

应集中全力整训部队。准备好独立打击进攻者的条件。而整训部队是第一个条件。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整训部队问题致刘少奇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目前时局致周恩来电^[1]

(1940年9月5日)

目前时局甚为紧急，我党应有保卫重庆、保卫西南和西北的积极主张。军事上，应摆出八路军以三分之一开赴湖北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新四军不能北移。此不仅是抵制蒋介石对我之压迫，而主要是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

[1] 这是毛泽东致已回到重庆的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经学问题给范文澜^[1]的信

(1940年9月5日)

文澜同志：

提纲^[2]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3]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4]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1]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

[2] 指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 康、梁、章、胡，指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他们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 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吴虞（1871—1949），四川新繁（今属新都）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家。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致以

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毛泽东致范文澜的信封。

文澜同志：

范君说，你当然，说研究古史，中
有矛盾，因为用古史来解释历史是致
一也，因为用新史学来解释历史是
在史学上有所谓，用新史学来解释
历史是致一也，对正一论中有所谓
的。有一次讲古史，你没有提
到，不知对古史研究，你有什么

所批判否？不知你对唐平天侯崇德
等人否？越对这些古人有所批判，
越对古史研究有所批判。

你对历史研究，说研究
古史，说研究古史，说研究古史。
敬祝！

毛泽东
九月二日

毛泽东致范文澜信的手稿。

关于调查地主资产阶级 和国民党军官的通知

(1940年9月6日)

恩来、剑英、克农、漱石^[1]：

甲、将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以人为单位，每类每省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乙、大资产阶级是带买办性的，与外国资本有联系，大银行、大商业及与外国资本联系的大工业属之，他们是现时主要当权者，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虞洽卿等是。

丙、民族资产阶级是受大资产阶级统制，与外国资本联系少，现时还基本上没有政权，主张团结抗战的，如陈光甫、穆藕初、康心如、范旭东等是。

丁、将大地主与开明绅士加以区别，亦以人为单位每类调查数十人至一百人。

戊、分省调查，请恩来负责调查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五省，克农负责调查广西、广东、福建三省及香港，小姚负责调

[1] 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八路军参谋长。克农，即李克农（1899—1962），安徽巢县（今属巢湖市）人，当时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漱石，即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查江西、浙江、安徽、江苏四省及上海。克农、小姚的材料限于十二月一日以前托人带交恩来带来延安，给七大用。

己、每人为立一小传，要有籍贯、年龄、出身、履历、派别、资产活动、嗜好、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庚、关于军官调查，总司令、军长、师长、团长四项，每人立一小传，传内亦有履历、派别、资产活动、政治动向、对我态度等项。

辛、以上调查统称名人录，先从经济、军事两方着手，将来可发展到政治、文化方面。

毛

九月六日

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1]

(1940年9月10日)

目前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况，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前夜，我党对于这种变化，必须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国际方面，帝国主义战争带有扩大、持久与准备决战的性质，抗日的中国则将成为帝国主义者双方争夺的对象。国内方面，是三种势力及三种可能性之间的激烈斗争时期，顽固派要求维持现状，投降派准备组织贝当政府，进步派与中间派则要求亲苏、和共与政治改良。第三种可能性的实现，即是中国时局的初步好转。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将是日益不利于顽固派，而日益有利于进步派与中间派。党内对于时局的悲观估计与不耐烦情绪，显然是不正确的。我们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一方面准备迎接时局好转，一方面又准备对付投降派的突然事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趋向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9月11日)

应补充现在中国处在大事变的前夜。目前时局趋势有三个方向，一是维持现状，使抗战有利于大资产阶级；二是进步，在不损害大资产阶级利益前提下，对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部分的让步；三是投降，在重庆失守后中国将变为南北朝，会产生中国的贝当式的投降政府与汪精卫合流。我们的方针，是团结与争取进步派、中间派，分化顽固派，争取可能变化的顽固派，反对投降派，以争取时局的初步好转，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的实现，再争取时局的彻底好转，即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同时，我们必须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组织上准备可能到来的突然事变，使我们在任何可能变化条件下都能应付。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复叶挺、项英电^[1]

(1940年9月11日)

在苏北防战条件及地理远隔条件下，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进攻，而于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八路军苏北各部，既分散又复杂，不宜变动指挥关系，皖东亦归中原局指挥为宜，陈毅可改归你们直接指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叶、项9月9日来电中提出的目前在苏北的新四军各部及八路军一部在军事行动上暂时统一于新四军军部指挥的问题复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为《抗战日报》题写报头^[1]

(1940年9月18日)

抗战日报



毛泽东为《抗战日报》题写的报头。

[1] 《抗战日报》是抗战时期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创办的一份“忠实地指导与记录鲁西北的抗日战史”的报纸。毛泽东曾为该报题写报头。该报于1940年9月18日在山西兴县石楞子村正式创刊，这是中共晋西区党委机关报，1946年7月1日改名为《晋绥日报》。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给侵华日军极大的打击。图为彭德怀在前线指挥。

关于蒋桂在华中的军事动态 及我之对策致彭德怀等电

(1940年9月19日)

(一) 据西安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韩，有渡淮河向碭山前进讯。桂军攻皖东者除一三八师及李本一部共七个团外，又增加一七二师，汤恩伯大概是总预备队，现派三个团组成三个侦察支队，下月初向豫东皖西之太和、阜阳、潢城前进，主力在豫西整训，准备东进，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

(二) 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左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罗令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关于对付蒋桂军攻击之部署 致叶挺等电

(1940年9月22日)

(一) 桂军五个师，李仙洲三个师，周岩三个师，已集中皖西一带，桂军一个师已越过淮南路东，汤恩伯九个师连日由鄂开豫，已在南阳集中，不日东进，估计各军全部开至新黄河淮南路一带进攻出发地，并开始向我彭雪枫、张云逸攻击之时间约在下月中旬左右，那时我除令彭雪枫、张云逸以游击战争暂时支持皖东与淮北两地外，我苏北主力即须动手解决韩德勤。

(二) 皖南部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形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9月25日)

各个根据地的中心问题，都是经济问题。整个经济工作要实行自给的原则，边区要实行六万五千人的自给，要把经济建设当作党与民众团体整个工作的中心，边区党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今年公粮以决定征收九万担为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在革命战争时期，不能机械地执行工人八小时工作制，不能无条件地增加工资。官富民富是对的，但在党员中不要提发展私人经济的口号。在党内反对贪污腐化，反对发财思想是对的。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9月30日)

陈毅、黄克诚部在苏北运河以东地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不仅扩大主力，并应建立无数的小游击队，建立新政权，这样才能击破韩德勤。同时对韩德勤部中下层及苏北各顽军与地方人士，应广泛开展联络工作，争取同盟者，孤立韩德勤。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并告叶挺、项英、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挽徐谦先生联^[1]

(1940年9月)

存亡攸关，抗战赖持久，而今正是新阶段；
死生同慨，团结须进步，岂能再抄旧文章。

[1] 1940年9月26日，主张抗战与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徐谦在香港病逝。毛泽东送了这副挽联。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清末进士，国民党元老。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主张国共合作。抗战期间，曾到南洋宣传抗日。

为延安清真寺题名^[1]

(1940年9月)

清真寺

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九月

毛泽东



毛泽东为延安清真寺题写的寺名。

[1] 1940年2月26日，延安回民救国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在延安建立清真寺，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同年3月，清真寺顺利竣工。1940年9月毛泽东应邀为延安清真寺题写了寺名。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0月3日)

韩德勤现又大举压迫陈毅。据陈毅称：战事不可避免，要求黄克诚增援。因此，我们部署方针：“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进攻韩德勤援助陈毅部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10月4日，反击韩德勤进攻的黄桥战役打响，6日战斗结束，此役歼灭韩德勤部1.1万余人。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0月5日)

三国同盟条约订立后战争会扩大。中国有可能利用帝国主义大战来解决中国民族战争的胜利问题。我们党的政策是进行独立自主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对付共同的敌人，但不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现在我们应加紧反对德意日同盟的宣传。关于参加国民参政会问题，发言指出，现在的国民参政会，是在大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多请一些客罢了，只有建议权、调查权、询问权，没有决议权，人员也增加很少。我们的态度仍是主张召集有全权的国民大会。

[1] 这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一事作分析时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 移动方向致叶挺等电

(1940年10月8日)

一、蒋令顾、韩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大江南北比较大的武装磨擦是可能的，主力战将在苏北与江南，韩进攻陈毅部队，被消灭二千余，另有顾、冷一师到江边还有北渡增援韩之模样，而李品仙等也可在策应，但是次要的方向。

二、最困难的是在皖南的战争与军部，我们意见军部应移动到三支地区，如顽军来攻不易长期抵抗时则北渡长江，如移苏南尚有可能，也可移苏南。向南深入黄山山脉游击，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是最不利的。决心移皖北，则四支应派一部到无为接应。

三、苏北以全力击退韩之进攻，解决韩部。对顽方之李品仙、何柱国等力求和缓，惟同时应注意日寇之扫荡，日寇有可能配合此磨擦，四处扫荡我华中地区。

四、苏南新四军部队，应以游击战争坚持原地区。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1]

(1940年10月9日)

胡服，陈毅，并告叶、项：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部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你们的部署与决心是完全正确的，国民党任何无理责难都不要理他。陈部大胜^[2]振我士气，寒彼贼胆。惟韩冷^[3]尚有余力，我须集结力量沉着作战。黄克诚南下^[4]增援是完全正当的。

毛 朱 王

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并告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指黄桥战役。1940年10月初，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26个团3万余兵力向驻泰兴县黄桥镇的新四军发动进攻，妄图消灭新四军苏北部队。新四军7000余人在陈毅、粟裕指挥下奋起还击，激战4天，把韩部击溃。此役共歼国民党顽军11000余人。

[3] 韩，指韩德勤。冷，指冷欣，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兼第六十三师师长。

[4]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里的南下，指黄克诚纵队由苏北淮海区南下阜宁、盐城，增援陈毅的行动。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1]

(1940年10月11日)

德怀，朱瑞，陈、罗：

目前方针是缓和磨擦，强调团结。除电胡服叶项^[2]缓和韩李^[3]关系外，山东方面亦应对沈秦^[4]缓和一下。只要沈秦各部没有向我进攻，我即不向彼等行动，双方维持现状，各守现有防地，仅在彼方进击时，我才反击之。请考虑电复。

毛 朱 王

十月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政治委员罗荣桓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韩，指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李，指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沈，指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山东游击总司令。秦，指秦启荣，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

关于留用俘虏官兵和大批收容知识分子 给陈毅等的指示

(1940年10月12日)

陈毅，并告叶、项、胡服、黄克诚：

(甲) 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加部队战斗力，下级俘虏军官亦应留一部分稍带革命精神者，其余官长一概优待释放，不杀一人（不论如何反动）。

(乙) 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开办大规模抗大分校，如有学生可收容四五千，并从上海招收学生开办财政经济人员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开办普通中学及师范学校（收容积极性不足而愿作教育工作之青年），开办党的训练班，为建设广大根据地之用。

(丙) 始终不提反韩口号，始终表示愿意团结抗战，停止磨擦。

毛 朱 王

新四军的行动方针^[1]

(1940年10月12日)

叶、项、胡服，陈毅，黄克诚^[2]：

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

甲、蒋^[3]在英美策动下可能加入英美战线，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曾生部队在东江失败^[4]就是明证。因此军部应乘此时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乙、省韩大败乞和^[5]，显系缓兵待援，此时黄克诚应以增援陈毅为理由，派部进至东台与陈部会合，而以主力占领兴化以北以东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等人的电报。

[2] 胡服，即刘少奇。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3] 蒋，指蒋介石。

[4] 1940年3月8日，中共领导的第四战区游击挺进纵队新编大队（大队长曾生）和第二大队（大队长王作尧）近700人，被国民党军第一八六师围于广东惠州坪山圩和乌石岩。被围部队秘密跳出包围圈后，分路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途中又遭顽军堵截，部队损失很大。4月，部队转移到海陆丰的高潭、鲛门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国民党的后方，部队不能公开活动，只能分散在丛林、山洞中，给养困难，医药缺乏。到七八月，部队减员至百余人。

[5] 黄桥战役后韩德勤委托开明士绅韩国钧等向新四军求和。

之广大地区（东台河以北归八路负责），迫韩放弃反我方针，承认我之抗日根据地，停止皖西进攻之师。而陈毅则不拒绝和议，一面整理扩大部队，扩大根据地，示我全为自卫不为己甚。我皖东部队，应速部署向西防御，坚持皖东根据地，一面向桂军呼吁，反对内战，强调团结对敌。皖东决不可失，如失皖东，则蒋介石必沿运河、淮河构筑封锁线，断我向西之前途。

毛 朱 王
文 申

致叶挺、项英等电^[1]

(1940年10月13日)

为对付日寇进攻，为巩固国内团结，华中磨擦在韩进攻失败后，应设法暂时缓和一下，采取完全自卫的方针。苏北韩失败后，我应加紧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与整训自己的部队，对韩不应进攻，而应在韩再向我进攻时，各个反攻击破之，否则会妨碍我在重庆之统一战线工作。但胡服建议控制旧黄河以南阜宁一带战略要地，是必要的，可执行。对李品仙应力求和解，这是有关桂系与我们的整个关系。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韩德勤进攻失败后华中的工作方针致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电^[1]

(1940年10月14日)

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注意苏北与皖东打成一片，不要使中间有间断。尊重李明杨、韩国钧等中立态度及其利益，注意收集蒋、顾、韩的反共证据（人证物证），注意收集知识分子，注意调节各阶层利益，实行政权中的“三三制”，预防“左”的危险，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建设苏北根据地等问题致陈毅并告刘少奇等电的主要内容。

和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

(1940年10月14日)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应再具体提出请其转陈国民党中央及顾祝同，下令：一、停止安徽向皖东进攻；二、撤退皖南对新四军的包围；三、撤退苏南对新四军的包围。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和国民党韩德勤部谈判条件问题致陈毅等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 参加根据地建设

(1940年10月14日)

胡服，陈毅，克诚^[1]，并告叶、项，雪枫^[2]：

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3]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麐、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

[1] 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

[3] 韩国钧（1857—1942），江苏泰县海安镇（今属海安县）人，开明绅士，曾多次参与调解国民党顽军同新四军苏北部队磨擦事件。李明扬，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1890—1956），江苏南京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

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1]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2]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

十四日

[1] 1940年10月初，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重兵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黄桥地区部队发动进攻，新四军一方面争取一部分友军保持中立，一方面实行自卫还击，歼灭韩部11000余人，这就是黄桥战役，也称苏北事件。

[2] 周，指周恩来。叶，指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

关于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问题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

(1940年10月14日)

恩来、剑英同志：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麋、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毛泽东

致陈毅、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0月15日)

同意周恩来当日致毛泽东电提出在苏北发展宜取自卫战的方针。不是彻底驱韩，只迫其放弃反共方针。

[1] 这是毛泽东致陈毅、刘少奇转黄克诚、罗炳辉并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防止执行政策时犯“左”倾错误

(1940年10月18日)

叶、项，胡服，陈毅，克诚（胡服转），雪枫，先念，并告彭，杨，刘、邓，杨、宋，陈、罗，朱瑞^[1]：

由于没有使中下级干部彻底了解，由于上级没有事先预防与及时检查，致使许多地方犯有极左错误，主要是在土地政策，劳动政策，财政政策，锄奸政策，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对待俘虏政策，对待国民党人员政策，以及我之政权组织上表现过左。其结果是缩小了我之社会基础，引起中间势力害怕，给日寇、汪逆与顽固派以争夺群众团聚反动力量的机会。待错误形成再去纠正，已使我们受到极大损失。现在华中工作正在发展（山东亦然），你们必须预防下级

[1]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杨，指杨秀峰（1897—1983），河北迁安人，当时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宋，指宋任穷（1909—2005），湖南浏阳人，当时任八路军冀南军区政治委员。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

执行政策时犯过左错误，你们必须懂得“左”倾错误是当前主要危险，必须及时检查下级工作，纠正过“左”行动，否则在敌人与顽固派的夹攻中要取得我党我军发展与巩固的伟大胜利，要长期坚持根据地，是不可能的。此事望你们尖锐地提起全党全军注意，切勿等闲视之。

中央书记处

十月十八日

对待反共派俘虏的政策^[1]

(1940年10月18日)

关于对待反共派俘虏问题，任何国内反共派向我进攻被我捕获之俘虏官兵、侦探人员、特务人员及叛徒分子，不论如何反动与罪大恶极，原则上一概不准杀害。这一政策是孤立与瓦解反共派的最好方法，应使全党全军从上至下有普遍深入的了解。其处置办法，凡反动分子及无用人员则优待释放之，凡可参加我军的士兵及有用人员则收留之，一律不准加以侮辱（如打骂及写悔过书等）或报复。如有关系紧要必须处决之个别分子，则须经过军中师以上及相当于师之机关，党内分局及区党委以上或各根据地最高政权机关之批准，旅以下、地委以下、专员以下没有批准杀人之权。关于此事之详细规定，中央另有通知，各地先照此一般规定通令实行。

中央书记处

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八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发给中共中央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地电台的电报。

致北方局等电^[1]

(1940年10月18日)

根据九月十五日彭真电所述冀南的土地政策，我们认为过左的，是违抗抗日统一战线原则的，业已造成了严重后果。晋东南及山东两地土地政策是否有过左错误，望北方局、山东分局及一一五师加以检查报告我们。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北方局、冀南区党委、晋冀鲁豫分局、第一二九师并告山东分局、第一一五师、中原局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1]

(1940年10月18日)

国民党有抄袭我办事处之可能，为慎防起见，望将一切秘密文件烧毁并随时准备对付抄袭，而以沉着态度出之，任何时候不要惊慌散乱。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八路军各办事处负责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10月20日)

必须保留兴化及韩德勤方有文章可做，否则我重庆办事处有被攻击危险。我军应在大邹庄以东、射阳以北、蚌延河以南停止，进行谈判。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减少我重庆办事处被攻击危险问题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与韩德勤等谈判的主要条件^[1]

(1940年10月23日)

目前我军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集中整训扩大与巩固苏北根据地致新四军电的主要内容。

致陈毅、粟裕电^[1]

(1940年10月24日)

关于军部北移与胡服会合、统一领导华中问题，我们已屡电叶、项，你们可去电催。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陈毅、粟裕电的主要内容。

对目前世界形势的估计 及对国民党可能进攻的对策^[1]

(1940年10月25日)

周：

甲、德意日不久必有大规模行动，德不攻英伦，即向非洲、印度，英国快到手忙脚乱之时。日本将取先占南洋^[2]后扫中国政策，香港、新加坡、仰光、荷印^[3]四地一旦落于日本之手，中国英美派又将手忙脚乱。美国准备未周，不一定很快作战，如德攻英伦，美海军便要同时对付大西洋，不能集中对付太平洋。日本进攻南洋各地时不一定便发生日美战争。那时重庆英美派将望着发干急，他们现在的兴高采烈，带着单相思性质。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是重庆英美派的志愿，但他们也怕英美不可靠。如日占南洋而日美战争又迟迟不爆发，英国又被德意日三国打得七零八落，他们仍有走贝当^[4]路线可能，故他们现在仍是动摇于英美路线与贝当路线之间，他们仍不敢过于得罪苏联，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大资

[1] 这是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

[2] 南洋，即东南亚。

[3] 荷印，指当时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印度尼西亚，又称“荷属东印度”。

[4] 贝当，1940年6月任法国总理。他的政府对德国法西斯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签订了《德法停战协定》，随后在维希组织傀儡政府，出任“元首”。

产阶级既是动摇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许多中间派也是动摇的。如果是这一种情况，我们大有文章可做。

乙、但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最黑暗的情况是日本对新加坡久攻不下，美海军控制新加坡，德攻英伦不下，中国英美派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危险就加大了，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的危险也更大了。还须假定这种情况，即美国海军集中力量打败日本海军，日本投降美国，日本陆军退出中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中国由日本殖民地变为美国殖民地，国共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最黑暗莫过如此。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是不怕的，原因是我党已经锻炼了，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百出，困难重重，世界革命必然会爆发，苏联是援助世界革命的。

丙、有一种中间情况，即日美相持不下，中日相持不下，国共相持不下，欧洲英德也相持不下，全世界全中国都是不痛不痒的。我们也要准备对付这种情况，我们也能够对付这种情况。

丁、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目前我们应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向国民党及中间派及广大人民说明贝当路线与英美路线两者的危险性，强调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说明目前的反共反苏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在国民党区域的党实行全部的完全的退却下来，各根据地上实行完全的自足自给（边区已有准备），再支持一年，世界形势就大变了，目前是准备待机时

期。(此电再发德怀、胡服、项英^[1])

毛泽东
有子

[1] 德怀，即彭德怀。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关于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准备应付 任何黑暗局面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0月25日)

一、德国仍在准备攻英伦，即使不攻英伦，但埃及、土耳其、阿拉伯、伊拉克必落入德军之手，日本必攻香港、新加坡、仰光及荷印，总之英国倒霉时期快到了，不论美国是否迅速参战，英国倒霉是定了的，美国迅速参战也无救于英国倒霉，因此中国英美派也是要倒霉的。

二、在日美战争紧张时，日本有放弃宜昌、武汉，让国共两党冲突对消对日力量之可能。

三、国民党现在发动的反苏反共新高潮，一方面是放弃独立战争参加英美同盟的准备步骤，其目的在为参加英美同盟肃清道路，好把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拉过去，一方面也有向日本示意的作用，国民党愿意替日本担负镇压中国民族革命的责任，以求交换日本对国民党的让步，同时又将加入英美同盟吓日本，以求日本的让步，故何应钦等反共活动，特别起劲，日本也正在拉蒋、何。

四、我们要准备蒋介石做戴高乐或做贝当，准备他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我们要准备对付最黑暗局面，而任何黑暗局面我们都是不怕的。

[1] 这是毛泽东为准备对付最黑暗的局面，再次致周恩来并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为《新文字报》题词^[1]

(1940年11月1日)

切实推行，愈广愈好。

[1] 《新文字报》是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会刊，后归边区政府教育厅领导，1940年11月在延安创刊。这是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报》写的题词。

关于目前时局的指示^[1]

(1940年11月1日)

贺、关，聂、彭，吕、程，刘、邓，陈、罗，黎、罗，陈毅，克诚，雪枫，先念，萧克，云逸：

关于目前时局：

(一) 一个月来英美与日德意在中国的斗争是异常激烈的，后者要求中国政府放弃中日战争加入日德意同盟，前者要求中国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目前这一斗争已到白热化，蒋介石态度也因之大变。

(二) 英国的开放滇缅路，美国的借款与撤侨，都向中国表示英美的反日决心，要求中国不跑到德日意路线，而英美两使坐镇重庆，紧紧拉住蒋介石不让跑掉。

(三) 运城、鄂北两机场的停闭，阿部的回国，南宁龙州的撤兵，海通讯社在重庆正式开设，则是表示日本让步，与德国劝和的开端，这种趋势有急转直下可能。

(四) 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联盟，一方面准备加入日德意联盟。如果日美战争能早日爆发并有胜利把握，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时局问题给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刘伯承、邓小平、陈光、罗荣桓、黎玉、罗舜初、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萧克、张云逸的电报。

他是愿意加入英美同盟的，一个月来他已用日德意同盟的声势，不久他还会利用日本向他的让步，向英美再敲一笔竹杠。

(五) 如果带决战性质的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日意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十有八九），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日德意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洋财，他是愿意投降日本的。蒋介石走这条路可能性最大。

(六) 目前的反苏反共新高潮，是放弃独立战争加入英美同盟的准备，但尤其是放弃抗日战争投降日本与加入德意日同盟的准备，我们不要被蒋介石的宣传所迷惑，他的联合英美是宣传，投降日本则是实际。

(七) 因为要日本让步须用威迫利诱两个政策，所以蒋介石一方面装腔作势地要加入英美同盟，以威迫之；一面又发动反共高潮以利诱之。蒋介石知道日本南进须要一个巩固的后方，一个“太平”的中国，而共产党今天已成了破坏日本这个后方的最严重的因素，于是蒋介石表示愿意替日本担负巩固后方的职务，以求得日本对他的让步。同时欧洲德意需要交换亚洲的资源，蒋介石反共于德意也有利益。故此次反共高潮主要是准备投降日本与德意的步骤。

(八) 在七八月间蒋介石准备于重庆失守时迁都天水，准备亲苏和共与某些政治改良，至九月已动摇，至十月乃大变，这是德日意同盟与英美对日积极化的结果。

(九) 但苏联出面调整中日关系的可能性仍是有的，中国要争得比较法国优胜的地位，只有苏联出面调整与我们坚持努力才有可能。

(十) 但无论那一种局面，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免的，蒋介石不论投降日德意或投降英美，均给我党以大的打击，用武力驱逐新四军八路军于老黄河以北而严密封锁之，这一计划是下了决心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十一) 但不管怎样严重局面，我们是能够冲破的，这种信心应在全党建设起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华北华中各根据地，一方面要打破蒋介石的进攻，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严重局面，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的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十二) 你们意见如何，望告。

毛泽东

东亥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1日)

对何白“皓电”则尚须迟几天拟复，因“皓电”是哀的美敦书，我们态度须恰当，并无置之不理之说。根本问题是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目前有两个方案：（甲）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乙）政治与军事上同时进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1]

(1940年11月1日)

(甲) 蒋介石已通知我们应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将在华中与山东新四军、八路军一律开至华北。近日蒋又令汤恩伯、李品仙各率部立开豫皖，准备期满后向华中进攻，皖南、鄂中亦必有进攻布置。(乙) 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材，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要。

[1] 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发出加紧准备粉碎蒋介石严重进攻的指示。这是该指示电的主要内容。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叶、项：

(甲)三十日电悉。要求顾祝同划郎溪、广德、溧阳、溧水、金坛、宜兴六县为我防地，并保证移动时沿途的安全，你们可答应移苏南。如顾不同意，可求希夷先生去苏北一行。(乙)皖南各友军中联络工作应大大发展。这对于你们今天有特别严重的意义和作用，你们在这方面的成绩是不大的。

毛 朱 王

二十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的复电。

致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叶挺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1]

(1940年11月1日)

据重庆确息，蒋介石已在积极准备十一月中旬开始“剿共”。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八路军、新四军各部电的主要内容。

致项英电^[1]

(1940年11月1日)

(一) 希夷及一部工作人员必须过江北指挥江北大部队。(二) 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江北，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这一点可以确定。(三) 如移苏南须得顾祝同许可，如顾不许可则只好留皖南（因据来电直过皖北已无可能），但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蒋介石“进剿”新四军的计划是决定了的）。望考虑电复。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 及我之部署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2日)

恩来：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今日会议讨论你一日建议，仍主表面和缓，实际抵抗，宣言决定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让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对时局宣言，虽已有基本估计并已拟好决定，但尚须看一看日苏谈判^[2]与美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反共形势的分析以及我军的军事部署给周恩来的电报。

[2] 1940年7月，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时局处理要纲》，欲乘纳粹德国横扫欧洲，英、法败退之机，武力南进，为避免南北两线作战，决定大幅度调整对苏关系。苏联为加强西线战备，也希望改善日苏关系。1940年12月日本驻苏大使建川美次奉命向苏联表明订立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图，但苏联只同意订立日苏中立条约。1941年3月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访问德国，4月归国途经莫斯科，7日与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展开缔约谈判。13日双方订立《日苏中立条约》。

国大选^[1]后形势，看一看日蒋关系的发展才能决定发表。关于南方布置及宣传反驳诸项，各同志均同意你及南局意见，毫无异议。关于华中、华北的军事布置，小的不日开始调动，大的（准备调十五万）正在与老彭协商，亦宜慢慢办，不甚性急。此次蒋介石如果投降，必然是四分五裂，我们有五十万军队，有全国人心，虽有无穷困难，是能打得开局面的。关于汤、李进攻，我们决不能听其封锁住，必须打到反共军后方去，这一点是书记处各同志一致意见，你们意见如何，盼告。

毛泽东

二日

[1] 11月5日，美国大选即将开始，决定掌握美国今后4年政权的白宫主人。就目前国际的形势来说，罗斯福总统和威尔逊总统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的人物，他象征着今天美国的全部外交政策，他竞选的成功和失败，多少足以反映美国统治层对于干预欧洲战争的新意向——前进一步或后退一步。英国要求罗斯福总统连任，轴心国家反对罗斯福。

关于国内形势和应付投降、 力争时局好转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潘友新^[2]意见是对的，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惟目前是一回事，将来又是一回事。依客观估计，蒋将来靠英美的可能小，靠德日的可能大，因德日的压力与引力都是很大的，压力是断血管，打重庆，引力是交还失地，在大战中发财与联合剿共。而英美在两年内是无能为力，蒋是等不到两年的。两年外英美亦无绝对胜利把握，有可能双方成相持局面，打上两三年没有最后胜负，待革命出来结果他们。也有可能英帝国相当迅速的被打败，旧大陆尽被德意日占领，美感孤立，望洋兴叹，要待旧大陆革命起来时，美以干涉革命的姿态向欧亚进攻。总之一二年内蒋介石是无法依靠英美胜利的。只有共产党、中国人民（包括各中间派及陈诚、汤恩伯等）再加上苏联的压力，才能制止蒋集团的投降。如果这三种压力配合得好，这种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还有这种时间。蒋介石最怕的是内乱，是苏联，故我们可以这点欺负他，他要“剿共”，我们一定要反“剿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国内形势、如何应付投降以及如何力争时局好转等问题给周恩来的电报。

[2] 潘友新，当时任苏联驻华大使。

共”。如果我们在反对内战口号下不怕内战，待他的“剿共军”前进时出十五万精兵（以三十万支持各根据地），抄到他后方，打几个大胜仗，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清君侧），撤退“剿共军”，继续抗战国策，恢复国内和平，实行三民主义，改革政治机构，给人民以抗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召集国民大会等条件（大体如张、杨之八条^{〔1〕}）。如果那时日本已经南进，美日关系紧张，日本自顾不暇，如果那时国内各中间派及国民党中的中间势力出来加以赞助（组织劝和团、隔断火线等）。如果那时国内及蒋集团内某些人乘机造反，非不利于蒋之活动（这些人现在是劝蒋反共，其目的在造出乱子，置蒋于炉火之上，以图乘机取蒋自代，如何、白皆是）。如果那时苏联又出来调整一番，这种好转是有可能的，恐怕中国的真正好转要在那时也说不定，这是生产经过阵痛的道理。但那时也有蒋介石做贝当并最后做汪精卫之可能，那就是最后大决裂，此种可能性也许还要大些也难说。但彼既组织“剿共军”，我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当然不能让他筑好十道八道西起宁夏东至海滨的纵深重层封锁线（新的万里长城），让他把我们放在日蒋夹击消灭中而毫不动手动脚。故在“剿共军”前进时，我们势必打出去，以期转变局势，争取好转。如果那时蒋做了贝当，便证明我们正是打得对，我们便把清君侧（或兵谏）的旗帜改换为打汉奸的旗帜，一直打到底，这就是取肉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过去与现在的反磨擦战争也是这种性

〔1〕 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条要求。这八条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质)。惟我们应做得仁至义尽，目前极力延缓汤恩伯、李品仙的行动，答应皖南部队北开，答应和平解决，呼吁避免内战，采取缓和态度，都是对的，必要的。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但炸弹宣言与兵谏出师两件事的时机要抓得很紧很稳，鲁莽不得，错误不得，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地应付之。略陈管见，请加考虑。

关于反对蒋介石投降 致李克农等电^[1]

(1940年11月3日)

反对蒋介石直接投降是目前全国的中心任务。加强反投降宣传，迅速动员各方面给舆论，呼吁停止内战；加紧统战工作，尤要向粤桂军队说明反共和投降是一回事，要他们不要上蒋介石的当；速告各方准备对付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全党应完全地、有秩序地退却下来；东南方面也要这样办。

[1] 这是毛泽东致李克农、项英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1]

(1940年11月3日)

德怀同志：

甲、目前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所谓联合英美抗日，只是蒋介石的烟幕弹。蒋已令汤恩伯^[2]率十万人向皖东北进攻，李品仙^[3]率五万人向皖东进攻。判断其计划，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纵深封锁线（边区周围的封锁线是五道），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中日妥协与日蒋联合“剿共”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着。虽然还有其他可能性，但投降可能是主要的，目前作此种估计，甚为必要。

乙、目前中心问题是反对投降反共的具体策略问题。现有两个方案：第一、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即对反共军进攻只在我之根据地附近加以反击，我军不打入彼后方，待蒋投降面目为全国了解时，再向彼后方反攻。如采此方案，则目前我调五万人南下即够，我主力仍坚持各抗日阵地。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有利的，即可以剥夺蒋的政治借口。但在政治的另一个方面是不

[1] 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的电报。

[2]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3]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利的，即不能以实力制止投降。在军事上是不利的，因为待蒋纵深重层封锁线完全成功后，我军必遭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第二、政治上进攻，军事也是进攻。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如采此方案，则在政治的一个方面是不利的，因为给蒋以政治资本。在政治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有利，因为可能制止投降（但不一定）。在军事上是有利的，因为可制机先，避免最严重的日蒋夹击（夹击是不可避免的，但严重性可减少）。

丙、不论目前采何方案，如投降实现，最后亦是严重的内战（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拟将全军区分为三个纵队，以老黄河以南各军为左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鄂豫陕边。以汾离路、正太路^[1]、沧石路以北各军为右纵队，其精锐约五万，准备出陕甘川边。以两地之间各军为中央纵队，其精锐约五万，或出左纵队方向，或出右纵队方向，依将来情况决定。

丁、此时我们具体策略适当与否，关系将来前途甚大，故有周密考虑必要。望以你的意见见告，以便讨论（朱总^[2]近日去绥德）。

毛 王

江辰

[1] 正太路，指正定至太原的铁路，即今石太线。

[2] 朱总，指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3日)

叶、项：

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你们有何意见，盼立复。

毛 朱 王

三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甲) 冬酉电^[2]悉，所见甚是，望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博古、凯丰即回。(乙) 我们的炸弹宣言，已决定缓发，待时机成熟时发，并先得你的同意。复何、白电，亦推至十号左右，惟此电内容决取缓和态度，在彼方没有动兵以前，一切对外表示，均取缓和态度，不必着忙。(丙) 军事方面正在部署。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1月2日，周恩来、秦邦宪等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东电刚到，根据中央判断，决策既定，我们即遵照电示，向一切紧张布置。惟既准备决裂，即需顾及外间疏散隐蔽需时，中央宣言及回何、白复电，均请缓发，以免打草惊蛇，使各方受到不可能避免的袭击，同时我们并争取最后可能。先派博古、凯丰乘飞机到兰州转延安，一切如何，请立复。”

致刘少奇电^[1]

(1940年11月3日)

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

在此次反共高潮中，甚至以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与蒋介石并不表示决裂，而提出请求撤惩何应钦，坚持抗战国策，撤退反共军，给人民以自由，释放抗日政治犯，恢复国内和平，召开国民大会等条件。

惟你们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3日)

我们亦判断蒋目前还处在三角交叉点上^[2]，对德日谈判，目前还在讨价还价中。

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踏陈独秀的覆辙了。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1940年11月1日，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三国协定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
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

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1]

(1940年11月4日)

彭德怀已令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一旅（三个团）即日南下，又令第三四四旅（三个团）克服困难，迅速通过陇海路。要你仍在原地等候，以便指挥部队。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动员一切力量进行争取友军工作

(1940年11月4日)

叶、项，胡服，云逸，陈毅，克诚，雪枫，先念^[1]：

甲、根据华北（朱怀冰^[2]三个师打八路军时，由于我们火线上的统战工作，其中一个师守中立）、陕甘宁边区（保安队和我们交战时，由于我们的联络工作，预三师^[3]在旁边观望不动）和苏北黄桥^[4]（由于陈毅统战工作的结果，两李^[5]及陈泰运^[6]严守中立）等反磨擦战斗的经验，在反磨擦的武装斗争中，加紧争取友军对我同情或严守中立的工作，不但有很大的意义，而且有很大的可能。

[1]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1892—1974），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陈毅，当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3] 预三师，指陈鞠旅任师长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预备第三师。

[4] 指黄桥战役，又称苏北事件。

[5] 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区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6] 陈泰运，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北游击纵队司令。

乙、在今天华中的条件下，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较我军占优势，另一方面在那里聚集着各种不同系统的地方军和杂牌军。如果由于我们努力争取友军工作的结果，使在汤恩伯、李品仙^[1]等部向我进攻时，不仅有许多杂牌军采取中立或发生对我同情的实际行动，而且即在汤、李所部中亦发生一部分人反对内战同情我军的运动，则不仅对我华中反磨擦的武装斗争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同时将给予全国反共投降阴谋以严重的打击，因此立即动员一切可能的党政军民力量去进行争取友军工作，成为你们今天最中心任务之一。

丙、立即选派得力代表携带毛、朱^[2]（有些对象亦可用周、彭^[3]等名义）恳切函件，加上你们自己的联络信件，向周围各友军进行交友工作。如我们直接派代表不便的地方，可请托地方士绅、名流、文化人，以及一切与各友军有亲友、同乡、同学、同宗关系的人等，代我们去疏通联络，向各友军详细解释苏北事件之真相及新四军、八路军不能开赴老黄河以北的苦衷和理由，向他们诚恳说明大敌当前团结御侮之必要，以及分裂、内战足以招致亡国之危险，求得他们不参加反共战争，或他们为敷衍命令计而打仗朝天放枪等。同时，对各种不同的友军，除宣传抗战团结大道理外，必须强调与他们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例如：对川军须特别强调八路军、新四军与川军之友谊，强调蒋介石侵占四川和消灭川军之阴谋；对东北军强调八路军与东北军之传统友好关系，强调对张汉卿及东北军

[1]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2] 毛，指毛泽东。朱，指朱德。

[3] 周，指周恩来。彭，指彭德怀，当时任八路军副总司令。

处境的同情，强调对某方^[1]承认伪满作为投降的第一个条件的愤激情绪；对冯治安、孙连仲^[2]等强调我们与他们团结抗战，共患难同祸福的必要等等。总而言之，使地方军、杂牌军为本身利益打算，懂得不上蒋^[3]的当，而避免与我们作鹬蚌之争。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与五路^[4]之多年友谊，不应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与八路之机会。对汤恩伯及其部下亦须采友好争取态度，以促使其内部分化。

丁、根据各方面经验，“抗战到底，团结到底”“大敌当前，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一切中国的同胞、中国友军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中国人自相残杀”等口号，仍是思想上瓦解反共军队和争取友军对我同情的有力武器。如发生磨擦战争时，望将这些口号，在我军驻地周围及友军驻扎境内，到处书写和张贴，尤其要设法动员民众和同情分子在汤恩伯、李品仙等部所经过的一切地带，遍贴遍写这类标语口号。当汤、李部队开近我防区周围时，发动大规模的联欢运动，即在战斗行动开始后，亦不要放松火线上呼团结抗日口号及部分谈判妥协的工作。同时，对汉奸部队或顽军等，这类口号切忌乱用，根据过去经验，乱用这类口号，反足增加反共军之反感和团结。

[1] 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

[2] 冯治安，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3] 蒋，指蒋介石。

[4] 1938年1月国民党政府以桂系李宗仁的第五路军组成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属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曾驻守大别山。同年新四军第四支队（不少干部是从华北八路军调入的）进抵皖中后，曾与李品仙部建立过友好关系。因此这里把这段友好关系称作八路军与五路军的友谊。

戊、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

毛 朱 王^[1]

支日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5日)

关于皖南部队北移等事，请向何、白及各方表示，我方为避免内战，顾全大局，新四军皖南部队将遵令北移，但在未渡江以前尚有许多事要办，桂林办事处尚须保留。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复何白电内容要点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6日)

复何白电稿已拟好。首言“皓电”奉悉，以事关重大，处于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际，为顾全大局挽救危机起见，经德等往返电商，已获一致意见，兹特呈复，并求转呈统帅，核示祇遵。以下分为：（甲）关于行动者；（乙）关于防地者；（丙）关于编制者；（丁）关于补给者；（戊）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共五项。在甲项中说明本军一贯以遵从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略述过去经历。末述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发生齟齬事件，如尊电所指者，亦属事实，言之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曾经历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已有马电详陈，鲁南事件，原因复杂深堪注意，除令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请求派员彻查。在乙项中略谓中央意旨，惟有服从，但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保卫家乡而组织者，欲其远离，甚难说服，故请恩来转呈中央，可否以主力北移，而置地方部队于原地。兹奉电示，限期移动，仍请中央于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二者略为兼顾，除原有主力外，再将地方部队之较为集中者，苦心说服遵令北移，仍请宽以期限，以期说服生效，不致激生他故。在丙项中，说明敌后抗战不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答复何应钦、白崇禧“皓电”的电文内容要点给周恩来的电报。

得已而扩大部队之原因，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一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请求扩充编制，中央亦已顾事实于提示案内允予扩编，惟求早日实现，以安军心。在丁项中，略述已十四个月未领子弹医药，请求补给等事。最后在戊项中，略述现当太平洋战机日紧，正抗战千载一时之机，惟闻日本诱降，德国劝和，甚为迫切，国内一部人士又复策动反共高潮，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德等效命疆场，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惟求抗战团结，不招投降分裂之祸，请求转陈采纳等语。有何意见，请速示知，以便修改于日内拍发。

关于动员党内外一切力量 制止剿共降日的指示

(1940年11月6日)

克农、项英、董老，并告恩来并转告各方：

目前日、德与亲日、亲德派包围蒋，压迫蒋发动反共战争，投降日寇，我们应向国民党人员及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说明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蒋崩溃，有百害无一利。应动员党内外多数人员出马作上述积极、热烈的活动。说话时不要骂蒋骂国民党，只骂亲日派，要求大家注意自己的存亡问题。我们共产党爱护蒋、爱护抗战与团结，只要不剿共、不投降，等到因剿共、投降而闹到亡党亡国之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要告诉党员与一切抗日人员，只要大家团结与积极活动，制止剿共、投降还有可能性，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各地情形望告中央为盼。

毛泽东

鱼辰

关于加强国内外联络 以制止投降分裂致周恩来电

(1940年11月6日)

恩来同志：

江电所示重要情报今晨才阅悉。蒋加入英美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利，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因为他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根据三日来电，如能由上述四种势力的联合与配合好转可能性还是有的。剿共则亡党亡国，投降则日寇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蒋崩溃，请你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是否于适当时机请求见蒋面陈一次，亦请你考虑。向各方活动，应动员多数人员出马（党的、非党的）。蒋夫人处的活动值得注意，桂林方面请告克农亦如此办。

毛泽东
鱼辰

军政委员会条例（草案）^[1]

（1940年11月7日）

彭，杨，罗、陆、左：

下列文件请你们讨论提出意见，以便最后宣布。

（一）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有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体指挥。

（二）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的机关。

（三）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及次一级的主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九人至十人，由每级提出意见而经上级指定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地由政委担任之。

（四）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商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例如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应交司令部执行，关于政治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给彭德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副主任陆定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电报。《军政委员会条例》于1941年2月7日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

工作的决定，应交政治部执行等。军政委员会亦应讨论比较重大问题，把一切琐碎细小问题提交军政委员会讨论是错误的。

（五）军政委员会应批准干部之升迁与调动，但关于党员的处分与入党批准等等事宜，仍由党务委员会讨论决定之。

（六）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用军政委员会的名义下达，而应根据决定之性质分别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用命令下达之。下级对上级报告亦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而应由各部门分别向上报告。

（七）军政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如遇争论而不能解决，应呈报上级决定之。但关于紧急问题，司令员及政委仍有独断专行之权，但应将各种不同意见报告上级。

（八）各级军政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至多二次，不得无故不召集开会。

（九）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认为一切均应经过军政委员会的虚伪的民主情绪是错误的，应当防止与纠正。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减弱个人负责制。

（十）本条例解说及修改之权，属于中央军委。

（十一）本条例经中央书记处之批准。

毛 朱 王
虞

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1940年11月7日)

(一) 日本正在积极引诱中国投降。德使陶德曼已有电报致中国当局实行劝和，国内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正在积极活动，包围与压迫中国当局，发动内战，实行投降。日本与亲日派之目的，在于引起中国分裂，使国共两党互相火并，两败俱亡，以便彼等坐收渔人之利。时局危机极端严重，全党必须动员起来，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二) 迅速动员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用口头、文字、图画、书信、电报及一切可能方法，直接间接向政治当局，向国民党、向军队、向各党各派各界，诚恳积极的说明：剿共就会亡党亡国，投降必使中国四分五裂，必使抗日军瓦解，必使抗战统帅身败名裂，必使全国人民陷入牛马奴隶的境地。这些正是日本的诡计。正是亲日派阴谋家与内战挑拨者的诡计，我们万万不要中此诡计。鹬蚌相争，只使渔人得利，枪口对内，只使亲痛仇快。我们共产党始终爱护蒋、爱护国民党、爱护友军、爱护一切抗日党派团体人员。所要求者只是坚持抗战团结，不投降，不分裂，不内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实行我党中央今年七七宣言中的一切宣示及历来统一战线方针，愿与国民党及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到底。如果他们一时不慎，陷入敌人圈套，闹到亡党亡国，我们就爱莫能助了。对于亲日

派与内战挑拨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与全国人民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一切抗日朋友，则始终爱护。今当存亡危机之时，我们不得不尽忠告之道。同时，要求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积极注意最近河南方面有二十万军队向八路军新四军前进，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大家应要求政府制止这些军事行动，制止内战的爆发。

(三) 党内外积极分子作宣传时，应当注意自己的态度。不要骂蒋，不要骂国民党，不要骂中央军与黄埔系，不要骂杂牌军，不要骂三青团与复兴社，也不要骂英美与英美派（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加入英美集团，因为它是帝国主义战争集团，但这不是目前斗争的中心），而要集中一切注意力痛骂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强调日本的诱降阴谋，响亮地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提出枪口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制止投降制止内战，驱逐亲日派的口号。我们态度要诚恳积极热烈，尽一切可能，到处奔走呼号，不惜舌敝唇焦，表现自己是一个团结全民捍卫民族的爱国志士与忠心朋友。当此紧张时机，全党中心任务是反对投降与内战，我们过去对于顽固派斗争的火力，现在主要的要转移到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身上，以此为中心而痛击之。如果亲日派与内战挑拨者被击破，顽固派要投降就比较困难了。

(四) 谁是具体的亲日派阴谋家及内战挑拨者，应依据各地具体证据去决定。而其全国性的领袖，就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集团。这一集团与日本及汪精卫秘密联系着，目前正在包围蒋介石，劝诱蒋介石下剿共命令与调动剿共军队。这一集团的目的，是在执行日本命令，挑起国共战争，使日本军队能从中国泥潭中拔出，好去对付英美。而中国一经内战，势必实行投降。但要全国投降，必须拖蒋下水。于是亲日派从拥护蒋之反共政策着手，极力助蒋反

共。他们以为反共战争一经爆发，便把蒋置于炉火之上，下不得台，投降就可实现。然后要求日本把蒋踢开，自己充当中国的贝当。这就是何应钦等的全部阴谋。因此也就可知蒋及蒋系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由反共而走到投降的极大危险性。这是蒋的主要危险，我们应当十分警戒，绝对不可疏忽，以免上他的当。但就目前而论，蒋还站在国际三大阵线中国三条道路（或者投降，或者加入英美集团，或者继续独立战争）的交叉点上，还未下作贝当的决心，因此我们还要争取他，以期延长抗日的日子，那怕是很短的时间也好。目前最危险的，是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及内战挑拨者。全党应向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从口头上揭穿何应钦等的巨大阴谋，用各种方法宣布何应钦等的罪状，俾众周知，深恶痛绝，仅仅暂时避免在公开文字上提出何应钦的名字。

（五）必须积极加紧统一战线工作。要进到更加具体化，不失一个机会去联络每一个可能的具体对象。要研究如何接近与如何同每一个具体对象协同进行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要求不要过高，那怕只有一二点微小的口头协定都是有用的。要每日每时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要精密分析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各个人的具体情况，看出其中的矛盾与可能性。不要只看见漆黑一团，闭门不纳，望而却步，这些都是不对的。

（六）对于国民党区域的党的一切组织，必须遵照中央历次指示，全部的完全的有秩序的隐蔽起来，并准备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任何地方，都要严防突然事变的袭击，要经得起这种袭击。

（七）关于我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必须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

共战争，必须充分的准备着去粉碎日本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八) 又须告诉党内外一切积极分子与抗日人员，只要大家起来进行坚决的恰当的斗争，目前制止投降与内战，还是有可能的，还来得及，还有这种时间。因此我党及全国人民必须为制止投降与制止内战而奋斗。今天我党及全国人民多作一分反投降反内战的工作，即是明天多得一分胜利。时局的最后结果究竟如何，主要依靠我党的政策与工作来决定。

(九) 不管时局的发展如何，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与中国人民的。我党有五十万军队，有六十万党员，有全国人民广大的同情，有很多中间派还可作为我们的朋友或者守中立，有苏联伟大力量的赞助，有世界革命的酝酿，有帝国主义间空前紧张的矛盾，有敌人内部的严重困难，有亲日派与顽固派，顽固派与中间派，以及各派内部的严重矛盾，一切这些，都是我们有把握的来说，最后胜利必然属于中国与中国人民。不论时局如何黑暗，我党是有一切把握去最后战胜这些黑暗的。全世界与全中国的任何黑暗都是暂时的，只有依靠着自己坚决斗争与坚固团结的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才是最后的胜利者。这种信心，要在全党与全国人民中巩固地建设起来。党内外必然发生的一切悲观动摇情绪，必须予以坚决的克服。

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

(1940年11月9日)

重庆第十八集团军叶参谋长剑英即转何参谋总长敬之、白副参谋总长健生两公钧鉴：

两公皓（十月十九日）电^[2]，经叶参谋长转到奉悉。当以事关重大，处此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经德等往复电商，获得一致意见，兹特呈复，敬祈鉴察，并祈转呈统帅核示祇遵。

甲、关于行动者。职军所有部队，莫不以遵循国策服从命令坚持抗战为唯一之任务。四年以来，抗御众多之敌军，收复广大之失地，所有战绩，为国人所共见，亦为委座历次明令所嘉奖。即如此次华北百团大战，自八月号日^[3]开始以来，已历两月有半，现方进入第二阶段。曾奉委座明令，勩勉备至，全军感奋。又如皖东、皖南战役，粉碎敌之进攻，亦属最近期间之事。凡此所陈，非敢自矜劳绩，实欲以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

[1]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

[2] 指蒋介石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于1940年10月19日（皓）发出的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该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并根据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提示案”的精神，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內撤到黄河以北。

[3] 号日，即20日。

心，实贯彻于全军之上下，而未敢有丝毫之乖离也。其中一部分，曾与他军之一部分发生齟齬事件，如尊电所指者，言之至堪痛心。其发生之原因与消除之方策，德等早经迭次陈明在案。最近苏北事件，德等已有马^[1]电详陈委座。鲁南事件^[2]，亦有复杂原因，深堪注意。除令该地部队服从钧令、约束行动外，拟请中央选派公正大员，予以彻查，如属咎在职军，德等决不袒庇，愿受国家法律之处罚。如属咎在他方，亦祈按情处理，以明责任。古人有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事理之正，贵得其平。况在艰苦异常之敌后抗战，多一分磨擦，即多一分困难，自非不顾大局专以磨擦为能事之人，未有不愿消弭纷争团结对敌者。故德等主张彻底查明其是非曲直，期于永杜纠纷，以利抗战。倘承俯允，乞赐施行。

乙、关于防地者。中央提示案^[3]内所列办法，七八月间，经周恩来同志传达后，德等以中央意旨所在，唯有服从，而下属苦衷，亦宜上达。缘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为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委座庐山谈话^[4]及告

[1] 马，即21日。

[2] 鲁南事件，指1940年夏顽军沈鸿烈部在山东莱芜、沂源、蒙阴一带制造磨擦，进攻八路军根据地黄庄、基山，被八路军击退的事件。

[3] 指国民党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领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限制其防地；把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都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这一狭窄地区内。

[4]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1937年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其中声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沦陷区同胞书^[1]中所示，彼等又正衷心遵循，毫无违异。忽令离乡别井，驱迫上道，其事甚惨。自平江惨案、确山惨案^[2]发生后，新四军后方各处，如赣南、闽西、湘赣边区、鄂东、皖西、豫南等地，其家属及留守人员，横被摧残，毫无保障。今又欲华中各部北移，彼等甚惧覆辙相寻，故无不谈虎色变。又况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树叶为粮，道殍相望，该地军民已甚感维持之困难，有请南移者，有请他调者，德等方勉为抑止，告以苦撑，实亦甚难容纳其他之部队。以此种种，故请恩来转陈中央，请予允许大江南北各部，仍就原地抗战。一俟驱敌出国，抗战胜利，自当移动，以就集中之防地。兹奉电示，限期北移。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和协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

[1] 指蒋介石1938年8月13日发表的《告沦陷区同胞书》。其中说，抗战13个月来，已取得战略上、政略上、精神和外交上四个方面的胜利，要求沦陷区同胞坚守信念，不动摇，不畏怯，奋斗到最后一息。

[2] 平江惨案，指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奉蒋介石的密令，派兵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嘉义镇的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将副官罗梓铭等6人的事件。确山惨案，指1939年4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山东游击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指使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部，在博山、太和地区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包括团政治部主任鲍潭在内的八路军指战员400余人的事件。

远瞩，必不河汉斯言。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两公虚怀若谷，全局在胸，必能维持调护，挽此艰难之时局，固不待德等多言也。

丙、关于编制者。职军孤悬敌后，欲求杀敌致果，达成统帅所付之战略任务，不得不遵循三民主义与抗战建国纲领所示原则，唤起民众，组织游击部队，因而超过原来编制，此任务与组织之连带关系，实亦有所不得不然。然以现有五十万人之众，领四万五千人之饷，虽有巧妇，难以为炊，故不得不要求民众协助。因而于敌后凡有敌寇而无友军之处，于驱除敌寇之后，建立抗日政权，创造抗日根据地，以民众之衣粮，给民众之武力，御凶残之敌寇，卫自己之家乡，诚有未可厚非者。虽衣单食薄，艰难奋战，历尽人间之辛苦，然不为法律所承认，不为后方所援助，则精神痛苦，无以复加，故有请中央允予扩充编制之举。中央亦为顾全事实起见，允予酌为扩编，如提示案内所示，职军闻之，实深庆幸。兹所求者，则请早日实行，并请对编制额数，酌予增加，以慰前线将士之心，亦为国家培养一支可靠之抗战力量。非第楚弓楚得，无庸怀轩轾之心，实以卫国卫家，正赖此干城之选。

丁、关于补给者。敌后艰苦，具如上述，而子弹与医药用品等，尤为缺乏。职军已十四个月未蒙发给颗弹片药，有一枪仅余四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则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其自然。虽明知中央亦处艰难境地，然职军之特殊困难，不得不上达聪听，以求于艰难之中，获涓埃之助。其他补给各

项，均曾列款上陈，敬求一并核示。

戊、关于边区者。陕甘宁边区二十三县一案，悬而未决者四年于兹。近且沿边区之周遭，驻屯大军二十余万，发动民夫，修筑五道之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泾水，东迄河滨，绵亘数省，规模宏大，耗巨额之经费，筑万里之长城。而于远道北来之青年学生及军队往来人员，或被扣留暗杀，或被监禁于集中营。以此道路惊疑，纷纷揣测，不曰大举进攻，即曰准备妥协。德等闻之刺耳，辩之焦唇。良以悬案未决，又加封锁，空穴来风，猜疑易启，亦无怪其然也。理合恳请中央，对于悬案则予以解决，对于封锁则予以制止，释军民之疑虑，固合作之根基，实一举手一投足之劳耳。

己、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者。德等认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盖帝国主义战争扩大持久之形势已成，日寇正忙于应付太平洋严重局面，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在我最高领袖与中央政府领导之下，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惟德等鉴于近月以来，国际国内之各种阴谋活动，诚有不能已于言者。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劝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德等转战疆场，不惜肝脑涂地，苟利于国，万死不辞。所祈求者，惟在国内团结，不召分裂，继续抗战，不变国策。故于钧座所示各节，勉力遵行，而对部属弱点，则加紧克服。亦求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

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全国军民之心。复望改良政治，肃清贪污，调整民生，实行主义，俾抗战重心置于自力更生基础之上。此皆国家民族之成败所关，万世子孙之生命所系，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转呈委座，采择施行，无任屏营待命之至。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朱 德

副总司令 彭德怀

新四军军长 叶 挺

副军长 项 英同叩

佳

关于“佳电”发出后 各项工作的部署情况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9日)

(甲)“佳电”今日最后确定文字，已付译，明日可用战报台与有线电同时发你处，由你处转交何白，此间未直发，收到请校正错字。

(乙)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你处对外宣传，请强调免调各理由（电内已列举，祖宗坟墓一也，遵守蒋《告沦陷区同胞书》并无错误二也，家属无保障三也，华北五灾四也）。又“佳电”所你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亦请对外宣扬，以期停止彼之进攻。

(丙)叶希夷十日去上饶见顾，拟谈开拔费，军需补给，保证通过安全及到苏南稍作停留等条件。

(丁)李宗仁有将由桂赴立煌开会讯，如过重庆，请与开诚一谈。汤恩伯究否移动，正向洛阳方面调查，尚未得复，请在重庆调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佳电，即1940年11月9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答复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皓电”的电报。

查见告。汤之是否移动，乃蒋是否有决心进攻之表现，判断在我尚未复电表示态度前，汤或只作移动准备，尚未实行移动，故我应设法活动使其不动，请考虑可否对张冲表示，如汤东进则战事难免，皖南部队北移亦难免发生波折，我方均不负责任。可否以利害告二马等人，托其设法缓和汤、覃二军东开（覃连芳两师到商城、固始已半月，尚在休整，覃及张、林两师长均赴立煌开会）。

（戊）胡服已到盐城，正与克诚、陈毅开会，准备对付汤、覃进攻。他们计划，如汤、覃进攻，即将动手解决韩德勤，此亦蒋、顾利害问题，请考虑作适当表示，或亦可延缓其进攻。

关于在谈判中要求顾祝同停止 汤、覃两军东进问题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10日)

希夷见顾时，请要求顾电蒋停止汤恩伯、覃连芳两军东进，否则引起战事，由彼方负责。覃军两师已到商城、固始，覃及各师长均集立煌，计划攻皖东。汤军九个师在南阳准备东开，形势紧急。请质问顾，一面苏北言和，皖南令我北移，一面派二十万大军东进，是何用意，是否彼方已准备决裂。希夷谈判时，应以此项大局为第一位问题，其余都是第二位问题。

[1] 这是毛泽东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1940年11月11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去上饶和顾祝同谈判，商谈北撤事宜。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0年11月12日)

根据七日国民党中央所发第二十四号政治情报，足证彼方目前尚无投降与全面“剿共”的决心，我方反投降反内战的活动如果有力，制止投降、内战尚有可能性。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反投降制止内战等问题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1月12日)

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准备进攻新四军，一面却仍怕乱子闹大不好收拾。你们应向各方面放出空气，略谓华中方面有三十万大军（二十九个师）准备向新四军进攻，我们希望能停止出动，以免演成内战，两败俱伤，敌人获利。但如一定要打新四军，则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不救，那时乱子闹大，彼方应负其责。这种空气如放得适当，可能停止或延缓其进攻。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陈毅、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1月12日)

你们应得蒋介石调动二十九个师进攻新四军的事实公开宣布，不应秘密。你们应向各方宣传上述军队准备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如果打响，就是大规模内战，鹬蚌相争，只使日本人渔人得利。目前苏北业已和平，如又发生战争，新四军不能不自卫，八路军亦不能坐视，衅由彼启，我们不能负责。你们应向各方奔走呼号，为制止内战挽救危亡而奋斗。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陈毅、刘少奇、黄克诚、彭董必武、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1月13日)

目前正从重庆设法，缓和汤、李^[2]进攻，朱、彭、叶、项联名致何、白“佳电”已发出，周、叶正在谈判，做到仁至义尽。如彼最后决心进攻，毫无转圜余地，我们方可动手打韩，故目前只能作打韩准备，不能马上动手，至必须动手时，我们当有命令。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2] 汤、李，指汤恩伯、李品仙。

关于“佳电”发出后的 工作部署致彭德怀电^[1]

(1940年11月13日)

根据中央十一月七日指示及朱、彭、叶、项联名复何白“佳电”（此电不日拍你处）所取政治立场，对于国民党在华中举行的军事进攻，决采取自卫的防御战，兵力上除陈、罗^[2]调动一部外，华北各部暂不调动，另在重庆及各方进行统战活动，以求在政治上取得有理有利地位，并使抗战能再拖一时间，这种可能性还未丧失。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即陈光、罗荣桓。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0年11月13日)

东北军一一二师霍守义部由鲁南进至沐阳压迫黄克诚，桂军一三八师莫德宏部越过淮南路，向皖东进，情况甚为紧急。请向何应钦和白崇禧交涉，撤退霍、莫两师，并停止他部行动，否则我军将实行自卫，届时责由彼负。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只能做自卫的防御战^[1]

(1940年11月13日)

(一) 目前在政治上、军事上均只能作防御的自卫战。(二) 只能依靠现有兵力，不能希望华北增援。(三) 目前在重庆办交涉，须做到仁至义尽，不能马上动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如何面对国民党的磨擦问题致彭雪枫并告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1月14日)

根据七日中央指示^[2]及朱彭叶项“佳电”所取政治立场，军事上亦取完全自卫的防御战，并力求不爆发大冲突。

已令苏北取拉韩政策，非至万不得已时不得解决韩，与重庆活动配合一致。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940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投降挽救时局的指示。

关于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 对付蒋介石的反共高潮的指示

(1940年11月15日)

一、根据中央十一月七日对时局指示及朱彭叶项佳日联名复何白电所取政治立场，对于蒋介石此次反共进攻，决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缓和蒋介石之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理有利地位。

二、蒋对华中压迫已具决心，因此我要积极准备自卫。但蒋进攻亦有几种困难：

第一，是我取缓和态度，何应钦缺少了挑拨的借口（虽然还有几个借口者），蒋介石、白崇禧要顾虑中间派态度，故我应广泛宣传佳电内容，剥夺蒋、何、白之政治资本。

第二，蒋介石很怕八路军南下，尤怕我从西安突出。故我应宣彼方如果打新四军，则八路军不能坐观不救，请求彼方停止二十几个师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听新四军挨打，到处适当地散布这种空气，向顽固派做大力攻势，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胡干。

第三，蒋介石怕我皖南不动，扰其后方。故我对皖南部队既要真作北移准备，以为彼方缓和进攻时我们所给之交换条件，又要

要求彼方保证华中各军停止行动，以为我方撤退皖南部队时彼方给我之交换条件。

第四，蒋介石、顾祝同均怕我消灭韩德勤。故我应在各地放出如下之空气，略谓苏北事件我已遵令和解，不咎既往，但如汤、李、霍（守义）、莫（德宏）不停止进攻，则我不得不打韩德勤，此空气尤应直接从韩本人及顾祝同方面着手，表示我可继续保全韩德勤，但必须停止汤、李、霍、莫进攻作交换条件。

第五，蒋介石进攻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在他未同日本人真正讲好条件之前（如条件讲好则全局大变）他的剿共战场是不方便的，他的东进大军不易通过淮南路、津浦路两道日本封锁线，其北进大军亦难通过涡河敌垒及以北敌据点，如彼仅使用霍、莫等小部，则我游击队即足以对付之，故我对霍、莫、何（柱国）、孙（桐轩）、马（彪）等一切接近之部队，应强调大敌当前不应内战之宣传，并加强统战工作，在彼等小部进攻时（如霍、莫）只用众多之游击队缠绕之（此等游击队主要作用是宣传队），而避免与之作真面目战斗，不损伤桂系与东北军之感情，预留尔后讲价还价余地。同时在皖东则说明该地是廖故主席划给新四军之防地，在皖东北则说明该地是卫长官承认给彭支部队的游击区，总之在这些区域要使我全体军民振振有词，使进攻者词穷理绌。

三、如我各方面做得好，这次反共高潮是可能打退的，虽然我们决不应该估计蒋会放弃对我的压迫政策（这是决不会的），并且还要准备对付投降夹击的最黑暗局面。以上意见请考虑酌行之。

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

(1940年11月16日)

华北及山东各部队：

在目前形势下，国内重大事变行将到来，而敌人今年冬季“扫荡”将更残酷。今冬华北各部队任务：

一、坚持抗战，与敌人的冬季“扫荡”作斗争。

二、进行一次冬季扩兵运动，补足现有编制的兵数，如能设立补充营之类则更好。但扩兵工作应注意根据地之人力，多在边境及人口众多的区域进行扩兵。

三、尽量争取时间，进行休息与整军。一面作战，一面整军，及在反“扫荡”间隙中全部或大部得到休整。务使我主力兵团既能坚持战斗，又能养精蓄锐，以便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四、强化政治工作，深入传达中央关于形势的估计及各方面的政策。务使全体官兵团结一致，防止因敌后抗战困难之增加及国共关系之紧张，而发生悲观失望、无前途等等情绪，同时防止可能的敌寇奸细及国特奸细在我军中乘机捣乱，防止过“左”错误的重复。

五、加强干部之团结、党的团结。在困难环境中，对待干部要正确关系。有确实不负责人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

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

毛 朱 王 谭^[1]
铤

[1] 朱，指朱德。王，指王稼祥，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谭，指谭政，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对黄埔系军人 进行统战工作意义重大^[1]

(1940年11月16日)

这次苏北事件中，税警团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团干部大半都是黄埔生。过去华北与朱怀冰^[2]冲突时，其中一个师也未参加反共战争，而该师干部同样也有些黄埔生。我驻阎办事处^[3]主任王世英同志能与该地中央军（胡宗南）的黄埔生高级干部进行了很好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一切证明，我党我军中过去把黄埔生看作一个笼统的反共集团的传统观念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目前严重时局，急须改正此观念，利用一切机会与黄埔生军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不要刺激他们，而应以民族至上的观念来打动他们，使他们不肯投降日寇，使他们对反共战争取中立或消极态度，这对挽回危局有重大意义。

毛 朱 王
铤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发的关于对黄埔系军人做统战工作的电报。

[2] 朱怀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军军长。

[3] 指八路军驻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的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办事处，当时设在山西宜川县秋林镇。

致彭德怀电^[1]

(1940年11月16日)

目前斗争重心应移至淮河流域，蒋介石企图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之联系。故提议调三四四旅进至陇海铁路与淮河之间，协助彭雪枫创建抗日根据地，并策应刘少奇处。

[1] 这是毛泽东关于目前斗争中心问题致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巩固两李^[1]反正部队建立外围军 致陈毅、刘少奇电

(1940年11月16日)

陈毅、胡服：

(一) 由两李处反正过来的千余人，他们是怎样过来的，事前我曾作过什么工作，是否这是两李失败的主要原因。反正过来后，对于原来领导反正的官长怎样处理，望电告。

(二) 如果是原来军官带领过来的，必须考虑到如何能扩大这次争取顽军的影响，使以后许多反对“剿共”、愿意抗日的友军，敢于整营、整团、整师的转到我们领导下面来。我们对于这些大批反正过来的军队，应该把他看作一种八路军与新四军的外围军方式去处理，只要他不反对我们，服从我们的指挥调动，可以不改变他原有军官的领导，可以不立即实行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制度（如派政委、设政治部、发展党的组织等），甚至可以不改用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仍用他原来的番号，但需要用一切力量去帮助他巩固起来。我们的方针是要能争取更多的军队，团结在我党周围，是要用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工作去改造反正过来的友军，是要表示我党能大大包容一切抗日武装力量，而不是目光短浅，只看到眼面前的几

[1] 两李，指李明扬和李长江，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和副总指挥。

支人枪，而使许多可以争取的力量畏我吞并，不敢过来。

（三）这一创造外围军的工作，是和更加巩固与扩大八路军新四军本身的工作分不开的，必须把主力骨干（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党的组织提到更高度，把主力更加增强，才更易去争取与团结外围军。

毛 朱 王

致陈毅电^[1]

(1940年11月17日)

你的统战方针与统战工作是正确的，以后盼将这类材料随时电告我们，同时告新四军各部，使他们都照这样办。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批转陈毅关于统战工作报告的指示^[1]

(1940年11月18日)

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一战线的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的报告转发全军学习。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10月28日关于苏北统战工作报告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对苏北的作战部署^[1]

(1940年11月19日)

胡、陈，黄，并告叶、项^[2]：

巧电悉。(一)大局有变动可能，我们正争取停止汤李^[3]进攻。(二)你们目前一个短时间内的总方针是积极整军，沉机观变。只要军队能打是可以变被动为主动的，黄桥战役就是证明。(三)五纵队主力须位置于韩霍两军^[4]之间，隔断其联络，万万不可听其打成一片，能办到这点，霍师态度就会好转，韩德勤也会就范。(四)为达此目的，你们应立即准备一个局部战斗，即是用五纵队主力从东沟、益林出发，突然攻占凤谷村、车桥两点，再行攻占平桥、阳念、黄浦、安丰地区，打通皖东、苏北联系，限电到五日内准备完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的电报。

[2]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延年，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4] 韩霍两军，指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一游击区总指挥韩德勤所部第八军和霍守义任师长的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

毕，待命攻击。现胡宗南^[1]集中四个师准备向我关中边区进攻，待胡发动后，我即有理由进攻上述地区了。霍师南下，莫师^[2]东进，则是你们的直接理由，你们尤其克诚应集中精力进行这个战斗。（五）根本方针仍是拉韩拒汤李，上述战斗胜利后，韩有就范可能。（六）津浦路^[3]西应发动坚决的游击战争拒止莫德宏的扩展，应有得力人去指挥，罗炳辉^[4]速回皖东。

毛 朱 王
皓 亥

[1]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莫师，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3] 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即今京沪线一段。

[4]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

致董必武电^[1]

(1940年11月19日)

董老：

说贺龙师三千人南下，完全是造谣。据关中报告，胡宗南各部以贺师南下为借口，纷纷向关中地区开进，即将大举进攻。请你速见熊斌、胡宗南、蒋鼎文，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否则引起大冲突双方都不利。

毛 朱 王

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问题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粉碎蒋介石反共阴谋^[1]

(1940年11月21日)

(一)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2]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四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

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

(二) 除何应钦另有阴谋外（挑拨内战），蒋介石必把他的法宝（吓共让步）密告了白崇禧，故白如此像煞有介事，实际白是不想打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李克农、项英、刘少奇、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2]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

的，他很怕真打起来，我们却应利用这个弱点去吓白，除白以外一切吓我之人，我应以我之法宝转吓之，这些法宝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下级官兵如何愤激，他们请求南调，我们已十四个月未发子弹，华北没有饭吃，汤、李东进必引起大冲突，苏北和平也必破裂，陕北今年灾荒甚重，饥民要求迁地就食等等。

这些全都是政治攻势，也应向着那些天真烂漫的中间派，引起他们着急，去影响蒋介石那个死流氓。

(三) 胡宗南已对二十八师、二十四师、预三师、第八师下准备进攻宜君、淳化、正宁三点间葫芦地带的命令，大概一二星期内会有一个突然进攻，朱总已电胡宗南叫他制止，一面准备一部分兵力打击之。只待胡发动，我们即在苏北发动一个局部战斗以报复之。为隔断韩、霍打通皖苏之目的，突然攻占淮阴、宝应间之一块地方，如得手，霍必好转，韩必就范。其直接的理由是霍守义^[1]打我彭明治，莫德宏^[2]打我张云逸，目前就要宣扬这个理由。

(四)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1]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长。

[2] 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

认真准备北移^[1]

(1940年11月21日)

叶、项：

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

中央书记处

二十一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认真准备北移给叶挺、项英的指示。

致冯白驹电^[1]

(1940年11月23日)

顽军有向你们进攻可能，你们应从军事上政治上加紧准备粉碎其进攻，其方法是待其进攻时集中主力，打其一部，各个击破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冯白驹电的主要内容。冯白驹，当时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总队总队长兼政治委员。

致萧克电^[1]

(1940年11月24日)

目前时局在转变关头，我党一面须坚持各抗日根据地，一面须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剿共”战争。平西、平北及冀东区域的坚持与发展，增加了对整个局势的意义，望从艰难中支持下去，与聂、彭打成一片。

军委历来对你处没有多少帮助，今后将更少帮助，一切望你及同志们独立支持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萧克电的主要内容。

皖南部队必须于十二月底 全部开动完毕^[1]

(1940年11月24日)

叶、项：

(一) 你们必须准备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二) 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三) 一切问题须于二十天内处理完毕。

毛 朱 王

敬二时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希夷)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1]

(1940年11月24日)

叶、项：

立即开始分批移动，否则一有战斗发生，非战斗人员及资材势必被打散。

毛 朱 王

二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指示。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1]

(1940年11月25日)

应极力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对于学忠部进行的小磨擦，在行动上应稍加忍让。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争取东北军于学忠部致徐向前、朱瑞、陈罗荣桓电的主要内容。

为应付突然事变的部署^[1]

(1940年11月27日)

为应付突然事变起见，须准备七万精锐部队，待命行动。从一二〇师、晋察冀军区、冀中军区、一二九师和留守兵团抽选精锐组成，一切准备工作限二月一日前完毕。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贺龙、刘伯承、聂荣臻、吕正操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1月27日)

现在，统治阶级内部是分裂的，国民党统治总的特点是不巩固。在资产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是分裂的；在地主阶级中，开明绅士与大地主是分裂的；在大资产阶级中，英美派与亲日派是分裂的。国民党外部阵地与内部阵地都不巩固，即中日间、国共间的阵地是不巩固的，内部各派之间的阵地也不巩固。因此，蒋介石要实行反共的统一战线，进行两面战争，既要抗日，又要反共。只要蒋介石不投降，就仍处在日军的进攻中，这是一条严重的战线。所以，目前蒋介石的反共只能实行攻势防御，即军事攻势、政治攻势、思想攻势。目前主要的还不是军事攻势。军事上可能采用战役的攻势。要打破国民党的反共统一战线，须要三个条件，即日本的进攻，德国的积极行动，共产党积极地打破反共统一战线，而主要的在于共产党的力量与正确政策的实行。共产党打破反共统一战线的政策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局部战斗，针锋相对。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的一部分。

致王世英电^[1]

(1940年11月28日)

六十一师钟师长已向胡宗南请示如何处置你们办事处及电台，可能对你处加以危害。应征得阎锡山同意后搬去克难坡附近。向阎锡山、杨爱源^[2]、赵承绶说明国民党反共是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维持友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王世英电的主要内容。

[2] 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致董必武电^[1]

(1940年11月28日)

胡宗南调动大军准备不日向关中边区进攻。在胡进攻期间，西安空气必十分紧张，望令西安办事处人员加紧检点，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1] 这是毛泽东致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

复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1月29日)

叶、项：

感酉电悉。(一) 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 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毛 朱 王
二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给叶挺、项英的复电。

致董必武等电^[1]

(1940年11月29日)

董老，并告周恩来、胡服、项英、德怀、克农：

“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朱总号日致胡宗南电，胡感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毛泽东

二十九日

[1] 这是毛泽东给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的电报。

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 及我之方针

(1940年11月30日)

周，叶^[1]，并告德怀，胡服，项英^[2]：

二十九日电悉。此次拟发两俭电：一致何应钦^[3]，专质问停发军饷理由，此电昨日已直发何，同时发你处及通电全国，收到盼告；一致蒋，犹豫了两天，得你们电后决定今日拍发，亦是直发蒋，并发你处，稍等再发通电。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4]、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李任潮^[5]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还是我们历来

[1] 周，即周恩来。叶，即叶剑英，当时任八路军参谋长。

[2] 德怀，即彭德怀。胡服，即刘少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4] 指1940年10月19日（皓）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电报。该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自抗战以来“不守战区范围自由活动”“不遵编制数量自由扩充”“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不打敌人专事并吞友军”等，强迫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电到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5] 李任潮，即李济深，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

说过的话，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①（大资产阶级的反共统一战线，而何、白却另有目的），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其一切对我恐吓手段及可能的局部进攻，都是攻势，而以沿泾水、渭水、黄河、淮河、淮南路筑封锁线达其巩固外部防线之目的，以造成反共空气，缩小我之活动，组织反共联盟（以蒋桂何联盟为基础），达其巩固内部防线之目的。这两件事是他能够办到的，总之是达到防御目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仍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惧。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他仍须积极准备，除对付局部进攻外，随时可以调动七万以上精兵给敢于大举进犯者以猛重的打击，因我愈有准备，彼愈不敢进。这是有备无患道理。至于在实际上，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更强了，彼更弱了。此点不向下面传

① 蒋桂何联盟，指蒋介石的嫡系力量，同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的军队以及亲日的何应钦势力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联合。

达，以免引起下面松懈。冯玉祥^[1]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所谓惹急了
他会撕破脸皮乱打，这是被蒋之流氓吓倒了的话。其实蒋是精于计
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

毛 泽 东

三十五

[1] 冯玉祥，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曾任国民党军
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

给周文^[1]的信

(1940年11月30日)

周文同志：

群众报^[2]及《大众习作》^[3]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大众习作》封面写得不好，请改换一个如何？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三十日

[1] 周文（1907—1952），四川荣经人。当时任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

[2] 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它是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年3月创办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3] 《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社1940年8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关于同意皖南新四军行动布置 致叶挺、项英^[1]

(1940年11月30日)

叶、项：

(一) 你们二十九日的布置^[2]很对。

(二)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打一缺口，以便隔断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

(三) 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毛 朱

三十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新四军行动问题给叶挺、项英的电报。

[2] 指29日进行的曹甸战役。

国共关系可能变化， 望利用时机善处之^[1]

(1940年11月30日)

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2]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

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1] 这是毛泽东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消息后，致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给萧向荣^[1]的信

(1940年11月)

向荣同志：

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望送来看，须加修改，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2]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

毛泽东

第二十五课，等几天再给你看。

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

[1] 萧向荣（1910—1976），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2]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以看出来，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

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谈判条件^[1]

(1940年12月1日)

周、叶：

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2]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3]，我方释放孙启仁^[4]。（六）停止陇海、咸渝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5]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2] 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第五十七军第一一二师师长。莫德宏，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

[3] 罗世文，四川威远人，抗日战争时期，罗世文被党中央派回四川工作，先后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3月18日，罗世文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4] 孙启仁，国民党韩德勤军团三十三师师长，1940年10月4日至6日，黄桥战役中被我军俘获。

[5] 叶青（1896—1990），四川南充人。1928年8月，他在长沙被捕，叛变革命，从此由一名共产党员蜕变为反革命的“理论家”。

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中央书记处

一日

在边区经济自给动员大会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3日)

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

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

[1] 1940年12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经济自给动员大会，毛泽东、朱德出席并作了重要讲话。这是毛泽东讲话的一部分。

询问皖南新四军是否已作 应付突然事变的各项准备 致项英电

(1940年12月3日)

请以你对下列各项的意见告知：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
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
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
友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
绍雄态度如何，东南局领导下的地方党是否有保存干部、蓄积力
应付突然事变的精神上和实际上的准备？

致刘少奇等电^[1]

(1940年12月3日)

(甲) 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 罗炳辉^[2]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 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部署致刘少奇、黄克诚、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4日)

一

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胜利，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形势问题的讲话部分；本篇二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听完陈绍禹、秦邦宪、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讲话的一部分。

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指示。

二

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
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
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
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
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
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
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
，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
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
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
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
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
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
宋子文¹¹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¹¹ 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

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5日)

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2月6日)

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1]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雪枫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1]

(1940年12月6日)

徐、朱、黎^[2]：

山东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的正规化，用军队掩护协同地方党，广泛地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钳制敌人，逐渐补充主力，使主力从地域性上解放出来，以便应付较大战斗。同时提出要建立正规的供给制度，健全政治机关工作，提高党支部及党员作用，好好教育知识分子干部，多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

毛 王 滕
六日

[1] 这是毛泽东和王稼祥、滕代远等发出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

[2] 即徐向前、朱瑞、黎玉。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0日)

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抗大问题致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电的主要内容。

致聂荣臻等电^[1]

(1940年12月10日)

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13日)

准备写一篇文章，主要解释以下几点：1. 说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区别，过去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中没有说清楚。2. 《新民主主义论》虽说明了各党各派各阶级的联合专政，但没有把各党派联合专政的方针与具体政策联系起来。如地主、资本家要人权、财权等便是具体的政策。现在各根据地土地政策、劳动政策都是过“左”的，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过高增加工资等，必须解释清楚，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3. 实行自我批评，对过去我党的包办作风要有慎重的必要的自我批评。此外要把亲日派资产阶级与英美派资产阶级加以区别。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等电^[1]

(1940年12月13日)

石友三通敌叛国，被其部下高树勋^[2]逮捕枪毙，大快人心，证明八路军反对石友三是完全正确的。卫立煌通电亦系宣布其通敌卖国状，惟国民党不宣布其汉奸罪状，谓其自由扩军不服调遣，杀鸡给猴看，又一对我之恐吓伎俩，望向各方面揭穿之。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董必武、李克农、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廖承志，当时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

[2] 高树勋，当时任国民党军新八军军长。

抗日根据地应实行的各项政策

(1940年12月13日)

中原局，并告北方局，山东分局，东南局，南方局，南委^[1]：

(一) 苏北组织政权机关及民意机关时，应坚决实行三三制，共产党只占三分之一，在开始时还可少于三分之一，网罗各党各派无党无派一切不积极反共之领袖人物参加，其中应有国民党中派及左派，韩国钧等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地主均应该参加，也可容许少数右派代表，真正组织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政权，力避我们包办。这对于全国是有大影响的。(二) 劳动政策力避过“左”，目前只作轻微改良，例如十四小时工作日者减至十三小时或十二小时，不要实行八小时制，保证资本家能赚钱。(三) 土地政策应实行部分的减租减息以争取基本农民群众，但不要减得太多，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旧债而没收地主土地，同时应规定农民有交租交息之义务，保证地主有土地所有权，富农的经营原则上不变动。要向党内及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时期，避免华北方面曾经发生过的过左错误。(四) 同意胡服^[2]对税收办法的意见，在无更好办法之时暂时照旧法征税，惟苛杂应酌量减轻。(五) 锄奸政策以镇压众人皆恶之少数最反动分子为原则，极力避免

[1]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 胡服，即刘少奇。

多杀人。除政府外各机关团体不得自由捕人罚人。(六) 经济政策是尽量发展工业农业生产与商业流通，力避破坏生产与商业，号召上海资本家到苏北办实业。(七) 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家办报办学。(八) 总之，目前你们的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及封建大地主的专制主义及作初步的民生改良，一方面保证工农小资产阶级人权、政权^[1]、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另方面也应保证除汉奸以外一切资本家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只要不武装暴动，任何党派阶层有活动之自由。应容许国民党之存在，应组织进步的国民党。(九) 整个华中都应执行上述方针（当然华北亦如此）。(十) 你们如何具体执行各项政策，望随时电告。

中央书记处
十二月十三日

[1] 此处及下文中的“政权”，指政治权利。

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1]

(1940年12月14日)

叶、项：

(一) 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但你们仍需注意警戒。(二) 移动时间蒋限十二月底移完，我们正交涉展限一个月，但你们仍须于本月内尽可能移毕。(三) 速向顾祝同请领应得之饷弹。(四) 蒋以新四军正在移动，不同意项副军长来渝，因此中央决定项随军队渡江，然后经华北来延安。(五) 关于小姚行动，以苏南游击区是否便于指导东南各省为断，如有此条件，以随曾山去苏南为有利，如不可能，则去江北。(六) 叶、项二人均以随主力去皖东为适宜，资材及后方机关移苏南者可由周子昆、小姚负责指挥。

中央

十四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皖南新四军北移的部署给叶、项英的电报。

向国民党提出制止对新四军的进攻^[1]

(1940年12月15日)

南方局、东南局应分别向顾祝同何应钦^[2]及参政会特种委员会提出：江北苏皖鄂三省已在大举进攻新四军，皖南、苏南之新四军军部及其三个支队亦已被中央军重重包围，有准备攻击讯，请其制止江北之进攻，撤退皖南、苏南之包围。此种提出目的在使某方知我有备，缓和其在皖南、苏南之发动，特别在八路南下增援时，须缓和顾祝同在皖南之发动。

中央书记处

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东南局的电报。

[2] 顾祝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1]

(1940年12月16日)

胡、陈，并告叶、项^[2]：

(一) 各电均悉。即照胡服删电^[3]部署。(二) 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局部进攻是必然的。华中斗争是长期慢性斗争，我们要有决心与耐心。(三) 苏北部队亟须整训扩大一短时期，然后以主力一部增援皖东。(四) 皖南部队务须迅速渡江，作为坚持皖东之核心。其大批干部分配苏北皖东两处建设根据地。(五) 一一五师之两个团催其从速南下。

毛 朱 王

十六日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毅的电报。

[2]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指1940年12月15日刘少奇（胡服）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挺、项英等的电报。电报提议：（1）四、五支队主力阻止桂军东进，至适当地区，转移至津浦路东，留一部在路西游击；（2）八路五纵一、二支队五个主力团即进至皖东盱眙地区整训；（3）再调两个团到苏北，控制黄桥、海安、如皋；（4）陈毅部一、二、三纵队，控制于盐城至平桥、岔河镇一带；（5）五纵三支两个团，控制于凤谷村、益林地区。

重庆形势严重项英曾山暂勿离开军队^[1]

(1940年12月18日)

叶、项：

甲、重庆形势严重，项曾^[2]二人暂勿离开军队。乙、希夷及一部人员北上，望速作部署。丙、秘密文件必须烧毁，严防袭击。

毛 朱 王

十八日

[1] 1940年12月9日，蒋介石强令江南新四军全部限期本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12月10日，蒋介石又密电江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如江南新四军在31日以前没有遵命北渡，就立即消灭之。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曾，指曾山，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致叶挺、项英电^[1]

(1940年12月18日)

你们的机密文件电报须一律烧毁，切勿保留片纸只字，以免在通过封锁线时落入敌人手中，你们的密码须由负责人带在自己身上。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9日)

(一) 据西安消息，现在皖、豫交界之李仙洲三个师，准备东进援助韩德勤，有渡淮河向砀山前进讯。综合各方情况，蒋、桂对华中进攻是有决心的。(二) 以打击李仙洲为目的，望彭德怀、左权令杨得志率部南下，须于一个半月内达到彭雪枫地区，望陈光、罗荣桓令第五旅迅即南下，不可再推迟，应于半月内到达张爱萍地区，望叶、项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蒋桂军在华中的军事动态及我之对策等问题致彭德怀、左权、陈光、罗荣桓、叶挺、项英并告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等电^[1]

(1940年12月19日)

在日汪条约签订后，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故不应如十月、十一月那样地强调反投降了，否则不但国民党起反感，人民亦不了解。至日本诱降不会梦弃，国内亲日派仍有乘机活动可能，那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日汪条约签订后的形势问题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等电的主要内容。

叶挺应迅速过江^[1]

(1940年12月20日)

叶、项：

希夷渡江以速为好，不应征蒋^[2]同意。如蒋反对，便不好过江了。江边须有周密布置，速与胡服、云逸^[3]联系在对岸作准备。

毛 朱 王
号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字希夷）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蒋，指蒋介石。

[3] 胡服，即刘少奇。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

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1]

(1940年12月20日)

甲、据叶、项报告：叶军长及干部一部分准备渡江，你处需在江边作周密布置。

乙、交通断绝，延安有人也派不来，待七大后，方能派一批人从华北绕道来，中央已告北局抽派干部南下。

丙、与韩谈判条件不可过苛，并须尊重李、陈各部利益，兴化、高邮地区应保留给韩，我军应停止于兴、高以外地区，苏北应全面休战，求得妥协，巩固已得阵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布置接叶挺过江等问题给刘少奇、李富春的电报。

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1]

(1940年12月23日)

胡服、陈毅、克诚、雪枫、云逸^[2]：

一、胡服、雪枫两号电均悉。

二、目前重心在苏北，其次才是淮北与皖东。故陈黄^[3]两部及一一五师增加之两个团，目前均应集中于苏北，加紧整训扩大努力巩固苏北根据地，并准备于蒋介石真正向我淮北、皖东进攻时，首先解决韩德勤^[4]（最后由中央决定），第二步才向淮北、皖东出动，这是胡服前电意见，我们认为是恰当的。

三、目前淮北与皖东须由雪枫与云逸所部独立支持之，无论敌人或顽军进攻，均用游击战争与之周旋，不要希望任何增援，华北增援不可能，也不适当。

四、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等的电报。

[2] 陈毅，当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江北指挥部指挥。

[3] 陈黄，指陈毅和黄克诚。

[4]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因此你们一方面要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决不可松懈自己的准备。但另一方面也要晓得蒋介石的困难，他的困难甚多，没有便利战场即是其一，敌占涡阳、蒙城后，这个困难更增加了。所以你们很可以利用时机，积极准备一切，包括扩大整训军队，巩固与发展根据地。

五、你们的军队愈扩大、愈精强，你们的根据地愈发展、愈巩固，任何进攻都是不怕的，故认真扩大与整训军队、认真发展与巩固根据地，就是粉碎任何进攻的可靠资本。

六、目前敌人正向涡河以西进攻，正是雪枫区域扩大整训军队、发展巩固根据地的有利时机。皖东区域，除以有力一部对付莫德宏部的侵入，并派得力人去指挥外，亦应照此方针布置。

七、要扩兵与巩固根据地，就要发动基本群众，而要发动基本群众，必须给群众以利益，必须镇压反动分子。在这里是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顾到党派的与社会的统一战线政策，要预防过左倾向，另一方面对于妨碍我们发动基本群众的反动分子，必须予以坚决的镇压（当然不是每个都杀死），否则发动群众与巩固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对于土匪必须加以剿除。

毛 朱 王
漾辰延安

[1] 莫德宏部，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复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24日)

同意你见蒋时的交换条件^[2]，惟江北部队请缓调改为请免调，照“佳电”立场告蒋。

[1] 这是毛泽东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12月24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他拟于25日会见蒋介石，向蒋提出新四军皖南部队决定过江，江北部队缓调黄河以北，交换条件是：速给新四军补充弹饷，停止国民党华中部队的前进，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取消张国焘的国民参政员资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25日)

最近国民党动员反共，汤恩伯领特费准备反共，各方面都实行反共的高压政策，现在还不能说是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因目前国民党在全国反共是困难的。国民党认为英、美借款等国际形势对他很有利，想利用目前形势给我以打击，我们的方针是新四军是不能走的，他要打也由他。在此次反磨擦中我们的收获主要是取得苏北。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组织机动突击兵团应付华中紧急局面^[1]

(1940年12月25日)

胡、陈，彭、左，陈、罗，叶、项^[2]：

华中局面紧急，非组织机动突击兵团，不足应付大规模战斗。因此同意胡陈二十一日电，将苏北各部统一编为两个纵队。以黄克诚^[3]部、彭朱支队^[4]、一一五师五旅两团及田守尧支队^[5]编一个纵队，以陈毅兼司令员，黄克诚为政委，赖传珠为副司令员。以苏北新四军合编为一个纵队，以粟裕为司令员，刘炎为政委。四个军区之划分及张爱萍、常玉清、叶飞、韦国清分任军区司令，均照所拟办理。望陈罗即通知五旅遵照编制服从陈黄指挥。部队编制后即行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陈毅等的电报。

[2] 彭，指彭德怀。左，指左权，当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3]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4] 彭朱支队，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彭明治、政治委员朱涤新。

[5] 田守尧支队，指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员田守尧。

加紧整训一个月至两个月，充分准备一切对付蒋桂两军^[1]之进攻。

毛 朱 王
有 辰

[1] 这里指蒋介石嫡系汤恩伯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和桂李宗仁所部李品仙为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

国民党各派态度及我之布置情况^[1]

(1940年12月25日)

(一) 蒋介石内外情况只能取攻势防御，大吹小打，故复电以拖为宜，拖到一月底再说。

(二) 胡宗南全无战意，其他中央军可知，如白崇禧亦软下来，彼方非自己转弯不可。

(三) 何应钦系统与西西系统是想打的，都是亲日派，但中央军与桂军如不愿打，则亲日派亦无能为力，望多方设法将亲日派唯恐天下不乱之阴谋告知中央军与桂军将领。

(四) 南汉宸在西安已做了一些工作，胡及其部下曾四次宴南，迎送尽礼，当面说不愿打。

(五) 汤恩伯部据所得情况亦很少打的兴趣，桂军至今只一三八师四个团在淮南路东，分散得一塌糊涂，一七二师尚停止于寿县附近，其他四个师则分在霍邱、六安、商城、固始，毫无东进消息。李仙洲虽准备向砀山进，但何日开动尚无确息。

(六) 现苏北战事已停，望向刘为章说明，要求停止李仙洲、莫德宏东进，否则难免大冲突。

(七) 我一一五师三四五旅已到苏北，现正连同黄克诚、陈毅各部集中整训，统一编制，俟一两个月后战斗力必大提高，然后以主

[1] 这是毛泽东发给党内的通报。

力西进，对桂军施以教训，望示意白崇禧，如欲保持友谊，则请他将莫师撤退。

(八) 杨得志旅一个月后可到淮北，皖南三个团又北上，足以对付蒋桂进攻。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九) 王世英由阎处返延。据称，中央军所捕办事处人员及电台已释，移往河东，与阎一起，密码亦未失。此事起因于所谓我军攻击太泉村。实则上月二十七日傍晚该村农家有牛四头，放牧还家，昏黑莫辨，六十一师防军误为我临真镇骑兵进攻，一时全线射击，牛亦奔进，云岩、太泉一线守碉部队一团以上纷纷向宜川城溃退，闹得满城风雨，钟师长情急将我办事处人员扣押，王世英适在阎处未被捕，该师以事出误会，关了四天释放，声明误会。似此中央军毫无魂魄，何能作战，此事一直闹到西安、重庆，实不过四头黄牛之进攻而已。

向蒋介石交涉新四军北移路线^[1]

(1940年12月25日)

周、叶：

据项英称：“顾祝同忽令新四军改道繁、铜渡江，而李品仙在江北布防堵截，皖南顽军复暗中包围，阻我交通，南岸须通过敌人封锁线，江中须避敌艇袭击，非假以时日分批偷渡则不能渡，势将进退两难”等语，请速向蒋交涉下列各点，并速告结果：

(1) 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

(2) 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

(3) 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

(4) 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掩护渡江。

(5) 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

(6) 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

毛 朱

二十五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向蒋介石交涉北移路线给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

论政策^[1]

(1940年12月25日)

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但是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人不明白党在目前时期的政策应当和土地革命时期的政策有重大的区别。必须明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这种过左政策，适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视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一次大革命后期，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在土地革命后期，则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除基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

本农民以外)，实为两个极端政策的极明显的例证。而这两个极端的政策，都使党和革命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具体地说，就是：

（一）一切抗日的人民联合起来（或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

（三）在军事战略方面，是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四）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

（五）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荫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

（六）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的基本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共顽固势力。

（七）对于反共顽固派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坚决反共的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在抗日方面，顽固派又有两面性，我们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例如暗中勾结日寇和不积极反汪反汉奸等）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顽固派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因此我们的政策也有两面性，即在他们尚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在他们对我党和对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方面，是进行斗争和加以孤立的政策。将这种

面派分子，和汉奸亲日派加以区别。

(八) 即在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应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方面，是加以打击和孤立的政策，对其动摇的方面，是加以拉拢和争取的政策。将这种两面分子，和坚决的汉奸如汪精卫、王揖唐^[1]、石友三^[2]等，加以区别。

(九) 既须对于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须对于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十) 对待帝国主义亦然。虽然共产党是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但是既须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现时没有举行侵略的其他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同日本结成同盟承认“满洲国”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须将过去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和目前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时的英美，加以区别。我们的策略原则，仍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我们在外

[1] 王揖唐（1878—1948），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时代的大官僚，汉奸。1935年华北事变后，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1940年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2] 石友三（1891—1940），吉林长春人，反复无常的国民党军阀之一。1939年后，他任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在河北省南部和山东省南部专门联合日本军队进攻八路军，摧残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

交政策上，是和国民党有区别的。在国民党是所谓“敌人只有一个，其他皆是朋友”，表面上把日本以外的国家一律平等看待，实际上是亲英亲美。我们则应加以区别，第一是苏联和资本主义各国的区别，第二是英美和德意的区别，第三是英美的人民和英美的帝国主义政府的区别，第四是英美政策在远东慕尼黑时期和在目前时期的区别。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

党内许多干部对于策略问题上的片面观点和由此而来的过左过右的摇摆，必须使他们从历史上和目前党的政策的变化和发展，作全面的统一的了解，方能克服。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仍然是过左的观点在作怪。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许多人不能认真地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的反共政策看得不严重；同时，又有许多人不能执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政策，因为他们把国民党简单地看成漆黑一团，表示束手无策。在日本占领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内，由于只知道联合、不知道斗争和过分地估计了国民党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国共两党的原则差别，否认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的政策，迁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迁就国民党，甘愿束缚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发展抗日革命势力，不敢对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坚决斗争，这种右倾观点，过去曾经严重地存在过，现在已经基本上克服了。但是，自一九三九年冬季以来，由于国民党的反共磨擦和我们举行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虽然已经有了一些纠正，但是还没

有完全纠正，还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所以目前对于各项具体政策的研究和解决，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中央曾经陆续有所指示，这里只综合地指出几点。

关于政权组织。必须坚决地执行“三三制”^[1]，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吸引广大的非党人员参加政权。在苏北等处开始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地方，还可以少于三分之一。不论政府机关和民意机关，均要吸引那些不积极反共的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参加；必须容许不反共的国民党员参加。在民意机关中也可以容许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切忌我党包办一切。我们只破坏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专政，并不代之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

关于劳动政策。必须改良工人的生活，才能发动工人的抗日积极性。但是切忌过左，加薪减时，均不应过多。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八小时工作制还难于普遍推行，在某些生产部门内还须允许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其他生产部门，则应随情形规定时间。劳资间在建立契约后，工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己。至于乡村工人的生活和待遇的改良，更不应提得过高，否则就会引起农民的反、工人的失业和生产的缩小。

关于土地政策。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1/3，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1/3。

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

关于税收政策。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该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捉人罚款以解决军饷的办法，应予禁止。税收的方法，在我们没有定出新的更适宜的方法以前，不妨利用国民党的老方法而酌量加以改良。

关于锄奸政策。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地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则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政策。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不要将国民党一般情报人员

和日探汉奸混为一谈，应将二者分清性质，分别处理。要消灭任何机关团体都能捉人的混乱现象；规定除军队在战斗的时间以外，只有政府司法机关和治安机关才有逮捕犯人的权力，以建立抗日的革命秩序。

关于人民权利。应规定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有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和言论、集会、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政府仅仅干涉在我根据地内组织破坏和举行暴动的分子，其他则一律加以保护，不加干涉。

关于经济政策。应该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商品的流通。应该吸引愿来的外地资本家到我抗日根据地开办实业。应该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政府经营的国营企业只当作整个企业的一部分。凡此都是为了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应该避免对任何有益企业的破坏。关税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和发展农工商业的基本方针相适合，而不是相违背。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

关于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一起合作，办学、办报、做事。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加以短期训练，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不要畏首畏尾，惧怕反动分子混进来。这样的分子不可避免地要混进一些来，在学习中，在工作中，再加洗刷不迟。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

关于军事政策。应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因为这是中国人民坚持民族抗战的最可靠的武装力量。对于国民党军队，应继续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政策，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应尽可能地吸收那些同情我们的国民党军官和无党派军官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加强我军的军事建设。在我军中共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当然不应该在我主力军中实行“三三制”，但是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这是完全必需的，不能动摇的），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在我党我军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地建设成功的现在时期，大量地吸收同情分子（当然决不是破坏分子），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争取全国同情和扩大革命势力，所以是必要的政策。

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但在纠正错误时，应是有步骤的，不可操之过急，以致引起干部不满，群众怀疑，地主反攻等项不良现象。

要有决心有办法达到北移之目的^[1]

(1940年12月26日)

项、周、袁：

各电均悉。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2]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弹药，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明白了你们要我们指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

[2] 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39年3月，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抵达皖南，同新四军领导人研究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

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中央书记处

宥

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1]

(1940年12月26日)

关于销毁机密文件是否执行，你应估计到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在此基点上，除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外，必须把一切机密文件统统销毁，片纸不留，每日收发稿件随看随毁，或者要带在最可靠的同志身上，并预先研究遇危险时如何处置。此事不仅军部，还要通令皖南全军一律实行，不留机密文件片纸只字，是为至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渡江仍应戒备^[1]

(1940年12月27日)

漾日区寿年致莫德宏称“为欢送江南之新四军开黄河北抗战复土起见，兹指定经过路线为平汉线南段，沿长江北岸某某路之线，除呈报中央及长官外，请各转令知照。一面务使豫南、鄂东所部官兵与各地民众周知为要，等因，仰各遵照”等语。但新四军渡江仍须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一面请周、叶向蒋交涉，下令李品仙不得在巢、无、和、含地区妨新四军北移为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叶挺等人电的主要内容。

致李宗仁等电^[1]

(1940年12月27日)

新四军江南部队遵令北移，祈饬庐、巢、无、和、含、滁地区
贵属勿予妨碍，并予以协助，以利抗战，特此电恳，敬盼示复。

[1] 这是毛泽东为朱德、叶挺起草的致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司令长官李品仙电的主要内容。

同意新四军由皖东分批渡江^[1]

(1940年12月29日)

(一) 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

(二) 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指示。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缓复刘为章电等问题致周恩来电^[1]

(1940年12月30日)

(一) 复刘为章电，前稿既不发，大家意见以拖一下为好。他们反共，让他们去反，剿共也让他们来剿，反得全国天怒人怨，那时我再表示态度，率性不着急。

(二) “齐电”是要驳的，也待明年一月或二月再驳。

(三) “齐电”文字错得一塌糊涂，一面请用战报台再发一次，一面请告刘为章要他用官电发来，因电报局捣乱，由他们自己发或错得少些。

(四) 皖北互让可不提，提了使桂系轻视我们，待我主力休整好后是要给以打击的。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江南部队分批走苏南为好^[1]

(1940年12月30日)

叶、项：

据恩来^[2]电称：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皖北让路，蒋^[3]虽口头答应，但让出巢、无、和、含^[4]四县恐不易，李品仙^[5]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仍以分批走苏南为好等语。我们同意恩来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毛 朱
三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2] 恩来，即周恩来。

[3] 蒋，指蒋介石。

[4] 巢、无、和、含，指安徽的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四县。

[5] 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0年12月30日)

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好在过去没有发出文件。现在国民党各报纸动员舆论反共，华中有十二个师进攻我们。华中我军部队应统一指挥，以陈毅为副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党的工作统一于中原局。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争取时局好转

(1940年12月31日)

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1]，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

(一) 蒋介石派遣李仙洲、汤恩伯、李品仙^[2]向华中、山东我军进攻的决心已经下了，汤、李各部正在东进，我党我军有举行自卫战斗以打破这一进攻、争取时局好转的任务。

(二) 除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加强华中兵力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

(三) 军事指挥，在总指挥叶挺未到江北以前，统一于副总指挥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的指挥之下，各部须完全服从他们的命令，不得违误。

(四) 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

(五) 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必须指出国民

[1] 南委，指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

[2] 李仙洲（1894—1988），山东齐河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

党这一行动的危险性，在于日益削弱抗战力量，非但不利于共产党，更加不利于国民党，不利于全国人民，只有利于敌人与亲日派，如不被阻止，势必发展为全国的内战。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六) 估计到反共军进攻的口号可能是到敌后抗日，并不提出打八路军新四军，因此我军在其进攻开始时的对策还是一来即打，还是先礼后兵，是值得考虑的。关于这一点，届时中央当有指示，你们可提出意见。

(七) 估计到华中的斗争是长期斗争，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此反磨擦斗争必须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扩大巩固军队密切联系起来。在此斗争中，逐渐削弱反共军的力量，逐渐壮大与锻炼我们的力量，而最后击破反共军。因此我们必须紧张地对付这一局面，但又必须作长期耐性的计划，不要过于急躁，不要企图在短期内取得全部胜利。

(八) 估计到国际国内各种条件，国民党的反共进攻及高压政策要失败的，必无前途的，因此全党全军必须提高胜利信心，不要国民党的进攻与高压所吓倒，必须克服可能的悲观情绪。

(九) 目前中原局的任务是积极进行粉碎这一进攻的布置与力目前南方局的任务，则是利用各种矛盾，动摇蒋介石及国民党决心。蒋及国民党虽然其势汹汹地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

(十) 对于蒋及国民党急于要求我们表示最后态度，答复蒋之命

令^[1]，中央决定报之以冷静与不理，自朱、彭、叶、项佳电^[2]发出后，不论其如何谩骂与进攻，党中央及朱、彭、叶、项暂时都不去理他，待其闹到天怒人怨，下不得台，然后出来发言，表示我们的态度。这与各下级及地方党应该随时表示态度有区别，然而正是目前对付国民党的好方法。因为蒋介石要急，我们就并不急了。

中央书记处

世

[1] 指蒋介石1940年12月9日电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2] 佳电，指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于1940年11月9日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即《朱德等给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

和程悦长的谈话^[1]

(1940年)

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我们不要看不起自己的土窑洞。

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

[1]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里接见了十六团团长程悦长。他首先向毛泽东报了自己不安心到党校学习，想回前线去的错误想法。这是毛泽东和程悦长谈话的一部分。

为魏一斋大夫题词^[1]

(1940年)

为革命服务。

敬赠魏大夫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保健大夫魏一斋的题词。

为革命服务

为赠魏大夫

毛泽东为魏一斋大夫的题词。



1941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话。



为金德崇题词^[1]

(1941年1月1日)

又学习，又玩耍。

毛泽东

月 日 星期 集情

又学习，又玩耍

毛泽东

毛泽东为金德崇的题词。

[1] 这是毛泽东1941年元旦给当时延安保育院小学学生金德崇的题词。

叶挺宜于两周内渡过江北

(1941年1月2日)

叶、项^[1]：

东亥电谅达。希夷宜于两星期内渡过江北，以便与胡服^[2]一道统一指挥各军，打破即将到来的反共进攻，如何盼复。

毛泽东

冬子

[1] 叶项，指叶挺、项英，当时分别任新四军军长和副军长。

[2] 胡服，即刘少奇。

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1]

(1941年1月3日)

你们全部坚决开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

[1] 新四军军部，1月1日致电毛泽东等，告以“我们决定全部移苏，但对向苏南转移的具体路线未加说明。这是毛泽东、朱德关于皖南新四军立即开往苏南致叶挺、项英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不宜在茂林久留^[1]

(1941年1月7日)

叶、项：

微晨电悉。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毛 朱
虞辰

[1] 新四军皖南部队经国民党当局同意，于1941年1月4日由安徽泾县云岭出发，拟绕道茂林经旌德、宁国、郎溪各县转移至苏南根据地。1月5日下午各部队先后到达泾县西南茂林地区，陷入国民党顽军重围。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副军长项英的电报。

致刘少奇、陈毅电^[1]

(1941年1月7日)

在游击战的总方针下，彭雪枫地区（即涡河两岸）、谭希林地区（即路东）均不应放弃。谭希林、罗炳辉两部仍应以游击战坚持于津浦、淮南之间，力戒浪战，战则必胜。应把此次反共高潮看作我们奠定华中基础的机会，如同上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华北基础那样，虽然华中中的斗争是长时间斗争，不到蒋介石遇了更多更大困难他是决不放手的，但我们奠定基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1月7日)

中央十一月准备七万机动兵力的指示，仍然有效，惟把准备时间延长至六月底，望从兵力及经费两方面加紧准备为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彭德怀、左权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1月9日)

九日电悉。你说项、袁已离开部队，我们尚未接到此项消息。他们何时离开的，现到何处，希夷、小姚情形如何，军队情形如何，望即告我们。得叶、项微^[2]辰电，他们支^[3]夜开动，微晨到太平、泾县间，此后即不明了。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关于查询项英等情况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2] 微，即五日。

[3] 支，即四日。

致彭雪枫等电^[1]

(1941年1月10日)

你们应根据中央十二月二十五日指示之十大理由，公开宣传，并发反共军。你们应公开写信给反共军首长如汤恩伯、李仙洲、李品仙等，将此类信件公开印刷分寄反共各军，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劝告他们停止反共。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你们的宣传对任何部队都取争取政策，不要伤其官长，对他们过去抗日成绩应加赞语。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词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加强对反共军的宣传工作致彭雪枫、张云逸、邓子恢、李先念等电的主要内容。

和巴苏华的谈话^[1]

(1941年1月上旬)

中国共产党仍坚持把日本侵略者作为打击的主要敌人。如果国民党企图破坏这一全国的主要政治方向，它必将遭到反击，它的计划必将失败，但中国共产党绝不鼓励内战。

[1] 1941年1月上旬，毛泽东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巴苏华。毛泽东用炭在地上画出日军、国民党军和新四军的位置，说明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严重局势。这是他们谈话的一部分。

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1]

(1941年1月11日)

你们转来叶、姚报告悉，叶、姚是完全正确的，望你们就近随时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另指示即转叶、姚为要。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领导问题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1]

(1941年1月11日)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姚)指挥致刘少奇、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 给周恩来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1日)

据叶挺、小姚九日报告称“今九日北进，又受包围，现集全力与敌激战，分批突围北进。项、袁今晨率一部不告而别，去向不明。我为全军安全计，决维持到底”等语。除告叶挺、姚漱石负责领导全党全军坚决执行北移任务外，特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突围中项英等离队情况致周恩来等电的主要内容。

皖南部队以突围出去 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1]

(1941年1月12日)

叶、姚（胡、陈^[2]即转）：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并盼将情形电告。

毛 朱 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姚）的电报。

[2] 胡，指胡服，即刘少奇。陈，指陈毅，当时任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

新四军由叶挺负责^[1]

(1941年1月12日)

你们率主力已突围出来，甚慰，望鼓励士气，坚持到底。迅达苏南，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小姚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关于新四军由叶挺负责等问题致刘少奇、陈毅、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给英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贺电^[1]

(1941年1月12日)

中国共产党向在欧战日益扩大与残酷中，为民主与和平而奋斗之英国人民代表大会谨致兄弟的热烈的敬礼并祝贺成功。伟大的中华民族，进行抗日战争已三年半。它将以更加团结之力量，为民族之彻底解放而抗战到底。希望更加强与巩固中英两民族间的国际团结。

[1] 这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在英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发出的贺电的主要内容。

注意利用日蒋矛盾粉碎顽军的进攻^[1]

(1941年1月13日)

有情报证明淮南路日军撤退全是谣传，蒋、桂对日军仍是敌对的。据去春晋东经验，我打朱怀冰后，蒋调集大军正准备通过晋城、长治线向太行山我军进攻之际，被日军集中“扫荡”，将各反共军打得七零八落。同时日军在皖南、鄂西采取攻势，反共高潮因而下降。此种经验，你们很可利用，但不要因此松懈自己准备。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3日)

你处交涉应带严正抗议性质，勿用哀乞语气为盼。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1]

(1941年1月13日)

(甲) 闻你们率傅秋涛部两团突围，甚为喜慰，望速赴苏南。

(乙) 你们突围者人枪多少，现至何地，情况如何。在茂林被围者人枪多少，何人指挥。望即告，以便交涉。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向叶挺等询问突围情况致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1]

(1941年1月13日)

希夷军部率六个团仍在泾县以南茂林地区围困中，并没有出来，现粮尽弹绝，处境极危，有全军覆没之可能。虽有傅秋涛^[2]两个团突出至宁国山地，亦未突出大包围线外，请严重向重庆提出交涉，并向全国呼吁求援等语，请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我们今日发出之通电，望立即散发。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应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交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2]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皖南新四军转移时，临时编队，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中我之对策^[1]

(1941年1月13日)

(甲) 我们已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之抗议。申明如不能撤围，破裂之责在彼。

(乙) 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

(丙) 立告叶、项、姚诸同志，如能突围则没法突围，如不能突围则坚守下去便有办法。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在苏、鲁发动军事攻势答复皖南事变的指示的主要内容。

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 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1]

(1941年1月13日)

胡、陈，彭、左，朱，陈、罗，叶、项、姚（胡、陈转），周、叶^[2]：

甲、同意胡陈十二日电^[3]，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4]，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5]，限电到十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攻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陈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等的电报。

[2] 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叶、项、姚，指叶挺、项英、饶漱石（姚），当时分任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叶剑英。

[3] 指1941年1月12日胡服（刘少奇）、陈毅给毛泽东等的电报。电报指出：由于新四军约九个团的兵力被顾祝同数个师包围于茂林附近，激战六夜，已至绝境，望中央速向重庆方面严重交涉。同时，提出请山东我军包围沈鸿烈，新四军其他部队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4]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5] 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乙、周叶正在重庆抗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1]，望叶项电达茂林被围部队，如无法突围应再坚持十天可能有办法。丙、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丁、为应付严重事变，华北准备机动部队应加紧。戊、为应付严重事变，重庆、桂林、西安、洛阳各办事处应即刻准备好对付蒋介石袭击。己、对皖南事变^[2]应公开宣传，对消灭韩沈部署，应绝对秘密。

毛 朱 王
元 申

[1] 指朱德、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联名于1941年1月13日发出的抗议国民党军围歼皖南新四军的通电。

[2] 1940年10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1941年1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顽军七个师八万余兵力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一部被俘。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遇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 及皖南新四军情况^[1]

(1941年1月14日)

- (一) 蒋介石已令皖南停战撤围，究竟是否停战，望即告。
- (二) 如未停战，望鼓动全军坚持，定有办法。
- (三) 我军死伤多少，被俘多少，死伤及被俘干部姓名、官级，望查明速报，以便向蒋交涉。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向叶挺等询问蒋方是否停战撤围及皖南新四军情况致叶挺等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 给叶挺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4日)

接恩来报告称“蒋十二日、十三日两次电令顾祝同撤围，并允走苏南”等语。特达。望你们再坚持二三天就有办法。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同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叶挺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与蒋介石交涉情况 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4日)

周、叶报告称“张冲昨天用电话向蒋报我们对围攻新四军的抗议。蒋说：‘（一）新四军北开中央决不留难，此次冲突，听说是新四军先开枪。（二）希望新四军继续向北开。（三）如此路不通，转向皖北开亦可，命令李品仙勿留难。（四）我已下令新四军过江后发弹十万并饷。（五）望你转告周、叶转前方，勿将事件扩大。’我现直函蒋抗议，并坚说非经苏南过江不可。请中央询问叶、项，究竟他们采取那条道路折进苏南，以便作更具体的交涉”等语。特达你们，坚持数日，便有办法。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周恩来、叶剑英与蒋介石交涉情况给刘少奇、叶挺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 给周恩来等的通报^[1]

(1941年1月14日)

确息：上官云相十三日未时解决我七千余人，另有千余人已命坚决解决。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国民党军解决我七千余人情况致周恩来等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4日)

(一) 十三日报告悉，已转叶、项。

(二) 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

(三) 项因走不脱已归队，并决与全军共存亡。

(四) 突围者是傅秋涛两个团，亦尚未脱离大包围，叶、项、姚主力尚在茂林原地，被数万大军围攻，现已血战八天，十分危险。

[1] 这是毛泽东关于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停战撤围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 救援新四军^[1]

(1941年1月14日)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2]：

(一) 叶项^[3]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县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已血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4]一部突小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灭危险。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聂、彭，指聂荣臻、彭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朱，指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胡、陈，指胡服（刘少奇）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指挥部代总指挥陈毅。周、叶，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叶剑英。

[3] 叶，指叶挺，当时任新四军军长。项，指项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

[4] 傅秋涛，当时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新编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二) 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 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1]，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须遵前令^[2]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毛泽东 朱德 王稼祥
寒

[1] 韩德勤，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沈鸿烈，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

[2] 指《包围韩德勤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皖南新四军之聚歼计划》中各项。

关于争取江浙民族资产阶级 问题的指示

(1941年1月14日)

恩来、剑英同志：

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如果我们能以正确政策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民主方面与我们合作，在国共斗争方面保持中立，则不仅对孤立大资产阶级有极大帮助，且使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政策得以开始在全国注目之地区具体实现，对于目前阶段整个革命进程是有帮助的。因此请你们除对生活教育社人员加以联络，鼓励他们去苏北外（这是主要方面），同时亦对黄炎培、江问渔、张一麋、褚辅成等江浙民族资产阶级之代表加以联络争取工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说明我们在苏北的各种政策，征求他们对苏北问题的意见，约请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到苏北去办教育文化事业，去投资兴办实业，并说明我们欢迎他们派人和介绍人参加苏北的政权工作和民意机关工作，以便经过他们，扩大我们争取江浙民族资本家的范围，并帮助我们巩固苏北根据地。

毛泽东

十四日

关于皖南事变的讲话^[1]

(1941年1月15日)

皖南新四军的失败，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新四军的领导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便是指挥上的错误。新四军本来可以北上，但项英动摇，如不是项英动摇，是可以不失败的。对于皖南事变，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前年我们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那样的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中间派喊叫，我们也不可全信。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对项、袁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皖南事变讲话的一部分。

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1]

(1941年1月15日)

还在抗战开始，项英同志即与中央存在着关于政治原则与军事方针的分歧。项英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南昌国民党省党部纪念周上发表的演说，即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此后，他对统一战线的了解，都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他不认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斗争性，他对于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从来就没有领导过斗争，精神上早已作了国民党的俘虏，并使皖南部队失去精神准备。在此问题上，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是完全和项英一致的。他所领导的政治工作，也是失去党的独立性，引导新四军去适合国民党要求的。三年以来，项英、袁国平对于中央的指示，一贯的阳奉阴违，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反对扩大新四军，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坚持其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其所领导的党政军内部情况，很少向中央作报告，完全自成风气。对于中央的不尊重，三年中已发展至极不经常的程度。关于项、袁所犯各项原则错误，经中央从去年夏季起历次严厉批评之后，项、袁表面上表示服从，中央方以为他们有了转变，今始证明依然未改。在新四军之其他部分，则在胡服、陈毅诸同志领导下，或则执

[1] 这个决议是由毛泽东起草的。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这个决议，并发给各中央局高级干部。

行了正确的转变，例如皖东与苏南，或则自始即未受项、袁错误领导的影响，例如鄂中与淮北。在这些地方的新四军，适与项、袁直接领导之皖南部分（约占老部队三分之一，在全军则占九分之一）成为相反之对照。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反共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村地方，徘徊不进，让反共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该部于一月五日至茂林，在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之反共军七万人合围后，仓促应战，除项英、袁国平等数人仍然表示可耻的怯懦动摇外，全体指战员在军长叶挺与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二人领导下，与反共军激战七昼夜，表示了共产党员与革命战士的英雄气概，但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上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及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至此次失败是否有内奸阴谋存在，尚待考查，但其中许多情节是令人怀疑的。当项英、袁国平一意执行其机会主义路线时，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与东南局委员中即有不满或反对项、袁错误的同志。对于项英压制干部积极性的家长制态度，党内不满意的人是很多的。当胡服同志在皖东，陈毅同志在苏南，传达中央指示，执行工作转变时，当地同志全体对于项英错误的坚决反对与对于中央路线的热烈拥护，就是明显的证据。为今后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胜利地进行抗日反汉奸斗争，中央对于项英、袁国平所犯错误特有如下之决定：

（一）军队干部，特别是各个独立工作区域的领导人员，由于中国革命中长期分散的游击战争特点所养成的独立自主能力，决不能

发展到不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否则是异常危险的。过去的张国焘与现在的项英、袁国平，都因不服从中央而失败，全党全军应该警惕，引为鉴戒。当与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时，项英、袁国平也是参加的，但随后他们却踏上了与张国焘相类似的覆辙。一切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即是说党性不够的同志，特别是军队的领导人员，必须深自省察。须知有枪在手的共产党员，如果不服从中央领导与军委指挥，不论其如何自以为是与有何等能力，结果总是要失败的。虽然在现时我们还不把项英与叛变了张的张国焘同等看待，还待他今后事实的证明，如果项英没有在战斗中牺牲与没有冲出包围而是被反共军俘虏，我们还希望他们在被俘后能够表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但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是应该指出的。必须估计到游击战争环境，即在今后仍有可能产生如像张国焘或项英这类人物，因此加重了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决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而对于已经犯了严重错误又不服从中央或上级领导的同志，必须及时预防，加以调动与处置，这亦是从项、袁失败应该引出教训的。

（二）当抗日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处于严重困难关头，蒋介石与国民党实行坚决的反共政策之时，我全党全军必须以项、袁为戒，于坚持抗日立场之下，在精神上、政治上、军事上及一切组织上严肃我党我军的阵容，方能粉碎蒋介石及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与胜利地进行抗日战争。

（三）在全党全军的高级干部内宣布中央决定，开展反项、袁的斗争，但暂时不得向下级传达，尤不得向党外宣布。

（四）将项、袁错误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讨论议处。

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 急电内容的通报^[1]

(1941年1月15日)

何应钦致各部队急电称“连日来各战区进剿匪军颇为顺利。匪首叶挺、项英均先后被擒。兹为预防其报复计，各部队须严为戒备，勿为匪乘”等语。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何应钦致国民党各部队急电内容的主要通报的主要内容。

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 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

(1941年1月15日)

(一) 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千万不要置信。

(二) 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

(三) 中间派孙、冯等调和退让论是有害的，只有猛烈坚决地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蒋介石的挑衅与进攻，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我们“佳电”的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

(四) 顾祝同称“新四军在各地之办事处、通讯处、留守处、仓库、修械所及一切非法组织一律封闭，武装解除，人员扣留”等语，令上官云相执行，上官此次消灭叶、项是很坚决的。

(五) 上官云相元未称：“鹿角山、东流山、凤里溪、李村一带之匪，元日被我们击毙俘虏者共七千余人，残匪千余仍在原地挣扎，限于十四日午后一时前，彻底肃清。”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反攻致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向刘少奇、陈毅询问 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1]

(1941年1月17日)

皖南部队究竟有多少人枪？你们说有九个团，张鼎丞说只有三个团，上官云相称俘我七千，尚有一部（似即傅秋涛）在外，是否属实，盼即告。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向刘少奇、陈毅询问皖南新四军人枪数目致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 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1]

(1941年1月18日)

(一) 蒋介石称“朱、叶各部迄未遵命移动，我应以党政军结合力量迫其就范，惟须防止该部向大别山、豫西流窜，影响大局，我应避难就易，避实就虚，相机消灭”等语。

(二) 何应钦称“江南新四军抗命不向北移，已饬顾长官派队将其完全消灭，计死亡万余，俘二千余，该军军长叶挺负伤，副军长项英阵亡，为防异军在陕晋方面有报复行动，应饬严防”等语。

(三) 蒋已令各战区进剿，李宗仁已任命汤恩伯为淮北区总司令，李品仙为淮南区总司令，王仲廉为鄂中区总司令，冯治安为襄西区总司令，开始进攻，限二月完成。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蒋介石已令各战区向我进攻情况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

(1941年1月18日)

此次惨变，并非偶然，实系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查自抗战军兴，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不久即合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三年余以来，该军转战大江南北，抗御强敌，屡建奇功，不但国人所尽知，亦为环球所共见。此等抗日有功之部队，理应加以爱护。乃当局人员，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反共之成见，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该军在鄂中之李先念支队，被程汝怀等攻击多次；在苏南之陈毅支队，迭受冷欣压迫；在苏北之管文蔚部，则受韩德勤压迫；在皖东之罗炳辉、淮北之彭雪枫部，则受李品仙压迫。该军和平江、在豫西之后方留守人员及受伤官兵，则迭被惨杀，曾发生有名之平江惨案与确山惨案。即该军参谋长张云逸之老妻幼子，亦被拘捕。此皆过去数年之事实，昭昭在人耳目者。近数月来，更变本加厉，苏北、皖东、鄂中各地，大举进攻，名曰剿匪，江淮一带早已闹得乌烟瘴气。不宁为是，去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总参谋长之名义，致电十八集团军朱彭总司令及新四军叶项军长，不顾事实，强调所谓军政、军纪，勒令新四军、八路军各部限期集中黄河以北。朱彭叶项为顾全

大局起见，允将新四军江南部队北移，是以有佳电之答复。至十二月底，新四军叶军长等，业将移动部队准备就绪，正欲开动之际，不意国民党各地言论机关，公开宣布该部北移消息，实际上不啻向敌人告密；同时即闻当局已对顾祝同，上官云相下达袭击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语。然外表则说已令各部协助通过，决无留难云云。叶军长等以言出负责当局，料可置信，乃于本月四日毅然开动，计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共约万人。不意甫经开动，即遭袭击，行至泾县、太平间之茂林村地区，即突被五十二师唐云山、一〇八师戎纪五、七十九师段茂林、一四四师范子英、四十师詹忠言、新七师田种毅、第十师王劲修等七万余人，统受顾祝同、上官云相指挥，分进合击，大举围攻。叶军长等一面仓促应战，且战且走；一面电告当局，质问理由。乃当局在该部被围血战七昼夜中，始终佯称已电顾祝同询问真相，并诡称已令顾氏撤围放行，实则密令各部实行其聚歼计划。至十三日，激战已八昼夜，我遵令北移遭遇袭击之新四军，果已弹尽粮绝，全部牺牲，已达当局聚歼之目的矣！至昨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已正式发出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逆”，并直认将皖南新四军部队歼灭，又谓该军军长叶挺负伤被俘，副军长项英在逃，正缉获中，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等语。一篇堂皇文告，已将其阴谋消灭抗日部队之真面目，赤裸裸地表白于全国人民面前。事有凑巧，正是十七这一天，日本同盟社亦从南京发出了一个惊人电讯。该电略谓：“重庆政府严令长江下游江南地区之共产军，于十二月二十六日以前移往江北，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使共产军早日移往江北，遂开始在东流附近围攻新四军及共产军各军队，共产军一部已于十日由荻港附近溃退江北。自十四日以来，日军各部亦攻击宣城、金坛附近之新四军，‘国民政

府’绥靖部队亦协助日军作战。”至此，一幕消灭抗日武装摧残异己力量之大阴谋惨案之真实内容，乃益大白于天下。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新四军为抗日部队，北移乃遵令行动，乃竟遭围击聚歼之惨变，军纪何在？国法何存？盖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实已无置辩之余地。

当江南新四军惨被袭击歼灭之际，当局复令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共二十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之新四军，所谓“一网打尽”之计划，固不仅限于江南一隅而已。同时，在西北方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者，亦有军队二十余万。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又要来一个“一网打尽”，大概快要下手了吧？！从这种种事实看来，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歼灭皖南新四军之无耻罪行，不过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仅仅是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以内战代抗战、以分裂代团结全部阴谋公开实行之开端。此等为敌张目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几十万党员，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数十万将士，绝对不能容忍，即全国军民爱国同胞和全世界主张正义之人士，亦绝对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全国一切爱国军民同胞，我们号召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义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以达到下述各项目的：

（一）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

(二) 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

(三) 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其家属。

(四) 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

(五) 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

(六) 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之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

(七) 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

(八) 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

(九) 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

我们深信：全国各党派及无党派的大多数军民同胞，一定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中华民族正处在抗战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前面。我们共产党人和全国大多数军民同胞深知在此艰危时局中，我们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采取的措置。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月18日)

国民党最近消灭皖南新四军，现在又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这表明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破裂的决心。国民党干出这件大事，定有帝国主义指使。国民党“皓电”“齐电”是准备破裂的具体步骤，我们去“佳电”也还不转变态度，这就证明下了决心反共。现在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华中部队，在各处大捕共产党员，因此我各办事处须实行自卫式的撤退。

[1] 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讨论为驳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谈话的文件，决定照原稿修改发表。这是毛泽东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1月18日)

立即转告克农，桂办应立即撤退，否则克农会被拘押，克农可回延安，密码密件立刻烧尽。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1月18日)

前因援救皖南，同意胡、陈建议包围韩、沈。现皖南已失败，华中汤恩伯（淮北区）、李品仙（淮南区）、王仲廉（鄂中区）、冯治安（襄西区）已开始向我进攻，因此我华中、山东各部须为适应反共军进攻而分别作具体之部署，统由刘、陈规定指挥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改变包围韩德勤、沈鸿烈的作战计划致刘少奇、陈毅、朱瑞、陈光、罗荣桓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徐海东电^[1]

(1941年1月18日)

闻病沉重，非常惦念，当此紧张时局，我们无限关怀你早愈、健康，特电慰问，希安心休养。

[1] 1941年1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慰问患病的徐海东。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徐海东，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1]

(1941年1月19日)

元日朱彭叶项抗议包围皖南新四军通电称：“我江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万人遵令北移，由叶挺等率领行至泾县以南之茂林地区，突被国军七万余人，重重包围，自鱼至文，血战七昼夜，死伤惨重，弹尽粮绝。”电讯传来，闻者心惊，读者发指。此等自毁军令，自坏国法，自相鱼肉，自损国力之举，实可谓无法无天之至！

溯自新四军奉令成立以来，以新组之师，武器服装极其残缺；即奉令开赴前线，抗御劲敌，屡建战功。论功行赏，对此抗战有功之部队，理应予以补给扩充，使成抗日卫国之精锐部队，保卫东南半壁。不意补充既不可得，当时〈局〉竟一再下令，强使北移。朱总司令等前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起见，苦心说服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并遵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定路线，向苏南转移北上，不意所谓命令移防者，竟是诱我聚歼之计，据朱彭等元电所称：“在战斗中据所获包围军消息，此项聚歼计划，蓄谋已久，全为乘我不备，诱我入围，其所奉上峰命令有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等语。”“同时，全国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在西北则筑万里长城之封锁线，在华中则派遣二十余师正规军实行

[1] 这是毛泽东为驳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月17日对制造皖南事变的辩词而写的一篇社论。

大举进攻。”由此可见：亲日派阴谋家和反共顽固派分子，正实行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制造分裂破坏团结之滔天罪行！

何应钦、白崇禧等曾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之资格，发出皓齐两电，要求皖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北撤，不料遵令北移之日，即阴谋进袭之时！既下命令强人以撤退，又下命令进攻遵令撤退之国军，出尔反尔，命令之尊严何在？总长之人格何存？

军委及第三战区顾祝同等，既再三下令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北撤，又指定苏南为移防路线，乃遵令向苏南移动之日，即七万大军乘机包围之时！手段毒辣如此，何白所称中央之仁义道德何在？

当新四军军部及江南部队被诱被围之时，军事当局一方面下“一网打尽，生擒叶项”之命令，另一方面又作沿途驻军绝不留难之诺言，口是心非，惨无人道，国家之法纪何在？当局之信用何存？

呜呼！命令！命令！军纪！军纪！天下无穷罪恶，均假汝之名以行！

由此可见：违令者即下令者，毁法者即造法者，而今而后，全国军民当更能洞悉此辈平日高唱军令森严国法神圣之论调，无非借作损人利己祸国殃民之遁词！

当德意日批评罗斯福援英为违反国际法时，罗斯福在其致七十七届国会咨文中公开宣称：“独裁者们所说的国际法，只是片面的东西，它缺乏互相遵守该法之精神，而仅仅成为压迫之工具。”罗斯福的这种说法，我们也可借用来赠给我国平日最敬佩罗斯福的那些独裁者和阴谋家们，也就是说：“这些口是心非之徒所说的军令国法，只是片面的任意杜撰的东西，它们缺乏互相遵守该等法令之精神，而仅仅成为压迫摧残异己之工具。”

言行不符，损人利己，本是此等人所代表的阶级之天性，对根

本没有仁义道德之人，本不应责备他们不仁不义不道德。中国古谚所说的“说的是仁义道德，做的是男盗女娼”，恰可作为此辈人的写照。此等人之所言所行，正如鲁迅所说：“有背于中国人为人的道德！”

但是，此等人今日之所为，非仅关他们个人的道德信誉问题，而实关整个国家民族命运问题。他们以分裂代团结之阴谋，以内战代抗战之罪行，实为帮助敌伪和危害民国之大不韪！对此辈此等无法无天之罪行，不仅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绝不能容忍，即全国爱真理论公道之大多数军民同胞亦绝不能坐视，我们呼吁和号召全国军民同胞和全世界公正人士与我们团结一致：

为惩办阴谋祸首而奋斗！

为解放皖南新四军部队而奋斗！

为撤退华中剿共军而奋斗！

为平毁西北反共封锁线而奋斗！

为停止全国大屠杀惨变而奋斗！

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奋斗！

我们深信：正义一定战胜罪恶！光明一定战胜黑暗！

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 应采取的步骤的指示^[1]

(1941年1月19日)

(一) 中央方针见另示。(二) 边区粮食正在筹备。(三) 兵工厂依现有条件很难扩充, 三酸厂在商讨建立中。(四) 蒋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 先打新四后打八路, 目前西北还不会进攻, 我亦不宜引起胡宗南之注意, 故边区军事不作新的调动。(五) 华北方面请照原计划按步做去, 惟增加紧张性。(六) 华中准备打长期的游击战, 以有利我军不利反共军为原则。(七) 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 将叶挺付审判, 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 其背景似以日德为多, 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提蒋名字), 见《新中华报》社论及中共发言人谈话, 惟仍取防御姿态, 在坚持抗日反对内战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 必要时打出手, 打到甘川去。在组织上拟准备撤销各办事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在政治、军事、组织上应采取的步骤致彭德怀、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1月20日)

目前时局的发展，我们要从根本上考虑了。自蒋介石十七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后，实际上蒋已准备得罪我们，得罪苏联，已是准备全部破裂的开始。蒋首先破裂，一切同情与理由都在我们方面。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取消十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 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1]

(1941年1月20日)

(一)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

(二) 中央决定将各办事处逐步撤销，人员陆续撤回，八路军总部不再向蒋呈报任何文电。

(三) 延安军委已经发表命令谈话，收到望广泛散播。

(四) 现在这样的国共关系，已对我们、对革命没有任何利益。并且破裂是蒋发动的，对我们甚为有利。

(五) 问题是□□□□□□□□□□□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备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地转入攻势。在准备时期，边区及晋西北方面不作大的军事调动，以免震动。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论。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发布“一·一七”命令后国共关系的变化及我之对策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抗战有功，驰名中外。军长叶挺，领导抗敌，卓著勋劳；此次奉令北移，突被亲日派阴谋袭击，力竭负伤，陷身囹圄。迭据该军第一支队长陈毅、参谋长张云逸等电陈皖南事变经过，愤慨之余，殊深軫念。除对亲日派破坏抗日、袭击人民军队、发动内战之滔天罪行，另有处置外，兹特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着陈代军长等悉心整饬该军，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嘱》，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止亲日派袭击而奋斗。此令。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1941年1月22日)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1]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

[1] 指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订立三国军事同盟条约。

后逐步演出。日寇和亲日派的整个计划为何？即是：

（一）用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布致朱彭叶项的“皓”“齐”两电^[1]，以动员舆论；

（二）在报纸上宣传军纪军令的重要性，以为发动内战的准备；

（三）消灭皖南的新四军；

（四）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以上诸项，均已实现。

（五）任命汤恩伯、李品仙、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向新四军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诸部实行进攻，得手后，再向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新四军进攻，而日军则加以密切的配合。这一步骤，已开始实行。

（六）寻找借口，宣布八路军“叛变”，取消八路军番号，通缉朱彭。这一步骤，目前正在准备中。

（七）取消重庆、西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逮捕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邓颖超诸人。这一步骤也正开始实施，桂林办事处已被取消。

（八）封闭《新华日报》；

[1] “皓”“齐”两电，是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在1940年10月19日（皓）和12月8日（齐）发出的两个电报。《皓电》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诬蔑，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中共中顾全大局，挽救危亡，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1月9日（佳）电复何、白，除据理驳斥《皓电》的造谣外，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朱、彭、叶、项的《佳电》而发，为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舆论上的动员。

(九) 进攻陕甘宁边区，夺取延安；

(十) 在重庆和各省大批逮捕抗日人士，镇压抗日运动；

(十一) 破坏各省共产党的组织，大批逮捕共产党员；

(十二) 日军从华中华南撤退，国民党政府宣布所谓“收复失地”，同时宣传实行所谓“荣誉和平”的必要性；

(十三) 日军将原驻华中华南的兵力向华北增加，最残酷地进攻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全部消灭八路军新四军；

(十四) 除一刻也不放松对于八路军新四军进攻之外，在各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继续去年的休战状态，以便转到完全停战议和的局面；

(十五) 国民党政府同日本订立和平条约，加入三国同盟。以上各步，正在积极准备推行中。

以上，就是日本和亲日派整个阴谋计划的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曾于前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上指出：投降是时局最大的危险，反共是投降的准备步骤。在去年七月七日的宣言中则说：“空前的投降危险和空前的抗战困难，已经到来了。”朱彭叶项在去年十一月《佳电》中更具体地指出：“国内一部分人士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故皖南事变及重庆军事委员会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不过是一系列事变的开始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盖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

不成的，何况如此惊天动地的大事？在目前的时机下，欲改变发令者此种决心似已甚难，非有全国人民的紧急努力和国际外交方面的重大压力，改变决心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故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若问中国的前途如何，那是很明显的。日寇和亲日派的计划即使实现，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但有责任，而且自问有能力，挺身出来收拾时局，决不让日寇和亲日派横行到底。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其原因，则是：

（一）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

（二）中国其他党派（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党员，鉴于民族危亡的巨祸，必有很多不愿意投降和内战的。有些虽然一时受了蒙蔽，但时机一到，他们还有觉悟的可能。

（三）中国的军队也是一样。他们的反共，大多数是被迫的。

（四）全国人民的大多数，不愿当亡国奴。

（五）帝国主义战争现时已到发生大变化的前夜，一切依靠帝国主义过活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于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观了。

（六）许多国家革命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这些国家的革命和中国革命必然互相配合，共同争取胜利。

（七）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力量，它是决然帮助中国抗战到底的。

因为上述种种原因，故我们还是希望那班玩火的人，不要过于

冲昏头脑。我们正式警告他们说：放谨慎一点吧，这种火是不好玩的，仔细你们自己的脑袋。如果这班人能够冷静地想一想，他们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并且很快地去做下列几件事：

-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 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1]；
-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2]，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我们是珍重合作的，但必须他们也珍重合作。老实说，我

[1] 西北封锁线，指国民党反动派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在皖南事变前夜，国民党在边区周围已经修筑了五道包括沟墙和碉堡的封锁线，西起甘肃、宁夏，南沿泾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同时，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也增加到20余万人。

[2] 参见《论语·季氏》。季孙，鲁国大夫。颛臾，春秋时小国。萧墙，古代官室内当门的小墙。季孙将伐颛臾，孔子以为季孙之忧不在外而在内。

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我们让步的阶段已经完结了。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是他们自己性命交关的大问题，我们不得不尽最后的忠告。如若他们怙恶不悛，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关于新四军，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已于一月二十日下了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该军在华中及苏南一带者尚有九万余人，虽受日寇和反共军夹击，必能艰苦奋斗，尽忠民族国家到底。同时，它的兄弟部队八路军各部，决不坐视它陷于夹击，必能采取相当步骤，予以必要的援助，这是我可率直地告诉他们的。至于重庆军委会发言人所说的那一篇，只好拿“自相矛盾”四个字批评它。既在重庆军委会的通令中说新四军“叛变”，又在发言人的谈话中说新四军的目的在于开创京、沪、杭三角地区创立根据地。就照他这样说吧，难道开到京、沪、杭三角地区算是“叛变”吗？愚蠢的重庆发言人没有想一想，究竟到那里去叛变谁呢？那里不是日本占领的地方吗？你为什么不让它到那里去，要在皖南就消灭它呢？啊，是了，替日本帝国主义尽忠的人原来应该如此。于是七个师的聚歼计划出来了，于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发布了，于是叶挺交付审判了。但我还要说重庆发言人是蠢猪，他不打自招，向全国人民泄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计划。

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 给刘少奇的通报^[1]

(1941年1月23日)

一、(略)。^[2]

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国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

[1] 这是毛泽东关于“一·一七”命令后形势的估计给刘少奇的通报的主要内容。

[2] 原件无第一段。

对《解放日报》一篇社论^[1]的批示

(1941年1月23日)

请门教员^[2]把这个社论向战士宣读。

毛泽东

元月二十三日

[1] 指1941年1月23日《解放日报》上的《皖南事变真相》一文。

[2] 即门书明。当时任毛泽东身边警卫人员的文化教员。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1941年1月25日)

恩来：

人家已宣布我们叛变，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因此延安命令及谈话^[1]的全部，包括文字在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表明态度之后听凭蒋介石去处置，或者他执行我们的十二条^[2]，两党重归妥协，或者实行全面破裂。你们应向各方表示，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对立地位，除非蒋介石取消十七号命令^[3]及实行其他必要步骤，

[1] 延安命令及谈话，指1941年1月20日为皖南事变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

[2] 十二条，指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1941年1月20日为皖南事变对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要求。即：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3] 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

我们决不能怕破裂

我们是只有和他对立一途，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路走，你们应迅即回延。余详书记处电。

毛泽东

有申

关于对蒋介石的策略^[1]

(1941年1月25日)

彭、朱、周：

(一) 我们对于皖南事变及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处置，见一月二十日延安军委命令及谈话。我们须一口咬定这是日寇与亲日派（不说蒋）的计划。关于所谓军纪军令迫我北移及各地捉人杀人一切反革命行为，我们均咬定是亲日派承日寇命令所为。这样一来，使我政治上处于优势，使蒋介石及国民党不得不转入辩护地位，并不是蒋与日本业已讲和了，关于蒋日间矛盾，即使很小，我们还是可以利用的。

(二) 我们一月二十日的策略，可以对付两种情势中之任何一种：如蒋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

(三) 我们三个月来的让步态度（“佳电”及皖南撤兵），取得了中间派的好感，但给了蒋以向我进攻的机会。这种态度应立即结束，转到尖锐对立与坚决斗争的立场。

(四) 一月十七日的步骤是蒋一大失策，我们须紧紧捉住，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

(五) 如要转弯，除非蒋介石取消一月十七号命令及作其他必要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蒋介石的策略问题给彭德怀、朱德、周恩来的电报。

表示，否则我们决不能转弯。

（六）蒋的阴谋是各个击破，把新四军看成地方事件。我们却不能这样，必须把他看成全国性事件。

（七）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

（八）但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在这点上我们仍是防御的。

（九）不出三个月德必攻英，日亦还有可能攻华，世界局势必有变化，蒋介石的气焰可能减低。但如英国根本失败，罗斯福应付不来，蒋的投降可能就大了。

（十）中间派话不可不信，不可尽信，只有我们取坚决斗争绝不妥协的立场，才能真正争取中间派，否则，中间派的动摇立场客观上是于蒋有利的。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五日

关于对付蒋介石的方针致周恩来电

(1941年1月27日)

(一) 同意逐步撤退办法。

(二) 但须估计到蒋全部逮捕我们的人，须准备应付全部逮捕。

(三) 西安撤退的二十五人，由李华率领，有完全合法护照，行至潼关被十六军扣留，朱总已电熊、胡，请饬放行，未知结果如何。

(四) 如不实行十二条，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五) 日蒋矛盾尚可利用，李宗仁以信阳、应山敌北进至新安店集中者达两万余，炮百门，战车三十辆，飞机二十架，并仍续有增加，有向豫北进犯企图，令各集团军部署对敌。汤恩伯主力正在确山以北布防中。莫德宏以华中敌军乘我清剿匪军之际，集结主力于信阳附近，令其商城各部布置对敌等情。敌如大举进攻，必是日寇配合亲日派之行动，目的在威胁蒋介石妥协，亦是蒋毁掉之步骤。

(六) 我之方针是捉住江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死也不放，破裂是蒋发动的，蒋把我们推到不能不和他对立的地位，我们领导的军队已被宣布为叛变，我们已无任何可能再与蒋介石发生关系，除非他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我们没有和他谈判的余地，这种余地已被蒋剥夺干净了。办事处人员要打要杀权在他们，我们是每人都准备杀头的。如他们亦认为两军相交不斩来使

则放我们的人回延，否则由他们自便。在他们没有宣布全部破裂以前（取消八路番号、宣布中共叛变），我们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以待他们之觉悟。这些都应公开向张冲等说明。

（七）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通电即日发你处。

（八）延安一切这类文件如不便于由办事处发出，则用间接方法秘密散发，以保办事处安全。

关于皖南事变后 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1]

(1941年1月28日)

(一) 延安军委已公开发表新四军领导人员，发表抨击重庆谈话，并代你们发表就职通电及声讨亲日派宣言，你们都收到否？望广为散发。

(二) 在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新四军叛变后，我们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应有政策上的变动，即由一打一拉政策改变为完全孤立他的政策，在党内外尽量揭破他的反动阴谋，惟在蒋没有宣布全部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变），我们暂时不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但对实行三三制及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指示中所述各项政策均不变，对统一战线原则均不变。

(三) 对皖南失散力量，张、邓^[2]应设法派人过江加以指导，目前除过江者外，尚应收集一部在芜湖一带抗日，以便将来向南发展，扰乱国民党后方。

(四) 对皖西、鄂东及河南方面即应布置游击战争，在皖西之舒城、潜山一带，张、邓负责加强游击纵队的力量，以便不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关于皖南事变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

[2] 张、邓，即张云逸、邓子恢。

能向大别山前进。在鄂东之浠水、黄梅一带，在豫西现时敌人进攻地区（敌已占领泌阳），由先念负责布置。雪枫应准备两个精干的游击支队，以便在适当时机派往豫西活动。苏南方面望胡、陈速^[1]收集皖南东移力量，暂时在苏南活动，准备将来出天目山。

毛 朱 王
俭 申

[1] 胡、陈，即胡服（刘少奇）、陈毅。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1月28日)

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发言人谈话，一月二十日中央军委命令及谈话，一月二十三日新四军将领就职通电，一月二十四日新四军声讨亲日派通电，均收到否？望广为散播。并指出：你处宣传活动，即根据这些文件，并望将这些文件寄给刘晓^[2]和英、美共产党。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2] 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

给萧三的信

(1941年1月29日)

萧三同志：

诗读过了，很有意思。报纸既不登，就在街头发表好了。有暇
望来谈。

此致

敬礼！

原件还你。

毛泽东

一月二十九日

关于时局发展情况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1月30日)

(一) 中央谈话与军委谈话原则上无分别，只是中央谈话是十八日发表的，主要只说明皖南事变；军委命令及谈话是二十日发表的，提出了全部问题，并尖锐地表明是与重庆军委会十七日命令谈话对抗的。如觉得在重庆一同发表无碍则一同发表，否则只发表军委命令谈话亦可。

(二) 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其时间快慢长短，依国内外各种条件决定。我们方针不是促他快，但要准备他快，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办事处尚须留下少数人撑持门面，因此，相当的时间是可能的，□□□延长时间的意见是对的，事实上我出兵至快在半年后，目前只打防御战。

(三) 苏联如再接济重庆武器甚为不好，请要武官设法停止。

(四) 同盟社广播日军占领泌阳，似有攻南阳讯，汤恩伯已将新蔡部队撤至上蔡集中，准备对敌。

(五) 西安讯，胡宗南答应电潼关放行李华等二十几人，看后如何。

(六) 边区正在加强军事与经济上的准备。

(七) 在国民党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我们并不断绝和他们来，惟对两党关系，须坚持我们十二条件，不再谈其他问题

移、扩军、边区等)。

(八) 蒋二十七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各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今日决定由我作一讲演以对抗之。

对《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的说明^[1]

(1941年1月30日)

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是全面破裂的开始，这种估计是正确的。破裂的责任在蒋介石，一切理由都在我们这边。前年七七宣言斗争性多，去年七七宣言团结性多。蒋介石认为我们去年的七七宣言及“佳电”能得到中间派的同情，便抓住我们。我党只有采取尖锐对抗的政策，才能抵制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讲话，说皖南事变只是所谓军纪问题、局部问题，我们必须说明是政治问题、全局问题、外交问题，是日寇与亲日派推到投降反共的一方面。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还有一些时间。这种破裂不应说是国共之间的破裂，而是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与全国人民之间的破裂。我们要维持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中共必须保持独立性。应公开批评蒋介石。对目前时局的解决办法是十二条。

日本企图使中国彻底投降，亲日派想推动蒋介石由抗战到投降，蒋介石目前还是第三集团。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说明《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的讲话的一部分。

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1]

(1941年1月30日)

感电^[2]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电的主要

[2] 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1月27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等：我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等电^[1]

(1941年1月30日)

我们须利用从开始破裂到全面破裂之间的一段过渡时间，因此中央决定在目前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而动员民众团体发表文件，在报纸上发表社论，声援新四军，驳斥重庆军委会一月十七日命令及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演说。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致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及各师各军区政治部、新四军各级政治部电的主要内容。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1941年1月31日)

岸英、岸青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1]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1] 林伯渠，1939年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这些书赠给岸英、岸青并与各小同志共之。由林彪同志转交你们。

毛泽东

一月三十一

精忠岳传2，官场现形4，子不语正续3，三国志4，高中外国史3，高中本国史2，中国经济地理1，大众哲学1，中国历史教程1，兰花梦奇传1，峨嵋剑侠传4，小五义6，续小五义6，聊斋志异4，水浒4，薛刚反唐1，儒林外史2，何典1，清史演义2，洪秀全2，侠义江湖6。

請帶交莫斯科
由我處交周鳳
世等也同共計交
承情兒日私

毛泽东致毛岸英、毛岸青信的信封。

为严正岗题词

(1941年1月)

慢慢学习，就会进步。

毛泽东

慢：为子瑛。
社会进步。
毛泽东

毛泽东为严正岗的题词。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 应着重于三个基本战略区^[1]

(1941年2月1日)

胡、陈，并告德怀：

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第一个基本战略地区是鄂豫陕边。其办法由彭雪枫、张云逸、李先念^[2]三地逐步向西推进，以在一年内达到在鄂西、豫西及陕南建立游击根据地为目的，利用日蒋矛盾及目前日寇向豫北豫西进攻机会（日寇此次东从涡阳南从信阳作包围汤李何桂^[3]之战役攻击，汤李何有受极大损失可能）。你们第一，应令彭雪枫准备几个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4]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彭雪枫部应恢复新四军番号，如将来华北部队南进，亦用新四军番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胡服（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并告彭德怀的电报。

[2] 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员。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指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何，指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桂，指国民党军的桂系部队。

[4] 平汉，即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线一段。

号。新四军现在是被蒋介石宣布为叛军了，他可不受任何法律拘束（国民党元老中有忧虑浙赣皖豫将遍地皆匪者）。如此着成功，黄克诚^[1]应准备向河南发展。第二，你们应令张云逸、邓子恢^[2]向皖西发展，应使他知道打破桂军进攻主要是取外线发展的方针，桐城根据地是绝好战略基地。此次敌军进攻，莫树杰^[3]已令其商城部队应战，如敌军打汤李何后移向在大别山集中的桂军主力进攻，张邓就可将主要发展方向移至皖西。去年十月你们复电谓巢湖、瓦隔湖间不过百里，通过甚难，但现时我在无为、桐城已有根据地，虽只一二县，其战略意义却胜过敌后大块根据地，应极端重视之。第三，李先念的发展方向是鄂西、豫西、鄂东三方面，鄂东即令现有之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4]担任，加强其政治领导能力。鄂西、豫西均随着日寇的进展向前推进。以上彭张李三区均能很好利用日蒋矛盾，实施我之战略发展。华中第二个战略中心是江南根据地，又分为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四方面。苏南是江南聚集力量的中心，应用大力经营之。该方情况我们不甚明了，望作一详报来。该方将来应准备出天目山。皖南应派人过江指导残余力量仍在芜湖一带抗日，在一年内逐渐聚集一个二三千人枪的支队，联系地方党，准备将来向黄山及赣东北发展，不要全部过江，已过江的待生息一时期后仍可考虑派他们回到芜湖一带去。自一月十七日后形势

[1] 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 邓子恢，当时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3] 莫树杰，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军军长。

[4] 浠水、黄冈支队及路东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鄂东地方抗日游击武装。浠水黄冈两县游击大队分别成立于1940年8月和1940年1月。鄂东游击总队于1940年1月成立，熊作芳任队长，程理任政治委员。

大部改变了，过去项英^[1]错误的南进政策，用在今后就是正确的。皖南损失，据国民党报道亦只伤亡二千余，俘虏三千余。项部原有万人似尚有三千左右已突出或被击散，你们应注意派人指导收集，其往苏南者即在苏南行动，不要过江了。苏南应加强无线电通讯，该方至少要有五个电台。皖南应立即着手建立一个电台。曾希圣^[2]愿打游击不愿做老工作，可以就令他带领现到无为的部队，将来可令他回到皖南去。如可能并必要时，你们亦可考虑派孙仲德^[3]随曾希圣过江。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4]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江南第四个战略基地是闽浙赣边。该方有三个藏有少数武装与民众甚好的小根据地，你们目前应开始了解该方情况，小姚^[5]曾有详报，如你处没有可转给你们。该地目前是加强地下工作，准备将来武装起义，恢复过去公开根据地。以上是江南四个战略基地的指导任务。第三是苏鲁战区。这是目前华中的基本根据地，主力所在，用力最大，并应准备于一年内消灭反共军聚集大量武装力量的地方，但你们应把这地方看作向西向南发展的策源地。他在总任务上的作用是出干部、派军队向西边南边去的地方，好像汉高祖的关

[1] 项英，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副军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牺牲。

[2] 曾希圣，原任中共中央军委二局局长，1940年调新四军军部工作，同年秋率军部部分干部到达皖中无为，负责组织皖南独立支队和收容皖南事变中失散人员。

[3] 孙仲德，当时任新四军第二师第六旅副旅长。

[4] 总指挥部，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1940年11月成立。

[5] 小姚，即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中。我们现在有华北、苏鲁及南方（闽粤）三个大的战略根据地。华北的任务是出陕、甘、川、云、贵，你们的任务是出鄂豫陕边与闽浙赣边，南方的任务是经营五岭南北。为适应蒋介石暂时只打击新四军的情况（各个击破策略），除你们提议的编四个师外应加黄克诚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共有六个正规师。时局虽变化甚大，但日蒋矛盾仍可利用，仍是目前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中之最基本矛盾。蒋介石无论他怎样造反，但闹来闹去，只会把他自己闹垮台的。中央关于一月十七日以后新时局的决定，不日可以发给你们。

毛 朱 王
东

复彭德怀电^[1]

(1941年2月1日)

日蒋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我们仍须尽量利用之，使时局再拖几个月的可能性仍是有的，国共由一月十七日的开始破裂到将来某时的全部破裂有一个过程，此过程可能短，亦可能长，由日蒋矛盾的变化及我们政策来决定，我们方针是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但我军事准备应放在可能短一点上。目前政治上我已有主动性，军事上亦必须掌握主动性，估计此主动性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才能完全到我手中。我们决不能丧失主动性。这是胜利与失败的重要条件。国际条件今年夏秋必有一个变化，明春又会有一个条件。

[1] 这是毛泽东关于日蒋矛盾等问题复彭德怀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2月2日)

中央决定在蒋介石对新四军问题没有满意解决以前，我八路军停止给他任何呈报（战报亦停止），亦不向他请领经费。他的来件，办事处可以照例收下，但不要复他。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彭德怀、左权、周恩来、叶剑英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日)

(一) 剑英本日上午十时抵延，畅谈五小时，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2]亦看到，为之神往。(二) 小超同志照片收到，敬谢。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指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2月2日)

彭雪枫部和黄克诚部均须用新四军番号。刘、陈应速将苏南、苏北、皖东、鄂中、淮北及克诚六部编为六个师，将各师师长、政委名单立即电告，以便军委立即发表委任令，广播全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彭雪枫、黄克诚电的主要内容。

只有恢复国内团结 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1]

(1941年2月2日)

周、董（重庆），廖、潘（香港），刘晓（上海），谭秋（迪化），胡、陈，先念，云逸，雪枫，朱瑞，罗、陈，黎、罗，彭、左，刘、邓，任穷，聂、彭，吕、程，贺、关，萧克，高、萧^[2]（抄送）：

（一）日寇乘蒋介石注全力于反共之际，集中数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3]诸军约十五万人于平汉以东。信阳一路为敌之主力，连日向北急进，正与汤恩伯主力激战中，已占领泌阳、舞阳、西平、上蔡各县，叶县电讯已不通，董立煌^[4]仓卒赴叶县督师，洛阳政府机关向卢氏迁移。同时宿县之敌渡过淮河占领蒙城、涡阳，正与何柱国、李仙洲激战中。开封之敌，亦有由尉氏南下讯。潼关一带之中央军星夜向前线增援，敌另以荆当^[5]一带作小出击，牵制川军、西北军不能北援。

（二）此次河南战役^[6]是宜昌战役^[7]后最大的战役，不论其军事果如何，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以很大的打击，因他煽起皖南事变造国共间深刻裂痕，敌乃乘虚而入。蒋介石自三国同盟成立、日美矛盾激化、英美苏三国助华之后，即兴高采烈，轻视日本，集中其全力拼命反共。乃蒋介石一手造成国共裂痕之后（皖南事变解决新年，一月十七日下令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后），敌即于一月下旬发动

大举进攻，蒋介石反共结果已如此明显。各地应强调宣传蒋介石此种全力对内的反革命作法，完全为敌人造机会，如不变计，必至闹到亡国；强调地提出我党中央解决时局的十二条办法，只有蒋介石立即悔祸，实行我党中央所提办法，才能使已被蒋介石开始破裂了的国内团结重新恢复，只有恢复国内团结，才能抗御日寇之进攻，挽救国家于危亡。

（三）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展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遣叶剑英^⑨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于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至要。

附中共中央委员会向蒋介石提出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中的“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付国法审判。

中央书记处

东^⑨（剑英已于二月二日上午抵延）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分局、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报。

[2] 周、董，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廖、潘，指廖承志、潘汉年，当时均在香港从事统战工作。刘晓，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潭秋，即陈潭秋，当时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新疆办事处主任。胡、陈，指胡服（刘少奇）、陈毅，当时分别任新四军政治委员和代军长。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罗、陈，指罗荣桓、陈光，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和代师长。黎、罗，指黎玉、罗舜初，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彭、左，指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任穷，即宋任穷，当时任八路军东进纵队兼冀南军区政治委员。聂、彭，指聂荣臻、彭真，当时分别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吕、程，指吕正操、程子华，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贺、关，指贺龙、关向应，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二〇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萧克，当时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高、萧，指高岗、萧劲光，当时分别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和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

[3] 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李品仙，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4] 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5] 荆，指荆州，镇名，位于湖北江陵县中部。当，即今湖北当阳市。

[6] 河南战役，又称豫南战役。1941年1月24日，日军分三路向豫南进犯。国民党军采取了避免正面作战，主力机动转移的方针，使日军无隙可乘，未能到汤恩伯部主力作战。日军处处扑空，遂改变作战计划，中国军队则乘

机反攻，逐步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豫南战役自1月24日起，至2月10日止，前后共进行了18天。

[7]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进攻宜昌地区，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失利，宜昌于6月14日失陷。

[8] 叶剑英，当时任中共驻重庆代表。

[9] “东”为韵目，代1日。此电于1日起草，2日完成并发出。

日军进攻态势及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1]

(1941年2月2日)

彭、左，刘、邓，胡、陈，雪枫，克诚，云逸，朱瑞，陈、罗，黎、罗，先念，周、董^[2]（重庆）：

甲、敌有占洛阳可能，汤胡卫^[3]主力有被击溃可能，中条山胡卫两军、大别山桂军^[4]均有处于狼狈地位可能，西北胡军有一部援豫可能，反共高潮可能下降，中日矛盾仍属第一。乙、我之方针：（一）政治方面，继续攻势，针锋相对，跟踪追击，坚持十二条，对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的电报。

[2] 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胡、陈，指新四军政治委员胡服（刘少奇）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雪枫，即彭雪枫，当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克诚，即黄克诚，当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云逸，即张云逸，当时任新四军副军长。朱瑞，当时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陈、罗，指陈光、罗荣桓，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和政治委员。黎、罗，指黎玉、罗舜初，当时分别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和参谋长。先念，即李先念，当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周、董，指周恩来和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

[3] 汤，指汤恩伯，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指卫立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4] 指驻守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

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1]咬住不放，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但目前绝不松口（此条由周董负责）。（二）军事方面，八路原地不动，仍不松懈准备，新四力争河南，不惜全力以赴（克诚即改新四番号，新四已成全国人民中极荣誉军队，这是皖南代价换来的）。丙、统战方面，彭左、刘邓注意中条各军，雪枫注意河南各军，先念注意湖北、河南各军，大大发展交朋友，共同打退日寇的进攻，良机难得，以德报怨。丁、苏鲁两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坚决歼灭之。

毛 朱 王

冬亥

[1] 指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通令。这个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新四军番号撤销，叶军职交军法审判。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2月5日)

同意用毛、朱、周名义致电陈嘉庚、柳亚子、张一磨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致廖承志电的主要内容。

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1]

(1941年2月7日)

彭、左：

关于炮兵问题，为保存与训练我们的炮兵，总部之炮兵团（前方又留一部），聂军区^[2]、贺师^[3]之山炮兵，应集中延安附近训练，设立炮兵司令部直属军委。否则将来日寇封锁线加密，前方炮兵团有不能通过之可能。但在国共未全部破裂之前，我又才^[4]能打出去，大概今年是^[5]可能出去的，炮兵西开，华北又没有炮用。

毛 朱 王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给彭德怀和八路军参谋长左权的电报。

[2] 聂军区，指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

[3] 贺师，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

[4] 才，似为“不”字之误。

[5] 此处似漏一“不”字。

对日军进攻形势 和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

(1941年2月7日)

恩来^[1]同志：

(一) 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2]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3]召来的。

(二) 汤集团^[4]损失不小，三个军已转回豫西，南阳四日失陷。李仙洲^[5]尚在淮河西岸，战况亦烈。敌一路由上蔡攻占项城捣李之背，一路由亳州攻占太和迫李之前，估计李军战败亦将西撤。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6]主力现与后方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这对桂系是一大打击，估计莫德宏部^[7]将来亦有西撤退可能。范汉杰军^[8]已

[1] 恩来，即周恩来。

[2] 1940年6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宜昌地区，国民党军进行防御作战失利，宜昌于6月14日失陷。

[3] 蒋何白反共计划，指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1940年11月14日制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计划”和“解决江南新四军案”。

[4] 汤集团，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5]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

[6] 指驻守在大别山地区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的部队。

[7] 莫德宏部，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师，师长莫德宏。

[8] 范汉杰军，即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

从中条山南调，如洛阳危急他军亦非渡河不可，原定庞炳勋^[1]出冀南隔断我冀鲁交通的部署当然要放弃。胡部李铁军军^[2]已星夜东调，第八师从正宁撤至邠州^[3]大概是准备东调的，包围边区兵力已经减弱。河南战况发展有再调一部可能。总之，“剿共”计划已根本打破了。

（三）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4]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我在反共了，国共冲突扩到很大，日本会坐山观虎斗吧，拖过几个月，希特勒就会迫令日本南进，中国就太平了。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第一，时间不让他等待。国共冲突固然很好，但你是骗我拖延时间的，倒不如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把你削弱，中国问题就易解决了。三十日东条^[5]演说有云：“蒋政权内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幻想打破了。第二，日本人不愿意我们

[1]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2] 胡部李铁军军，指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第七十六军，军长李铁军。

[3] 邠州，旧县名，即今陕西彬县。

[4] 指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的通令。这个通令诬称新四军“抗命叛变，逆迹昭彰”，着将新四军番号撤销，叶群革职交军法审判。

[5] 东条，即东条英机，日本战犯。九一八事变后，历任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1940年至1941年任日本陆军大臣，积极主张扩大侵华战争和准备对美英的战争。

去华北。东条公开说：“华北是日本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中共产军去华北，破坏日本利益”。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有估计到。

（四）在外边宣传时，请将“佳电”中“肺腑之言”那一段（从“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蜂起之时”起，至“深愿为两公一吐者”止，共一百零二个字^[1]）着重指出，使国民党及中间派想一想，目前发生在国共间中日间的危险状况，我们实不幸而言中。他们一定要“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所以造成了“我为鹬蚌，故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的结果。

（五）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此种估计是否适当，你的意见如何？

毛泽东

虞西

[1] “佳电”指中共中央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同年10月19日（皓）电的电报。其中“肺腑之言”一段文字为：“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故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何及。此则德等肺腑之言，深愿为两公一吐者。”

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

(1941年2月7日)

自蒋介石、何应钦等一月十三日歼灭新四军皖南部数千人及重庆国民政府军委员会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审判叶挺的反革命命令后，影响中国政局变化极大，特综合各方情况如下：

(一) 重庆国民党中央方面：极力动员反共舆论，强迫全国报纸登载污害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向中外宣传这只是军纪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的谈话，同样企图用执行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意义，麻痹中外人士。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大批逮捕共产党员与进步分子，实行阴谋陷害，制造自首运动，监视与扣留各办事处人员；在军事上集中汤恩伯、李品仙二十万大军进攻华中新四军，并密令把华中八路军当作新四军来打，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加紧建筑封锁线并举行局部进攻。他们这些做法都是想用压力把我们一下压服下来。但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何应钦、白崇禧主张痛快地干一下，何、白曾用电报征求前方将领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陈诚电复主张全面进攻，传何、白电令傅作义布置进攻八路军的军事，何健、陈济棠主张杀叶挺，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说何是阴谋，但未及蒋，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地说何骗了他，张冲（国民党中委

与我们办交涉者)表示无办法,没有脸见人。国民党员有担心破裂者,老党员甚至说出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国民党人员亦多忧虑愤慨,表示此事做得过火,亦有表示恐慌者。

(二)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深感为民主与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第三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孙夫人、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中央委及名人联名致蒋书,指出何应钦亲日派阴谋,深望蒋勿为奸小所惑,悬崖勒马,贯彻总理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许多民族资产阶级代表如黄炎培等,一方面对被难新四军表示同情,一方面对抗战前途表示失望;黄炎培拟见蒋陈述三点:(甲)望蒋适可而止;(乙)军纪固重要,但亦须注意收集民心;(丙)请蒋把眼光向外。他向人表示:不论事情经过之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中间势力中有希望中共表示强硬态度者,亦有表示悲观动摇者。杂牌军及地方实力派中多数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他们说:“以杂牌消灭杂牌,中央则不许杂牌存在。”因而表现恐慌与对我同情。

(三)金融界自事变发生后,各种物价更形高涨,外汇跌落,各银行无行市,汇丰银行停止挂牌,陈光甫等银行家停止向内地投资。

(四)广大民众及进步势力表示对国民党愤恨,对共产党同情,认为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战,中国内战就要亡国,许多青年学生、工人、职员看到这个消息时,有流泪的,有苦闷的,有愤怒的,有许多学校进步分子逃走。

(五)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

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

(六) 英美方面，除少数（如美大使及其海军武官及秘书三人均听何的话，说新四军抗日不是真的）及有些反动记者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局部问题，同英美无关外，大多数外人认为此事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与英美利益，他们发表文电，要求英美当局给中国当局以压力，不使事变扩大，某美记者在香港发出之消息谓：新四军并非违抗命令，在重庆与各要人谈话，深感中国形势之严重，希英美注意，中共军队全部开河北之后，国民党军队定会与日军划缓冲区，如此日军易于南进，望英美注意。重庆某外人称，外人连教会老太婆在内都愤慨说，无论理由如何，新四军是抗战的。香港英文《南华日报》社论指出：

甲、新四军之撤退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所占领。

乙、中共的力量已经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丙、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基本要求与希望及其远见，要比保有封建的民族领袖强得多。

丁、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内部的纪律才行。

英大使曾见蒋劝告停止国内冲突，闻英美方面对国民党表示惋惜，共党虽反对资本主义，但中国为了大局，中央（国民党）处理问题，勿操之过急，以免迫成事变。美国居利来华，闻与考查新四

军问题有关，美借款事及中印通航事闻均因新四军事件发生障碍。德国通讯社通讯说：新四军是抗日最好部队，当他们遵令移动时为大军袭击，恐与英美有关，目前中国内部矛盾尖锐，前途恐有蒋汪合作，他估计美德如战，日本必退盟，届时日美联合牺牲中国。韩国人闻叶挺被俘甚不平，说中国一内战，韩国人解放希望就完了。

（七）日寇方面，表示兴高采烈。南京开庆祝大会，汪精卫演说，谓蒋介石近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好事，只有这件事做得很不错。日本乘着重庆方面集中力量反共，特别是一月十七日命令发表后，十八日便开始调动七个师团，二十四日便大举向河南进攻，现国军仓促应战，许多将领感觉到上了亲日派何应钦的大当。

（八）综合各方面情况，截至今日，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

(1941年2月7日)

兹颁布八路军新四军之军政委员会的条例望各级遵照执行。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军政委员会条例

(一) 游击战争的环境与部队的分散行动，要求一定限度的集体领导与一定限度的集中指挥。

(二) 为此目的，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以前军队与地方党政合组的军政委员会，一律改名为军政党委员会，以资区别），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

(三) 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司令员、政委、政治主任、参谋长等重要负责人组成之。人数不超过五人至七人，由每级提出名单，经上级决定之。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一般的由政委担任。

(四) 军政委员会为执行上级指示，决定该部大政方针，布置工作及检讨工作的计划机关。凡关系本部的军、政、党、后勤等一切工作，均可讨论决定。但军政委员会并非执行机关，其决定应交各部门执行之。例如关于军事工作的决定，应交司令部执行，关于

政治工作的决定，应交政治部执行等。军政委员会，只应讨论比较重大问题，把一切琐碎细小问题提交军政委员会，是错误的。

(五) 军政委员会，应批准干部之升任与调动，但关于党员的处分与入党批准等等事宜，仍由党务委员会决定。

(六) 军政委员会的决定，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下达，而应根据决定之性质，分别由司令机关、政治机关用命令下达之。下级对上级报告，也不用军政委员会名义，由各部门分别的向上级报告。

(七) 军政委员会在讨论问题时，如遇争论不能解决，应呈报上级决定之。关于紧急问题，司令员与政委仍有独断专行之权，但应将各种不同意见报告上级。

(八) 各级军政委员会，每月至少开会一次，至多两次，不得无故不召集开会。

(九) 应向干部解说军政委员会之设立，是为适应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以收集体领导团结干部之效能。但军队仍是集中的组织，上级司令员、政委及各部之命令，下级应绝对执行，下级军政委员会无权讨论拒绝命令之执行，即同级各部门亦应执行首长之命令，因为一切均应经过军政委员会的虚伪的民主情绪是错误的、应当防止与纠正。军政委员会之设立，并不削弱个人负责制。

(十) 本条例解说及修改之权，属于中央军委。

(十一) 本条例经中央书记处批准。

前定会议决定缓开^[1]

(1941年2月10日)

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
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的主要内容。11日，中央政
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2月11日)

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致刘少奇、陈毅等电^[1]

(1941年2月12日)

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2]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电的主要内容。

[2] 汤军，指汤恩伯部。

致刘少奇电^[1]

(1941年2月12日)

望令克诚部向西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致彭雪枫电^[1]

(1941年2月13日)

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电的主要内容。

目前的国共关系和我们的策略

(1941年2月14日)

恩来同志：

各电均悉。

(一) 估计是一致的。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

(二) 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

(三) 敌必向蒋^[1]进攻，某君^[2]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

(四) 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五) 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

(六) 蒋不会对敌举行反攻，他的主意仍是保存实力。但日本向蒋进攻的可能甚大，蒋亦不得被迫应战，实力仍不能保存。

(七) 目前国共是僵局，但时间不会久，敌大举进攻之日，即僵

[1] 蒋，指蒋介石。

[2] 某君，指崔可夫（1900—1982），当时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兼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总顾问。

局变化之时（但如敌不进攻则僵局会继续）。

（八）只有那时，蒋表示对我和缓，我才可以表示和缓，但目前非其时。目前让僵局存在正是有利，愈僵愈于我有利，愈于蒋不利。

（九）目前的僵仅政治上僵（国共关系上僵），军事上在我并不僵，因我并未去打他。

（十）如蒋再令汤集团^[1]攻淮北，是他自造僵局，将来敌军再一击，他失败更大。如蒋不再打淮北则目前就可解消他自己的军事僵局，仅剩一个政治僵局，蒋如聪明，应如此做。

（十一）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皓电、齐电、^[2]皖南事变、十七日命令、限期北移、纪律命令、华中进攻等等），我之攻势已收成效，还会有成效的。

（十二）我们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当然对党内外群众都不应如此说，仍是要求蒋承认），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

（十三）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1] 指汤恩伯任总司令的国民党军第三十一集团军。

[2] 皓电，指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1940年10月19日（皓）给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这个电报断然拒绝中国共产党提出的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11月9日（佳）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拒绝要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但表示为顾全大局，江南新四军部队可以移至长江以北。齐电，是何应钦、白崇禧12月8日（齐）对朱、彭、叶、项佳电的复电，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的部队全部撤到黄河以北。

(十四) 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

(十五) 对于国共关系，军事守势政治攻势也只会拉拢国共，不会破裂国共，对于一个强力进攻者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

(十六) 用蒋介石的手破了一条缺口的国共关系，只有用我们的手才能缝好，我们的手即政治攻势，即十二条，除此再无别的妙法。

(十七) 以上各点请向某君解释，并问他的意见如何。

(十八) 华北、华中敌我兵力及配备弄好即告。

毛泽东

寒辰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14日)

(一) 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 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2]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10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邵力子、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勱商谈对国民党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致国民参政会公函

(1941年2月15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钧鉴：

关于政府对新四军处置，我党中央曾有严重抗议，并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如下：

- (一) 制止挑衅；
- (二) 取消一月十七日命令；
- (三) 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 (四)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军长；
- (五)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 (六)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 (七)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 (八)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 (九)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 (十) 废除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 (十一)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 (十二)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请政府采纳。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特此函达，敬希鉴察。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伯渠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关于皖南事变后我军军事方针的指示^[1]

(1941年2月17日)

彭、左、刘、邓、贺、关、聂、彭，吕、程，朱瑞，陈、罗，陈、胡：

(一) 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

(二) 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

(三) 八路军尤应利用蒋差别对待政策（新四问题不牵涉八路），除中下级可以声援新四外，总部应取沉默态度（此种态度一方表示留余地，一方亦是示威），军事上则取防御姿态。

(四) 新四已无合法地位，本来可以大闹，但为不使日蒋矛盾缩小，相反使之扩大，故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

(五) 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给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颖超、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陈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的电报。

行，准备愈快愈好，以防万一，实行愈迟愈好，以便配合国际国内的最有利条件，因此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六）因此在目前只有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才是适合上述要求的。战略的军事攻势只在必要条件成熟时才是正确的。所谓必要条件，第一是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并且投降时（他不投降不会宣布全面破裂），第二是国际最有利时机的到来。只在这些条件具备时，我们才有主动权，否则我们将陷于政治上军事上的被动地位。这种主动权我们必须拿在自己的手中。

（七）请你们根据上述方针部署军事，这个方针是中央决定的。

毛 朱 王 叶

十七日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2月17日)

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迫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如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2]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电的主要内容。

[2] 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1]

(1941年2月18日)

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顿训
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
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
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刘少奇、陈毅、彭雪枫电
主要内容。

致彭德怀、罗瑞卿电^[1]

(1941年2月20日)

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的致彭德怀、罗瑞卿电的主要内容。

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询问周恩来、董必武 是否已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等问题

(1941年2月20日)

- (一) 关于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是否已经办了，如已办了，请将文件告知，以便公开发表。
- (二) 关于委任新四军七个师长的命令，收到后请在重庆散布。
- (三) 拟用剑英名义复张冲一电，是否有此必要。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1日)

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2]，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1] 这是毛泽东和任弼时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未能如期在5月1日举行。

请张冲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的意见^[1]

(1941年2月22日)

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

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2]。

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1] 1941年2月22日，毛泽东将其起草的叶剑英23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这是电报的主要内容。

[2] 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3日)

同意你的根本立场，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这个电报在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2月23日)

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2]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电的说明的主要内容。

[2] 指蒋介石1月27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的讲话。

[3] 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出版按语

(1941年2月23日)

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留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藉供党内同志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4日)

(一) 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2]，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 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 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于1941年2月13日公叛敌，新四军第一师于2月18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的一段话

(1941年2月25日)

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为《中国文艺》题名

(1941年2月25日)

中国文艺

关于蒋介石反共情况的估计 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2月26日)

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苏北方面韩德勤完了，王懋功、冷欣等决不能去，我打李长江后有发展。皖西方面，我挺进团已到桐城、潜山。大别山方面，我李先念正向鄂东发展，桂系已应付不暇。淮北方面，李仙洲亦绝不能深入。皖南方面，我正派曾希圣过江收容，再在芜湖一带创立根据地，项英一部在浙境孝丰活动。三四月间德必攻英，英必被打得七零八落，那时蒋必大慌。故国内外形势日益于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6日)

有电^[2]悉。(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2月25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1]

(1941年2月27日)

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2月28日)

(一) 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 我党派周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 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 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 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令

(1941年2月28日)

兹委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所属各师之军政负责人如下：

1. 粟裕为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
2. 张云逸为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
3. 黄克诚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
4. 彭雪枫为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
5. 李先念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
6. 谭震林为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并暂兼政治委员。
7. 张鼎丞为新四军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

(1941年2月)

不要片面讲丰衣足食。讲丰衣足食，还得讲艰苦奋斗，没有艰苦奋斗，哪有丰衣足食？丰衣足食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

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它比任何“饷”，任何援助都可靠。

为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 几位青年题词^[1]

(1941年2月)

肯学肯干，又是革命的，必定是有益的，必定是有前途的。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于1941年春节为前来拜年的王仲方等几位青年所写的题词。

肯死下流社会，又是革命。
命同，必定是有意义的。
定是有意义的。
毛泽东

毛泽东为王仲方等几位青年的题词。

给周恩来、董必武^[1]的信

(1941年3月1日)

周、董：

自三月一日起，请代订下列日报各一份：《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及云南各种报纸。并请即向重庆中四路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代购下列书刊：《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〇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

以上书刊请委托该所直寄。又前托购商务版《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亦请挂号邮寄。

毛泽东

三月一日

[1] 董必武（1886—1975），湖北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在重庆协助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负责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1]

(1941年3月1日)

(一) 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 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 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 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电的主要内容。

关于坚决不出席参政会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2日)

(一) 三月一日指示谅已送达。

(二) 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问题，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

(三) 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1. 皖南事变他错了，通国皆知，我以不出席表示抗议，我并未错；2. 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3. 如他因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通过拥护政府十七日命令，发布讨伐令，逮捕我代表等），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4. 国际形势已到与彼不利之时（英德大战与英日冲突）；5. 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

(四) 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五) 目前政治斗争空前尖锐，许多小党派已经转到蒋介石方面，在参政会内可能造成不利于我之空气，但这是一时的，过一会即将起变化，故小党派的话不可听信，他们的话是使我们上当的。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4日)

(一) (略)

(二) 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

(三) 蒋演词强调日本南进对中国的严重性，大概中英要订作战协定了，国民党牵入英国圈子后，投降越困难，剿共也越困难，故对我有利。

(四) 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只待欧战大打，国民党气焰就会降低。

(五) 宜川增兵尚无所闻，但有可能的。华中则绝无办法，九十二军侯、马两师占涡阳、蒙城后，敌隔河炮轰，侯、马又走，我彭部三四四旅仍在涡河、新黄河间，请告刘兄。

致彭德怀、左权等电^[1]

(1941年3月4日)

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电的主要内容。

致廖承志电^[1]

(1941年3月4日)

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1] 这是毛泽东致廖承志并告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5日)

—

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

[1] 本篇一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讲话的一部分。

二

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 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理由

(1941年3月8日)

国民参政会秘书处转全体参政员先生公鉴：

鱼电诵悉，诸先生关怀团结，感佩同深。四年以来，中共同人为维护民族抗战与国内团结，心力交瘁，早为国人所公认；中共参政员，对于历次参政会，无一次不出席，亦为诸先生所共见。惟独本次参政会，则有碍难出席者在。盖中共参政员，为政府所聘请，而最近政府对于中共，则几视同仇敌，于其所领导之军队则歼灭之，于其党员则捕杀之，于其报纸则扣禁之，尤以皖南事变及一·一七命令，实为抗战以来之巨变，其对国内团结，实有创巨痛深之影响。一·一七命令之后，敌伪抚掌，国人愤激，友邦惊疑，莫不谓国共破裂之将至。中共中央睹此危局，自不能不采取适当步骤，以挽危局，以保团结，乃向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迁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新四军被称为叛军矣，八路军被称为匪军矣，共产党被称为奸党矣，而延、渝道上打倒共产党，抗日与剿匪并重，剿匪不是内战等等惊心动魄之口号，被正式之官府与正规之军队大书于墙壁矣。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耿耿此心，曾有删电致参政会秘书处，略述梗概，当蒙洞察。嗣后

参政员同人中颇多从中奔走以图转圜者，泽东等感此拳拳之意，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同时，即以此意通知参政会秘书处，亦未蒙政府置答。泽东等所提善后办法与临时办法诸条件，乃向聘请泽东等为参政员之政府当局提出请求解决，以为泽东等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之标准，政府固有予以解决与否之自由，泽东等亦有出席与否之自由。泽东等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如能在此次会期内由于诸先生之努力促成，与政府诸公之当机立断，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义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泽东等接受政府之聘请，为团结，为抗战也。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碍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泽东等目前所处环境与诸先生不能尽同者，其故即在此。谨布区区，尚希谅解。

中国共产党参政员

毛泽东 陈绍禹 秦邦宪 林祖涵

吴玉章 董必武 邓颖超

齐

抗议美国大理院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

(1941年3月10日)

致白劳德：

美国大理院之决定，显示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对国内之残暴。我们与美国与世界的无产阶级及进步人士抗议这个对美国人民的阶级判决，我们确信共产党与美国人民将团结在“释放白劳德”的口号的周围，为和平与民主而斗争。在我们为抗战胜利、团结、进步的斗争中，我们将加强我们与美国共产党与人民的战斗团结。

毛泽东

致福斯特贺电^[1]

(1941年3月10日)

致福斯特：

值你六十寿辰向你致贺。你对美国共产党及劳工运动的领导使美国无产阶级成为强大的革命力量。当战争与华尔街的反动计划残暴的破坏着和平的生活，并猛烈地打击着美国人民的公民利益时，工人阶级与所有进步人士将更加团结在你所领导的美国共产党的周围，进行着为和平与民主的胜利斗争。

毛泽东

[1] 这是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六十寿辰的贺电。

关于目前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 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3月12日)

(一) 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的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

(二) 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续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

(三) 六日蒋演说,似有去年四月程潜在西安报纸上发表谈话宣布我十大罪状相似的用意,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参政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

(四) 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日报》及路上少捉人)。

(五) 对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拟不作防御式的答辩,置之不理,而利用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由中央去一电,重申双十二条的必要,给他正面一攻,你以为如何。

(六) 小党派中国社党与青年党已暂时变成蒋介石工具，但真正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开明绅士的黄炎培、张表方等派依然是中间派。

(七) 胡宗南对关中进攻已停止，我反扩大了一个区的地盘，边区四周已平静，皖东桂军被日寇打得七零八落，李先念在鄂东有发展，莫树杰之八十四军忙于应付。陈大庆在鄂中，李仙洲在淮北，亦无能为力，各方面有皆顿之势，再过两个月欧战大打，南洋紧急，蒋介石似非对我妥协一下不可。这个大流氓，实际是欺软怕硬的。

关于时局问题的讲话^[1]

(1941年3月12日)

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时局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对重庆参政会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1]

(1941年3月12日)

各根据地对于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通知的主要内容。

给司徒美堂等的信^[1]

(1941年3月14日)

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先生、阮本万先生、部长吕超然三先生勋鉴并转全美洲侨胞公鉴：

奉读一月八日来电，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中国今日决不能同时进行既对外又对内之两个战争，必须完全取消国民党当局的反共计划，并驱逐亲日派，团结全力，以与日寇相搏斗，抗战始有胜利可期。乃自蒋介石下令消灭皖南新四军及于一月十七日发表宣布新四军叛变，取消该军番号，及将该军军长叶挺交付法庭审判之反革命命令以后，国共合作，已遇严重之危机。国民党中央亲日派与反共派之横行，已直接给予全民抗战以极大之损害。当此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时，亲日派分子如不被驱逐，反共派分子如不放弃其两个战争的计划，一党专政如不取消，民主政治如不实行，三民主义如不兑现，总理遗嘱如不服从，中华民族之前途，必被葬送于此辈之手。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惟对于亲日派及反共派危害抗战之滔天罪行，不得不谋所以制裁之道，业向政府当局提出时局善后办法及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尚祈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以期迅速见之实行，

[1] 这是毛泽东给美国纽约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人的信。

团结幸甚，抗战幸甚。

毛泽东

寒

同意由周恩来处写文章 回答蒋介石六号讲演

(1941年3月15日)

恩来：

(一) 同意你的意见。由你处写一回答六号演讲的东西，中央对八中全会不再发表文件。

(二) 延安《新中华报》已有一篇社论泛评参政会及当局反动政策，未提蒋演说。

(三) 你处发表文件，似亦以泛论为宜（如申明十二条的必要性等），不提蒋演说，不作防御式的答辩。

毛泽东
三月十五日

复周恩来电^[1]

(1941年3月15日)

删未电^[2]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复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2] 周恩来3月15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他14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关于国际关系与国共关系的估计 给周恩来的通报

(1941年3月17日)

(一) 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

(二) 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

(三) 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则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四) (略)。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1]

(1941年3月18日)

(一) 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2],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处于世界两大帝国主义集团进行着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的前夜,依然和日寇对立着的中国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不能不对目前紧张的国共关系,谋取暂时的和轻微的缓和。同时,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中央和地方之间,CC系和政学系之间,CC系和复兴系之间,顽固派和中间派之间,皆有矛盾,CC系内部和复兴系内部又各有矛盾),国内的情况(广大人民反对国民党的专横,同情共产党)和我党的政策(继续抗议运动),均不容许国民党在国共间继续过去五个月那样的紧张关系。故目前谋取暂时的轻微的缓和是蒋介石所需要的。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 1941年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发表反共演说,大弹“政令”“军令”必须“统一”的滥调,声称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容许存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必须依照他的“命令与计划,集中于指定区域”,等等。同日,在国民党反动派操纵之下的国民参政会通过了一个决议,为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行辩护,对共产党参政员因抗议皖南事变拒不出席参政一事,大肆攻击。

(二) 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这种情况迫使蒋介石重新考虑他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现在强调国防，宣传党派观念已陈旧，乃是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表面上表示并不偏于一个阶级一个党，以便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如果只是形式上的欺骗而无政策上的改变，他的这一企图必然徒劳无功。

(三) 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1]，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在国共间各项主要争点未得合理解决之前，我们对国民党内亲日派反共

[1] 第一个“十二条”，即本卷《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的《谈话》部分中提出的十二条，在1941年2月15日又用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名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第二个“十二条”，是1941年3月2日，作为共产党的部分参政员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临时办法。内容如下：“一、立即停止全国向共产党的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的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的命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的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的抗日民主政权；七、华中、华北及西北的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中共领导的军队，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应共辖六个军；九、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的家属；十、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兵员，发还所有枪支；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个党派派遣代表一人，以国民党的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

派所造成的皖南事变和各种政治的军事的压迫，仍应继续严正的抗议运动，扩大第一个十二条的宣传，不要松懈。

（四）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国民党对淮北、皖东、鄂中的进攻还会继续，我军必须坚决地将它打退。各根据地必须坚决地执行中央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指示^[1]，加强党内的策略教育，纠正过左思想，以便长期地不动摇地坚持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1] 参见《论政策》。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19日)

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2]，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讲话的一部分。

[2] 中共中央3月26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在停刊期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

(1941年3月19日)

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电的主要内容。20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关于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 不加入党派委员会问题致周恩来电

(1941年3月21日)

(一) 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

(二) 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3月26日)

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增强党性问题讲话的一部分。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1941年3月、4月)

序

(1941年3月17日)

现在党的农村政策，不是十年内战时期那样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全党应该执行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1]，应该执行即将到来的七次大会的指示。所以印这个材料，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1] 1940年7月7日的中央指示，是指当时所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940年12月25日的中央指示。

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是开调查会。东张西望，道听途说，决然得不到什么完全的知识。我用开调查会的方法得来的材料，湖南的几个，井冈山的几个，都失掉了。这里印的，主要的是一个《兴国调查》，一个《长冈乡调查》和一个《才溪乡调查》。开调查会，是最简直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到会的人，应是真正有经验的中级和下级的干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县调查和井冈山两县调查，找的是各县中级负责干部；寻乌调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级干部，一部分下级干部，一个穷秀才，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知县衙门管钱粮的已经失了业的小官吏。他们都给了我很多闻所未闻的知识。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国监狱全部腐败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县作调查时该县的一个小狱吏。兴国调查和长冈、才溪两乡调查，找的是乡级工作同志和普通农民。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开调查会每次人不必多，三五个七八个人即够。必须给予时间，必须有调查纲目，还必须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人展开讨论。因此，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我再度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

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的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我们党吃所谓“钦差大臣”的亏，是不可胜数的。而这种“钦差大臣”则是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当然又是他的话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1]除了盲目的、无前途的、无远见的实际家，是不能叫做“狭隘经验论”的。

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1] 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理论》。新的译文是：“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9~200页）



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农村调查》(部分版本)。

跋

(1941年4月19日)

十年内战时期的经验，是现在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但这是指的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线这一方面。党的策略路线，在现在和过去是有原则区别的。在过去，是反对地主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在现在，

是联合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就是在十年内战的后期，对于向我们举行武装进攻的反动的政府和政党，和对于在我们政权管辖下一切带资本主义性的社会阶层，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反动的政府和政党中各个不同的派别间，也没有采取不同的政策，这些也都是不正确的。那时，对于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一切社会成分，执行了所谓“一切斗争”的政策，这个政策无疑是错误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对于十年内战前期和中期^[1]所采取的、也分配给地主一份和农民同样的土地、使他们从事耕种、以免流离失所或上山为匪破坏社会秩序，这样的正确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错误的。现在，党的政策必须与此不同，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劳动政策方面，是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碍资本主义经济正当发展的两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又规定农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两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权利方面，

[1] 这里所说的十年内战前期，是指1927年年底至1928年年底的时期，亦即人们通常所称的井冈山时期；中期是指1929年年初至1931年秋的时期，即自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立至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的时期。上文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1931年年底至1934年年底的时期，即自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结束后至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期。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1931年至1934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使党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有和工人农民一样的人身权利、政治权利和财产权利，但又防止他们可能的反革命行动的两重性的政策。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在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分，还不是国营的，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施行，无疑地是错误的。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我们必须明确地分清这种界限。中国共产党是在复杂的环境中工作，每个党员，特别是干部，必须锻炼自己成为懂得马克思主义策略的战士，片面地简单地看问题，是无法使革命胜利的。



1941年3月，毛泽东将他1927年至1934年期间所撰写的一部分农村调查材料编辑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出版，并写了序言和跋。图为延安出版的最早版本的《农村调查》。

给周恩来、董必武的信

(1941年3月)

周、董：

请嘱人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即由邮挂号寄来，如能运来更好。至于普通小册子及延安出版之书可勿寄来。

毛^[1]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给董必武的信

(1941年3月)

董老：

所购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书籍，请办交涉是否可先运来，左翼书可暂不运，以免被阻。再者请托人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可先付五百元订一年。通讯处：肤施新市场中山商店图书部。

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报纸、杂志，亦望即代订，时间至少一年。

毛^[1]

[1] 原抄件未署时间。

读西洛克夫、爱森堡等著李达、 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中译本第四版)一书的批注

(1941年3月至9月)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第一章 唯物论与观念论

一 唯物论及观念论的本质及根源

……

中国主观
主义

……对于社会现象的同样的观念论的立场，在托罗斯基方面，无论在朴列斯特议和条约缔结时，或在关于劳动组合^[1]的讨论时，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时候，他同样的不从客观的现实的的分析出发，而是从预先准备的公式，从操切从事的意志出发。……同样的事情，对于托罗斯基反对派也可以说；他们在一九二三年，提出了牺牲农

[1] 劳动组合，这里指工会。

民，即不但牺牲豪农并且牺牲中农，而立刻把国内工业化的普罗列达里亚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托罗斯基也不考虑客观的条件，而跳过革命的阶段，用观念论者的头脑去思考，并不想到产业复兴的前提是否存在与大众的有无准备等等，而只是受自己意志与希望所支配。[第74页]

二 机械唯物论

.....

注意

.....他们不理解，所谓物质界反映于意识的事实，并不是自然而然的被给与于人类的；而是在斗争之中，在人类的实践中，在社会对于自然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在阶级斗争中，被人类获得的东西。人类的能动性，在社会的实践之历史过程上，使其意识发展，这种思想，是法国唯物论者所不了解的。[第86页]

注意

.....法国唯物论者们，因其哲学之形而上学的性质，在社会观上，终于变成了他们自身所抗战的的观念论的俘虏。因为所谓统治者的意识能够变更社会制度的“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是观念论的。机械唯物论之不彻底的事实，以及说明社会过程时不可避免的陷入于观念论的事实，已被法国唯物论者们本身的经验所证明了。[第88页]

三 现代机械唯物论

……

未可同日而
语(比较)

……机械唯物论把俄国革命的现实一切现象,终止于与布尔乔亚革命已经历过的阶段相提并论(比较)。在布尔乔亚革命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到了某一定的瞬间,已在封建制度的胎内成长;所以就布尔乔亚说,获得政权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革命完成了的瞬间。但在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一方面、社会主义关系存在权力获得之后才开始生长,所以权力的获得是转换期的开始,社会主义通过这种转换期,在与其他社会经济形式相斗争之中,变成坚固。[第89~90页]

所谓特点

……依辩证唯物论的见地去说明某种现象,不是把那个现象還元于力学的运动,而是要暴露那个现象中特殊的规律性,即把具体现象中所固有的并制约其发展的内部矛盾,明现出来。不论物理现象,化学现象,社会现象,及其他任何现象,都具有其自身的规律性,都具有特殊的运动形态。……在一定现象中规定其运动的规律性的,不是力学的运动形态,乃是这一定现象中所特有的运动形态。机械论者所以想把一切都還元于力学,是因为他们把力学看做辩证法。[第91~92页]

即特有的
矛盾

新属性

……意识是在物质的某个发展阶段上,在一

定条件下发生的物质的新属性；而在此以前，意识是不存在。……[第97页]

盲目科学

然而，没有哲学的自然科学是盲目的，自然科学如果没有哲学就不能前进，这一层，恩格斯早已指摘出来了。[第98页]

四 主观的观念论

……

反映论

……如果说客观的实在没有被给与着，你与马赫就不可避免的陷入主观论及不可知论，如果说客观的实在是被给与着，那末，为这个客观的实在的哲学概念就有必要，而且这个概念在古昔就已作成了。这个概念，就是物质，物质是表示在感觉上被给与于人类的，离我们感觉独立存在而又为我们感觉所复写所摄影所映像的那个客观的实在之哲学的范畴。……[第109页]

左派

……波格达诺夫之反动的观念论哲学，使得他在理解阶级斗争的战术时，犯了许多错误；那些错误终于使得他被排除于党外了。他在反动时代曾经与别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组织一个团体，那个团体为了要求撤回第三次国会^[1]的议员，被称

[1] 第三次国会，指沙皇政府在1907年11月召开的第三次国家杜马（杜马即议会、国会，俄文的音译）。

注意

为“撤回派”^[1]；又因为他们所发行的论文集的书名，得到了“前进派”^[2]的名称。他们在政治上，要求把与革命时代相同的战术，应用于反动时代，以为在合法的劳动团体中活动，就是背叛革命。……诚然，客观的条件变了，革命失败了，党被破坏了；至于客观的现实，波格达诺夫却以为只是“组织的经验”。“左翼的”言辞、机械的思维，观念论——这是撤回派战术基础的原理。[第118页]

五 康德及马克思主义之新康德主义的修正

……

二元论

……我们的认识形式，在经验以前存在，或如康德所说，它是先验的；我们的知识就依存于它的活动，它的动作。照这样，我们的知识可以说是感觉与构成感觉的认识形式的结合。……
[第122~123页]

[1] “撤回派”亦称“召回派”，1908年在俄国工人运动中以“左”的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召回派要求从国家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拒绝在工会及其他劳动者的合法团体中进行工作。1909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把召回派清除出党。

[2] “前进派”，亦称“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从布尔什维克分裂出去的一个机会主义集团。它是在波格丹诺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于1909年在国外成立的，因曾出版《前进》文集而得名。它实行的政策倾向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实际上是以“左”的面目出现的取消派。

.....

不是将二者
联结，而是并非
二个东西，只是
一个东西。

他们不把认识论和辩证法相联结，而独立的去研究，因此，他们把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之关系如何的问题，在形而上学的精神上解决了。对于这个问题，他们中有些人落入于照应论，有些人甚至于到达了含有不可知论的要素的结论。[第128页]

第四章 本质与现象，形式与内容

一 本质与现象

.....

注意

这些理论的缺点，就在于从社会诸关系的其余的体系，尤其是从经济诸关系的体系，分离出政治的上部构造。然而还不止此。这些理论的又一缺点，就是把全体社会中的仅仅一方面之政治的及法律的诸关系，拿来与社会诸关系的全体系统一看待，与社会的自身同一看待。社会与国家的混同，在长期间内，障碍了社会科学的发展。社会科学，因为把这两者同一看待的结果，在长久的期间内，不能发见两者的矛盾。[第352页]

注意

照上述那样，科学的认识，在其发展上，从外的关联推进到内的关联。它不断的越发突入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之深处，并在其中取出本质的诸

矛盾、本质的诸关系。本质的诸关系的这种分离、其内的诸关系的这种分析，同时决定了具体过程的自己运动的源泉，发现了这过程的规律性。

科学的认识，正确来说，其起点是在于从诸现象的无数相互作用中，探求出我们所称为本质、本质的矛盾之相对安定的基础。

注意：本质
与现象的矛盾

但是，我们的认识，如以在外的诸关系中发现其内的根据为自己的任务时，就遇着若干的矛盾。我们在认识现实的过程中，本质在其直接的形态上，并不出现于现象的表面。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价值，在使用价值中，显现为交换关系；商品生产者的生产诸关系，显现于商品的诸关系之中。工钱，在现象的表面上，不显现为劳动力的价格，而显现为劳动的价格；阶级，不显现为生产手段的所有者，而显现为收益源泉的占有者。所以单只认识在孤立状态中被观察了的个个事实的那种现象，还不能在存在的转变之流的背后，去发现自然及社会的发展之推进的发条。在另一方面，想要发现根据时，如果轻视现象，本质就转化为不能反映客观现实的诸法则之运动的单纯抽象。

主观唯心论
的经验论

……经验论把现实的一切归结于现象，把认识过程归结于现象的知觉。因此，休谟与巴克列，从现象与本质的关联分离出现象而加以观

察，把现象只归着于现实的假象。他们把现实与主观知觉的总体，同一看待，因此从假象本身夺去了客观的实存性。……

机械唯物论
的唯理论

唯理论，由于从现象分离^[1]本质，把本质转化为不变的、不动的东西。本质被解释为最单纯的关系，为最单纯的不变的根据。所以全部物理的世界，没有发生，也没有消灭，它被还原为只变化位置的、无色、无特性的分子之世界。在法律学方面，科学从唯理论的原理出发，在不变的现实的法之后，去探求人类本性中所固有的所谓“不变的自然法”。在经济学方面，亚丹斯密探求了适用于一切买卖场合的不变的价值尺度；李嘉图探求了资本主义之不变的法则。在一切科学上，唯理论从现象分离本质，把本质转化为不变的根据，其结果，不能发现其研究对象的具体过程之矛盾。法、国家、宗教及资本主义等的永久性，也和原子的永久性同样，都是从抽象的不变的本质引出来的。[第354~356页]

形而上学者，分离本质与现象，使两者互相对立，其结果必然是只能认识现实的一方面。形而上学者，或者无视现实的多样性，提供着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国民的的无内容的法则；要不然，便是拘泥于现象，不暴露它的本质，而崇奉

[1] 毛泽东在“分离”二字后补加一个“出”字。

本质变化其
形态

这些现象为过程全体的发展法则。这两种倾向,在分析近代资本主义时,都表露了自己的错误,即不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的变形,不理解资本主义向着次一阶段的推移,无视资本主义的旧阶段与新阶段的关联,离开与全过程的推进的根据的关联,一面的强调新的现象。……[第 357~358 页]

苏联仍有主
要危险

……随着推进到改造期,机会主义最危险的形态,是否定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可能性的左翼偏向。党只有打破这种偏向,才能够保证苏联的成功的社会主义建设。反之,在改造期本身与进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即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设的完成期,机会主义最危险的现象形态,是否定党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转化于现实的手段及方法的右翼偏向。左翼偏向,在这个时代,已不是主要的危险。因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设正在完成的时机,那种怀疑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的议论,完全是笑话。……[第 361 页]

注意

“本质现象出来,现象是本质的”。——伊里奇在注释黑格尔的质论时这样写着。在一切现象中,没有同一的抽象的本质。本质随其现象形态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因而现象本来是靠自己表现本质的。本质在单独的现象中,并不完全的表现出来。因而现象比较它当中所表现的本质,更为丰富而完全。[第 362 页]

……在现象分析上暴露本质,暴露过程之

注意

推进的根据，即本质的矛盾，不单要在现象中指示这本质的表现，并且要在假象中指示它。
[第364页]

二 本质的发展，经验论及图式主义之批判

……

……他说：“……机会主义的要点，是阶级妥协的思想。战争把这种思想推进到极处。不单如此，并且把许多异常的要素与动因，结合于通常的要素与动因，使得因特殊的威胁与强制而分裂了庸俗的大众，至于与布尔乔亚相合作”^[1]。照这样，新的倾向，在其根底上，具有机会主义，它只是机会主义的单纯的一个变种，伊里奇在许多现象中，对我们指示了本质的发展，这^[2]种形而上学者所说的抽象的本质，是相反对的。……[第366页]

三月参政
会^[1]

如果把个个的现象，提高为一般的发展法

[1] 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8~649页）

[2] 毛泽东将“这”改为“与那”。

[3] 三月参政会，指1941年3月1日至10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这年1月初，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受到国内进步舆论的谴责。为摆脱政治孤立的局面，国民党召开了这次会议。会前，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由于国民党拒绝接受，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张国焘

则,客观的现实就被曲解。把自然发生的经济的罢工,提高为阶级斗争的一般发展法则的经济主义者,不曾理解阶级斗争的本质。……[第372页]

注意

公式主义

……普列哈诺夫,并不曾研究自己的所列举的新事实的根底中究竟横有什么本质的矛盾,他把这个正确的命题变为诡辩的工具了。这样,普列哈诺夫,在一定的事情之下,并没有把可以拥护祖国那件事,联系于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与革命的过程。一方面当作图式主义者行动了的普列哈诺夫,同时又暴露了他自己是狭隘的经验论者。他离开帝国主义时代全体的本质矛盾的分析,去观察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各种事实。

实际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摘了那种从布尔乔亚企业家的狭隘的实际主义发生出来的经验的思惟方法。……实际主义,对于布尔乔亚科学的各种根本倾向,也变成了特征的东西。否定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过程的本质,逃避到狭隘的经验的世界的所谓俗流的经验论,具有过阶级的意义,在现在也是有的。……[第375~376页]

注意

……布尔乔亚科学中的法则,表现为不变的本质;科学那东西,转化为过程之抽象的图式的描写。超越时间空间而都妥适的那种超历史的法则,曾被马克思讥评过,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伊里奇在其革命活动的第一期,就已经嘲笑了人民

主义^[1]的社会学的无用和无生命。伊里奇反对波格达诺夫和马赫主义者，攻击他们的图式主义，攻击他们的错乱的设立法则，指摘了他们很容易的造作那种失掉一切具体内容的“普遍法则”。

[第377页]

注意

在另一方面，伊里奇怎样批判了布哈林的许多理论的著作，这是我们很知道的事情。他对于布哈林的过渡期经济学，指摘了布哈林在其著作中提起了把狭隘的经验论（不必要的细目之搜集）与图式主义（在各个现象上贴上纸条）并列的布尔乔亚社会学者斯宾塞式的社会学“一般”。布哈林混同了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

注意

党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势之下，以克服困难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在新的事实之前，并不茫然自失。党发现这些困难与各种事实总体的关联，藉以发现它的发展倾向，把其他的发展倾向与它对置。简单的说，党能够发现现象的法则，因而又探出本质的发展中的新动因，指示经过矛盾的阶段的本质的发展。伊里奇能够用他固有的天才在那个“无廉耻”的布列斯特媾和的背后，追踪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发展倾向，它的必然的胜利；在对中农让步的背后，追踪其共同化——农

[1] 人民主义，旧的译法。现译民粹主义。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体系。

抗战初期

业的集体化——；在俄国的贫困与技术的落后性的背后，追踪苏联转化为先进国的现实的可能性。……党裁判了他们的错误是：对于没有看见过的新事实的出现，张皇失措，不能发现这些现象的根据，本质、及其发展法则；无原则的拘泥于任意的现象；对于阶级的敌人让步，甚至不惜弄坏其他更重要的阶级斗争战线上的立场，急于尽可能的早早脱出穷境。

主观主义者
经验主义者注意

中国主观主义者与张国焘主义者的方法论都是机械论。

上面所说的两个偏向，都暴露了对于本质与现象的辩证法没有理解。他们不能在现象之中看出本质的发展，所以转到了本体之抽象的同一性或现象之抽象的区别的立场。规律性之形而上学的理解的这两个变种的根底中，横亘着同一的机械论的方法论。布哈林与这种场合中的托罗斯基都包括在内的机械论者们，不能理解苏联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诸过程的特殊性。诸过程的本质，在他们看来，常常表现为不变的东西。[第378~381页]

注意

……某种过程之本质的矛盾之发展。同时使科学的认识能够发现许多矛盾的现象中的这过程的运动，从比较不深刻的本质透入于更深刻的本质，“譬如说，从第一次的本质到第二次的本质那种无限的”^[1]（伊里奇）推移。[第384页]

[1] 参见列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8页）

三 形式与内容

分类要依客
观存在的固有
顺序。

注意

△

……

恩格斯说到科学分类的原则，力说着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中形式的妥当性。“科学的分类，就是说各种科学分析各个的运动形式或互相关联互相推移的一列的运动形式，它把这些运动形式，依照其固有的顺序，加以分类，加以配列。在这里，就存有分类的意义”^[1]。（自然辩证法）。……社会的运动，在种种形态上显现出来，——在生产过程上，在分配、交换、资本的运动、社会的阶级的运动、诸政党的运动、科学的运动、文学运动、宗教运动上，显现出来。这一切，是当作全体看的社会之具体的运动形态。各种运动形态，各有其内容的连结的特殊类型，即各有其特殊的形式，这是当然的。……[第390~391页]

四 过程的形式与内容之发展

……

……伊里奇说：“右翼空论主义，其立脚点只承认旧形式，并不注意于新内容，所以它完全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93页）

破产了”。我们把这一点应用于俄国的右翼，就可以说：他们不注意于新经济政策的改造期的新内容之成长，即不注意于保证社会主义要素对于资本主义要素的胜利、并引起了自己的新发展形式的新内容之成长。……总之，他们忽视了新经济政策是保证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胜利的形式。

三三制^[1]

新土地政策

伊里奇又说：“左翼空论主义，其立足点是无条件的否认一定的旧形式，不理解新内容通过一切形式而实现自己。他们不知道学习共产主义者的我们的任务要支配一切的形式；不知道学习很迅速的用别种形式补足这种形式，用别种形式代替这种形式，使我们的战术适合于一切的转变——由我们的阶级及我们的努力的以外的东西唤起的转变”^[2]。……他们在新经济政策中，只看到那资本主义的形式。但是他们不理解新内容是怎样通过这些形式而发展的，不能够利用旧形式去发展新内容，跳过了旧形式所能被利用的许多发展阶段。[第412~413页]

[1]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于1940年开始实行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故谓三三制。

[2]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7页)

第五章 可能性及现实性、 偶然性及必然性

一 诸现象的相互作用，原因和结果

从联系入手

前线和后
方，上级和
下级。

我们在实践的活动中，认识环绕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认识包含着一般互相联结的诸要素。我们的认识，首先是抓住诸现象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恩格斯说：“相互作用——这是我们所观察的初的东西”^[1]。例如，我们在某种企业之中，发见其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在技术的装置和劳动组织之间，在劳动大众和技术职员之间，在职业组织和管理部之间，在管理部和党委员会之间，发现其相互作用。我们又承认企业及其外围之间的相互作用。企业的生活依存于资金的准备、原料的供给等等；企业本身又供给生产物于一般人。在我们所住居的都市中，可以看见种种社会团体、种种职业之间的种种相互作用。又，我们在都市和其周围农村之间，看见相互作用。总之，在我们所接触的范围内的现象之间，我们承认其相互作用。[第424页]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74页）

不能胡乱定
目的

科学反对所谓合目的性的见地，对自然及社会的一切过程，都由因果性的原则去说明。达尔文说明了，动植物的构造单只看起来像是合目的的，他指示了现在存在的动植物的种类，乃是不适于生存的亘几万年淘汰下来的结果。科学并且阐明了：人类行为之合目的性也可由因果性去说明。即，人类的目的，是作为其社会的活动之结果而生起的。例如，普罗列达里亚所树立推翻阶级社会的目的，是被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榨取——的解决之必然性所唤起的。[第429~430页]

二 根据和条件

.....

本质的矛盾，或基本矛盾，才是根据。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伊里奇，和黑格尔不同，他们不是在“概念”之中，而在对象之本质的矛盾之中，发见了根据。例如，依马克思看来，在阶级斗争之中出现的、生产诸力和生产诸关系的矛盾，表现为当作全体的运动之社会的一切形态的发展的根据。这个根据、基础的运动，决定道德、法律、科学、艺术及其他的上层建筑。……[第434~435页]

发展的源泉是根据。可是，根据在辩证法上，和条件结合着。所以当观察发展之时，不能

国共、地
理、资源、外
助。

克服

蔑视条件，特别是不能蔑视本质的条件之意义。然而，人们往往把它忘却了。例如，在一九〇五年揭出“沙皇废止，建立劳动政府”口号的托罗斯基，就蔑视了俄国劳动运动在其中发展着的本质条件。托罗斯基蔑视了几千万俄国农民的作用及意义。同样，在一九二六年，托罗斯基和季诺维夫^[1]相提携，提倡过度工业化理论——这种理论的目标，在于依着增大农民的课税，使工业发达并提高输出工业品的价格——，这时，他仍然蔑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农民之作用及意义。对于本质的条件之蔑视，也是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之特征。德波林及其他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只说及发展之内的根据；但是他们和托罗斯基完全一样，非常错误地理解了根据、即本质的矛盾。这种情形，我们在检讨对立之统一的法则时，已经看出了。……[第437~438页]

……我们知道根据在现实中造出新条件。但是，根据不单是造出新条件，而且克服旧条件。俄国的农民不是俄国的社会变革之本质的条件。但是，资本主义诸关系的发达，最初促成了普罗列达里亚在俄国劳动运动中的领导；其后，促成了立脚于劳动者及农民的同盟之上的普罗列达里

[1] 原文为“季维诺夫”，毛泽东将其改为“季诺维夫”。

亚革命之实现。苏联中的农民，曾经是决定社会主义的直接转变之不可能性的本质的条件。但是，通过“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引入社会主义的建设；于是在一九三〇年，苏联就进入社会主义时代了。[第 439~440 页]

三 可能性和现实性

……

注意

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德国，布尔乔亚革命向着普罗列达里亚革命之连续的转化，没有实现。可是，马克思的分析，在历史上，演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伊里奇体会了这种分析，完成了布尔乔亚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伟大的理论。……[第 447~448 页]

注意

……斯丹林说：“俄国呈现着矛盾的两个集团。矛盾之一个集团，是存在于普罗列达里亚及农民之间的内地矛盾。矛盾之另一个集团，是存在于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及当作资本主义国家的其余一切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一个集团的矛盾能够由一国的诸条件所完全克服，第二个集团的矛盾在矛盾在其解决上却有赖于二三其他国家的，普罗列达里亚的努力之必要——把这两个集体的矛盾混同起来的人，是对于伊里奇主义冒犯了最大错误的人。这样的人是昏乱者，否则是

不可测的机会主义者”^[1]。[第451~452页]

不单只社会主义，任何历史的现象，都是当作人类之积极活动的结果而到来的。马克思说：人类自己制造其历史^[2]。可能性之通过活动而转化为现实性。不单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由于矛盾，即自然的发展也是如此。物质具有积极性与自己具有积极性。这自己运动，规定物质所具的可能性向现实性的一切转化。物质，依着积极性，在一定的条件之下，使其可能转化为现实性。[第455页]

……恩格斯说：“在物质的本性之中，包含着物质发达而成为思维的存在物之事情。所以，在适当的条件存在时，这种发达常是必然的进行”^[3]。这是对于意识发生的问题之唯一正确的答复。自然，这种回答，单只是最初的方法论的没有具体解决。具体的解决这个问题，是特殊科学。但是，特殊科学，只有从正确的方法论的规定，即从唯物辩证法所给与的规定出发的场合中，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参见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总结》第四部分《关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6~343页）

[2] 参见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50~551页）

卵巢、卵子、胚胎，是否可能性？

注意

书斋中不能发展理论

以上，我们阐明了实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问题。可是，在现实上，还有新的实在的可能性发生的事实。这些新的、实在的可能性，不是如机械论者所主张的那样，以为从最初起就在物质之中被包含着。新的可能性，乃是在一定的阶段中之一定的条件下，由于物质之具体的发展被造出的。例如，无机物，只有在其发展之一定的阶段上，并且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之下，才作出生命之实在的可能性。进到社会主义时代这件事，造出许多新的实在的可能性，即工业发展之新的未曾有的速度，大众文化发展之新的未曾有的展开，科学及技术发达之新的可能性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关于可能性及现实性的问题之深刻的贵重的思想，被德波林学派所蔑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及伊里奇的这些思想，在党大会的决议及斯氏的著作之中，被发展了，被具体化了。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范畴之历史的展开，精当的指示出：在我们哲学发展之过去的阶段上，把唯物辩证法发展了的是谁呢？破产了的哲学的指导呢？抑是党的指导呢？这个历史又指示出：唯物辩证法怎样的发展了呢？并且怎样才能发展呢？在那从生活割离了的静悄悄的哲学研究的书斋中发展的呢？抑在革命的斗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之中发展的呢？[第 456 ~ 458 页]

四 偶然性与必然性

……

注意

……伊里奇说：“要真实的知道对象，就必须把捉并研究其一切方面、一切的观念与‘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做到这一层的罢，但全面的要求警戒我们避免错误与硬化”^[1]。[第470页]

第六章 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二 形式论理学之根本法则

……

……伊里奇批判那些固执同一见解的俄国马赫主义者时，美满的说明了：在概念论的物理学及形而上学者认定物质消灭的处所，实际上存有辩证唯物论之辉煌的确证；原子对于各个化学元素，当作特殊的实在的固定的构造物存在着，一方面
同时是“可以分割”，在其内的电气的构造上是复
又一方面
杂的东西。[第490~491页]

[1] 参见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3页）

此节好

三 普列哈诺夫的形式 论理学之批判

与中国的
主观主义者及机
械论者一模
一样

矛盾是运动
的性质

辩证唯物论的反对论者，在对抗当作存在与思维的根本法则看的对立物之统一的法则时，所常常提出来的东西，就是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国际修正主义者创始人伯伦斯泰因，和前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反动的人民派领袖之一密海洛夫斯基，把辩证法，尤其是把对立物统一的法则，当作死板的非科学的“黑格尔主义”看待，使得他们的全部批判，都站在形式论理学的矛盾律的立场。[第494页]

“物质的运动横亘在自然的一切现象的根底中。运动明明是矛盾着。关于运动，必须根据如伯伦斯泰因所指摘的‘是——否，否——是’的公式作辩证法的判断……但是一旦物质的一定的一时的结合当作永久运动的结果而发生，直到它当作同样永久运动的结果而消灭，关于它的存在的问题，不能不在肯定的意义上去解释……当各个对象成为问题时，在我们关于它们的判断中，不能不由思维的‘根本法则’所领导。在这个领域中，伯伦斯泰因所喜欢的‘是——是，否——否’的公式支配着”^[1]。

[1] 参见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版序言》。(《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2~83页)

……

普列哈诺夫的批判，显然是不圆满的东西。他调停形式论理学与辩证法论理学，并没有把前者“扬弃”于后者。……[第498~500页]

六 当作认识的一个动因看的抽象

……

县志、新花
样、本本
若把社会或自然的发展之低级的未发达的阶段上之本质的矛盾，移到高级的阶段，那就会只是缓和矛盾，把新东西解消于旧东西，把现在和未来解消于过去。那样的方法，只对于反动的社会阶级与社会群及其思想家，才是有效的。……
[第521页]

七 辩证法唯物论的概念论

……

甲乙丙丁子
丑寅卯
在形式论理学说来，对象是其标识的总计。这些标识对于对象是外面的东西，一个标识对别个标识对别个标识独立着。研究对象这件事，就是把对象分解为属于它的种种的标识。规定对象这件事，不外就是举出那根本的标识。……[第523页]

辩证法唯物论的论理学，对于普遍与个别的

谁是决定的东西?

在认识过程,个别决定普遍;在实践过程,普遍决定个别。

在认识过程,战术决定战略;在实践过程,战略决定战术。

优势、决战、革命危机成熟、机会主义、进攻,总崩溃、对革命的一致。

相互关系的问题,给与唯一正确的解说。概念是外界在人类思维上的直接反映的构成的形式,是它的结果,这种构成是从不断的具体的实践之下实行的实践出发,而复归于实践;所以个别的概念与一般的概念,都反映这个世界。这些概念,因为个别与普遍都实在的存在于客观世界,所以是实在的。个别与普遍、特殊与普遍,不像形式论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它们不是当作具有自己的存在的独立的对象而在外面互相对立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人类头脑中,只有在其统一上,才能存在并被反映出来。离开个别没有普遍,离开普遍没有个别。

伊里奇对于那种在观念论上从社会的死的形式的抽象、引出具体的社会诸现象的规律性的事情,曾经斗争过。他说,“社会是什么,进步是什么,从这样的问题出发,就等于从终点到始点。在你们还没有特别研究一种社会的构成,不能确立这个概念,不能研究真实的事实,不能在客观上分析任何社会诸关系的时候,你们从什么地方取出社会和进步一般的概念呢”^[1]。社会是当作一定的社会经济的构造而存在的,它不是与那种构造并立,而是在那种构造之中并且通过那种构造才存在的。在另一方面,个个社会经济构

[1]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造的发达及其相互推移的法则，是社会发展的—般法则之特殊的——就那种构造每一个说的——阶段。并且采取发展了分化了的姿态的社会规律性本身，在社会的发展最高阶段上展开出来。资本主义规律性的研究，是更深刻的理解先行的社会经济构造的一般规律性的关键，其原因就在这里。

一般之辩证法的理解，不是对象之停滞的本质，而表现其本质的推进的矛盾，同时又指示到达个别的道路。机械论者企图证明机械的运动是运动的一般形态之时，他们造出形式的一般的抽象。那样的抽象，不能表现物质运动，例如，不能表现生命、社会的一切具体形态。

还有自然

辩证法的概念是具体的。因为它在其一切方面的充满矛盾的统一上因而在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上，论理的反映出对象。

中国的主观主义者相反

中国主观主义者的一般是脱离个别的（脱离实际）

理论与实际联系，普遍

伊里奇说：“个别，如排除那引导到一般的关联，是不存在的。一般，只在个别中，并且只通过个别而存在。一切个别，在某种方法上是一般。一切一般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一切一般，只是近似的捉住一切个别的对象。一切个别不完全的进到一般之中，等等。”^[1] [第

[1] 参见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13页）

与个别联系。

530~532页]

中国主观主义者有许多折衷论,他们不能指出矛盾的指导方面(决定方面)。

斯丹林在新经济政策的规定中,把过渡期的各个阶段中,新经济政策的一切个别的现象中所表现的那种一般的本质的矛盾及指导的方面暴露出来了。

中国主观主义者也带着形式主义性质

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之形式主义的性质,在他们的概念论的叙述中,特别显著地表现着。德波林派,一面引用伊里奇的关于辩证法的具体性的言辞,而在其理论的实践上,却往往“完全反对的”行动了。他们在许多的机会,从关于自然与社会的部分科学之发展过程,分离了个个运动形态的部分的规律性之具体的多样性,因而从空虚而无内容的物质一般的抽象概念,由论理的方法引出来^[1]——这件事当作他们的纲领揭示了。德波林派向着理性的观念论、黑格尔主义、概念的自己发展——不是发展着的世界在概念中的反映——这种方向倒退。这种倒退的征候,在他们的几个代表者为着认识具体的社会构造而要求从抽象的社会规律性出发那件事当中,也表现出来。[第533~534页]

与中国何其神似

唯心辩证(黑格尔),唯心形式(德波林及中国德波林派),唯

[1] 在“来”字和批语“与中国何其神似”的“与”字之间,原有一道斜线相连。

物形式（法国启蒙者、陈独秀），唯物辩证，四者之中，只有最后一种是正确的。

中国正是
如此

在形式上构成一般的概念，并把普遍与个别对置这一点，右翼与左翼机会主义者，与他们的方法论者——机械论者与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相一致。……[第534页]

中国主观主
义者正是这样

德波林派暴露了他们自己不能理解普遍与个别之辩证法的统一，也不能在实际上应用它。他们把普遍当作独立的自己发展的本质，与个别对置了。他们不能在革命运动的各个片断中，看出全体运动的根本矛盾之个别的具体的形态。

我们必须能看出

中国正是
如此

不注意具体特点，妄把主观构成的东西当作特点（抽象的特点、没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李立三及其后的主观主义者正是如此。

概念之形式主义的构成及运动的个个形态与阶段之具体的特殊性之蔑视。是反革命的托罗斯基的特征。托罗斯基，把他的“永久革命论”，看作是通用于一切国民的理论，至于那国民所到达的发展阶段及其国内国际的状态之特殊性，是毫不介意的。……

中国的反列宁主义的活动是可惊的。

伊里奇对于外国的党所给予的多数派战术战略上的教训,有系统的这样说着:“共产主义的劳动运动的国际战术之统一性,并不要求排除多样性……只是必要的事情,就是在适用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时,要按照国民的及国民=国家的差异,正确的变化这些原则来使用。各个国家对于统一的国际的任务之解决,对于机会主义与劳动运动中的左翼空论主义之克服,而具体的进行之时,要把国民的特异性,国际的特殊性,实行调查,研究,探求,考察,捕捉。……在这里,存有现在的历史的瞬间之主要任务”^[1]。[第535~536页]

托罗斯基的“永久革命”是形式的抽象,中国正是如此蔑视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主革命转变为国民的及国际的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革命过程,不考虑这个转变之具体的特殊性、个个一定的国家中革命的特殊过程及其种种方面的关联。

不是客观实在性本身的东西

在托罗斯基一方面,辩证法唯物论,被那种臆造的一般公式之观念论所置换,这些公式,在阶级斗争的具体过程上,是从外部引进来的东西。[第537页]

[1] 参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6页)

八 判断与推理

.....

.....

我们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属性问题、军事问题〔认识〕的发展，由于实践的发展。

这样的人类的本质之理解，在那些把个个人类的“本性”与社会诸关系相对立的狭隘的布尔乔亚的思维看来，是不能理解的。马克思对于人类的本质的这样理解，反映了阶级斗争的发展中的新阶段——有组织的普罗列达里亚的成熟。普罗列达里亚，为社会的发展过程所刺戟^[1]，在自己与敌人之间，看出了一定的社会诸关系之担当者及拥护者。

.....

由实践到理论

有史以前的人类，他们——或许在十万年以前——发见了摩擦取火的方法之时，在实践上已经知道摩擦生热的事情。但是在那个时代以前，早已知道摩擦身体的寒冷的部分借以取暖了。但从那个时代起，到发见摩擦一般是热的源泉这件事为止，不知道经过了几千年。但无论怎样，人类的头脑发达到表明摩擦是热的源泉的判断……的时代到来了。以后更经过数千年，在一八四二年……把这个特殊问题（摩擦生热），与以前所发现的其他类似诸关系，关联起来，实行研究

[1] 刺戟，即刺激。

又由实践到
高级的理论
最高级

了,于是形成了“一切机械的运动,得因摩擦之助而变为热”的判断。最后,三年后,迈尔^[1]作出了关于一切运动形态的如下的判断。即“任意的运动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直接或间接的能够而且必须转化为任意的运动形态”^[2]。[第539~541页]

……

恩格斯说:“思维的法则与自然的法则,在它们正确的被认识之时,就不能不互相一致”^[3]。这些法则的认识,究竟正确到什么程度,这是由社会的实践所决定、所试验的。[第544页]

主观主义者不知此理

这种道理,
主观主义者没有
梦想过的。

……“论理的形象,并不是当作自己的他而在具有人类的实践(绝对的观念论)。反之,人类的实践,是几十亿次被反复着,而在人类意识中当着论理的形象被固定的。这些形象因为几十亿次被反复着(只因为这样),具有偏见的永续性、公理的性质”(伊里奇)。所以,永久的思维

[1] 迈尔(1814—1878),德国自然科学家,最先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科学家之一。

[2]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7~568页)

[3]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68页)

法则那东西，是不应有的。……[第545—546页]

非常对的。列宁所说小学生用的着的形式论理，也是对旧社会说的。但中国的主观主义者却用之于政治的指导。

只有在苏联，只有在今日，唯物辩证法，才越发广泛越发深刻的破坏劳动阶级及劳苦农民的广大群众之形式论理的思维方法。这只是因为俄国几百万劳动群众，接受党的指导，参加着生产关系之革命的、计划的及组织的改造。这只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之实践，要求各个参加者理解他所实行的个别的小事业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之辩证法的关联。……

三三制、新的土地政策、劳动政策、文化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锄奸政策与干部政策，都是新的实践中所发现的诸现象间的新的关联形式。

新的实践，在诸现象之间，发现新的关联形式，在大众之中，产生对于一切问题的新态度、新思维方法。唯物辩证法，正被几百万社会主义建设者当作“常识”。[第547~548页]

对我们亦然

九 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

……

布尔乔亚经济学者，在历史上的一系列的产业恐慌中，看到产业循环的衰落期以后有复活的时期，即好景气的时期到来。它从这里、就引出了

延安的形式
主义者亦然

一种“归纳的结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恐慌，必须以新的一般的产业兴旺而告终。它把恐慌作为不可避免的东西，它不深刻的研究决定其种种阶段的资本主义之内在的矛盾。各个新的恐慌，表现资本主义的矛盾中的新阶段，因而有其特殊的性质：例如这次的世界恐慌，是资本主义没落期的恐慌，不是它的新的兴旺，而是孕育着革命的变革——这些是布尔乔亚经济学者所不过问的。经验论的归纳，不进到现象的表面以上，而停止在其外面的标识之分解与一般化。[第554页]

有的放矢在
自然科学

我们的认识，不能离开我们的实践。在实践上，我们不单是把事物分解为它的构成部分，并且综合这些部分，在其中确立新关系，构成新事物。例如我们当着分解矿石为许多构成部分时，不单是分析它，同时又造出具有为从前矿石所无的新属性的新金属。如果这个综合不是分析的前提，没有伴随于这个分析，科学的分析本身，将是不可能的。

伊里奇在普罗列达里亚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伊里奇对于帝国主义的根​​本矛盾之分析，只有根据于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帝国主义展开了的斗争，才做成功了。但普罗列达里亚对于帝国主义的一般的阶级斗争，其任务不是绝灭帝国主义的各个方面及其

有的放矢在
社会科学

指导分析的
是综合

注意

注意

表现，而是要把整个资本主义秩序实行社会主义化。所以伊里奇并不随便的引出帝国主义的个个表现。他在这个分析中，探求了帝国主义的根本的方面——对于普罗列达里亚可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综合之出发点的方面。当着实行帝国主义之理论的分析时，指导了伊里奇的东西，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概念、以及由普罗列达里亚实行的那个革命的变革之必要。[558~559页]

我们的思维如果只限于追求对象的运动与发展的踪迹，规定这个运动中相互作用的诸方面，它是分析的起着作用。但我们的思维是积极的，它规定对象的种种方面，同时在其与物质的全体性的关联上观察那些方面，在思想上，在其发展的必然性上，再生产这个具体的全体性。因而我们的思维是综合的。[第560~561页]

……任何对象的历史，比较种种的偶整，是无限的丰富。按照一切细目追求对象的经验的历史，这就是意味着不立脚于历史过程之指导的根据而在论理上说明它，反而是为混乱的历史过程所支配。……[第561~562页]

一〇 认识中的经验与实验之作用

……

反理论倾向
的错误

然则实验在我们的认识上有怎样的意义? 经验论者指出实验在自然认识的发达上所演的很大的作用, 自称他们所谓研究家的唯一任务单是记述各种现象, 不是发现那内规律性那种主张巧妙的由实验证明着。

爬行经验家
与辩证法家的原
则的区别

“物理学害怕形而上学”^[1]——这是反对理论的认识的经验论的自然科学家的呼声。他们不把实验看作本质与现象的统一, 不努力确立过程之内在的必然性。

实际上, 在科学的事业之实践中, 彻底贯彻经验论的立场的自然科学家, 一个也没有。建筑家在实际建立建筑物以前, 先在头脑中建筑它^[2], ——马克思这句话, 也适用于实验家。实验家并不是像盲目的小狗那样, 从现象

[1]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写道: “一直到现在, 我已将天体现象及海洋运动用重力来说明了, 但重力来源如何, 却没有说过。”他列举重力的某些性质以后继续说: “我还没有方法由此项现象以推及重力之根源, 我亦不想立一假说。凡非由现象中推论得者, 均是假说, 凡是假说, 不问其为玄学的, 物理学的或力学的等等, 均不能入入实验物理学内, 在实验物理学上, 一切定理均由现象推得, 用归纳法推广之。”(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第956页) 黑格尔注意到牛顿的这种看法, 在《小逻辑》中写道: “牛顿……曾经明白地警告物理学, 切勿陷入形而上学的窠臼。”(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第215页)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 也指出要注意牛顿的“‘物理学, 当心形而上学呵!’ 这个警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 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366页)。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202页)

消极与积极
的区别

中国的主观
主义者在脱离
实践的提倡社
会科学理论之
重要性。

中国的教条
主义正有这种
曲解

到现象、从实验到实验的乱碰。他并不偶然的结合他的经验的种种要素。在着手新实验的那种场合，他是由一定的推测——根据于已经实践所暴露的对象的属性及其规律性的东西——所引导。[第564~565页]

当着认识基于实验而发达而丰富之时，理论的思维是必要的。这个意思，当然不是说实验是自己发展的理论之受动的附属品，或是外面的补充物。一面的，唯理论的夸张理论对于实验的意义，这是错误的，是观念论的，正与经验论者奴隶的，盲目的随从而于实验一样。理论的自然科学，尤其理论物理学的进步，在最近五十年之间，在实验的自然科学家与理论家之间，确立分工；把实验的材料构成上的复杂的数学的分析之意义增大了。其结果，在许多学者的观念中，自然科学的理论，就离开了实验的基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为布尔乔亚思想家的一般观念论的性质所固定了，这是不待言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家，就把他的理论，当作对实验独立的东西去观察了。

那样的唯理主义，曲解了科学的历史中理论与实验之实际的关联。唯理论忘记了：理论相互的交替是由实验所决定的；实验结局是由社会的实践之全体发展——由于生产力与阶级斗争的发达，首先是由支配阶级的利害所准备的。……

注意

……法则不是在学者的头脑中完成了的姿态上表现的。它是从根据于“被限定了的数量之事实与观察”^[1]的假设成长起来的。但这种假设,是到达于法则的必然的路程,如果没有假设,就不会有法则即理论。……[第566~567页]

注意: 庞大资料。二十五年。

假设之必要性

……马克思根据于向着阶级斗争的直接的积极的参加,根据于黑格尔哲学之唯物论的改造,根据于英国的经济学及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之批判,造出了这个假设。马克思为这个假设所引导,“采取社会经济的构造之一——商品经济的体系——,根据庞大的资料(他把它研究了二十五年多)很详细的分析了这构造机能及发展的法则”^[2](伊里奇)。伊里奇接着说:“现在,资本论出现以后,唯物史观早已不是假设,变为科学上已被证明的命题了”^[3]。这个科学的命题,由数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所证明了。马克思许多理论的预见,被这资本主义的发展巧妙的实现了。如果马克思关于历史之唯物论的说明的程度(恩格斯),就是等待到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研

[1] 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2]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3]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究终结，而没有提出那个假设，那么，人们将不能从马克思知道那个法则。如没有这个假设，资本主义的研究就会是不可能。

实验是实践的一个要素。在实验上，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被实现；在实验上，思维积极的暴露物质的对象之规律性。但实验也暴露理论的缺陷。理论在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不是完全反映绝对真理的东西。理论的这种缺陷，在实验上，更正确的说，在许多的实验上，被克服了。同时，关于科学的认识之发展的指导方面，是决定科学的思想方向与实验的客观可能性及条件的实践，这是明白的。[第568~569页]

相反，中国主观主义者说，指导方面不是实践，而是理论。

他们是如何的联系，我们是如何的脱离！

在苏联，实验越发失掉其实验室的规模，与“纯粹”科学的性质。实验越发带有半工场的及工场的性质，与工业及农业的实践，直接一致。并且，稀有的高等工业学校——工场，实验——研究工场及国营农场，是近的将来的科学的实验的事业之“中坚”。

我们对于应用于自然科学，关于狭义的自然科学的实验及经验，上面已经说过了。但实验与经验，在社会的发展上，也以特有的形态显现着。巴黎公社是最大的经验。从此，马克思、恩格斯与伊里奇，引出了革命的斗争的教训，充实了普罗列达里亚革命的理论，建立了普罗列达里亚专政的学说。

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

革命的辩证法论者马克思,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看做是有历史的意义的历史的经验,是世界普罗列达里亚革命莫大的前进,是比较几百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践的行动。“分析这种经验,从此引出战术的教训,由于这种经验,再检讨自己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这样的树立了自己的理论。”(伊里奇)[第570~571页]

—— 科学的预见

……

……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如果忘记了马克思在其资本主义的研究上,由关于资本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灭亡与社会主义的思想所引导的那件事,就不能正确的理解并估价。……[第580~581页]

有的放矢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日)

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题词

(1941年4月4日)

好生保育儿童。

毛泽东

为生活而奋斗
毛泽东

毛泽东为第十届儿童节大会的题词。

对山东华中战略部署的意见^[1]

(1941年4月5日)

朱，陈、罗，并告彭、左，陈、刘：

(一) 朱陈罗二十五日电悉。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二) 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三) 蒋介石虽已派李仙洲之侯镜如^[2]第二十一师（不是派何柱国^[3]）进至陇海路北，策应鲁于苏韩^[4]，该部亦正在设法推进（现仍在涡河以南）但困难甚多，既阻于彭部^[5]，复阻于日寇，不易达其目的。庞炳勋^[6]入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军委参谋长叶剑英给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委员朱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刘少奇的电报。

[2] 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二十一师师长。

[3] 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

[4] 鲁于，指驻守山东的国民党军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苏韩，指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

[5] 彭部，指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

[6] 庞炳勋，当时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冀及韩霍^[1]入鲁之企图与此相同（庞及韩霍均仍在原地）。（四）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五）彭雪枫任务是阻止反共军北上，你们应令鲁西南部队努力削弱冯子固^[2]等反共力量，并整训扩大自己，建设比较巩固的根据地。至其他部队西调南调须加慎重，以免顾此失彼。（六）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总部，陇海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毛 朱 王 叶
微亥

[1] 韩，指韩德勤。霍，指霍守义，当时任国民党军鲁苏战区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师长。

[2] 冯子固，当时任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沛县县长。

共产党对国民党八中全会宣言 及蒋介石演词发表意见

(1941年4月5日)

蒋介石氏这次在会上的演词，说到了这样的话：“现在有人批评我们讥笑我们说，本党的工作，不紧张，太懈怠，甚至说我们是腐败了，衰老了，这种种批评，我们都要承认，都要接受。我们观察过去三年八个月以来，尤其是最近半年之间，我们奋斗的精神，确是一天不如一天，从党到政府，从我们中央到党务、政治、军事、经济各种事业，都没有新的精神，缺乏新的生力，我以为这一点，就是绝大的危机，值得我们惊心动魄。”蒋介石氏这些话，说明了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即中国共产党及海内外同胞历来对于国民党当局的各种批评意见，完全是对的。然而，应该承认：谁如说出关于这一切问题的真话，历来都是被认为有罪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个真理，并不为现在国民党统治当局所了解。一直到现在，人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差不多已被剥夺净尽，并且还有变本加厉之势。但是，国民党统治当局所打的算盘及其种种做法都错了，人民的愤懑是随着大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巧取豪夺，一天一天地在增加起来，而袭击新四军的罪行所引起的分裂危机，更加深着人民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满，这就使得蒋氏此次不能不道出自己统治危机的真相来。蒋氏要国民党人自己反省，但是并

不想解除这个危机的真正症结。这症结为何？一句话，就是：没有民主。国民党统治与民众利益背道而驰的事实一日存在，则危机亦将一日存在，而欲使国民党与民众接近，除民主外，更无别路，蒋氏演词对民主政治一字未提，所谓“与民众打成一片”，只是一句空话，或者是要在民众中加强统治的特务工作而已。至于全会宣言则更明白宣告宪政施行推到“战事结束之日”，两年来全国人民和各党派所呼吁的宪政，企图以此加强全国团结抗战的，又已被弃置一边了。其次我国以被压迫民族起而抵抗强敌，舍普遍武装民众，就不能争得最后之胜利，现在国民党当局借口所谓“军令军纪”，以求消灭真正民众之武装，把军令军纪当作排除异己的工具，如袭击和取消新四军之行为，对于抗战实为犯罪，全会宣言对此未加纠正，反而将这种阴谋消灭抗战部队的无原则的所谓“军令军纪”加以强调，不能不谓为认识之错误。全会宣言关于“经济建设”方面，一方面否认改善人民生活，对此加以所谓“煽动阶级之斗争”之罪名，另一方面又继续一小部分大资产阶级分子巧取豪夺弊病丛生的所谓经济统治，否认经济的自由发展，以打击民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及广大小资产阶级，此种错误的经济政策如不改变，则今日所发展着的经济危机即无法克服，那是很明显的。然而，要改变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是只有在民主政治下才有可能。总之，我们是希望国民党向好的，因为国民党向好是民族抗战的福利，但如国民党统治人物对于自己的错误，对于国民党衰老腐败的真正症结，不从根本上加以检讨，而只为枝节是求，那是决然没有结果的。国民党要真正有所改进，惟有接受共产党所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并认真实行之，没有根本政策的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8日)

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9日)

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9日)

蒋有加强北面兵力攻取盐池并南攻绥德可能，你们应准备抽调有力部队准备于必要时西渡增援，暂在原地待命。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0日)

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李文部分驻宜川、洛川、宜君、耀县的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等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0日)

蒋介石似有袭击延安的企图，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1] 这是毛泽东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1]

(1941年4月11日)

据息，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十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2日)

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庶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贺龙、关向应等电^[1]

(1941年4月13日)

如果蒋介石冒险打延安，我们现时还只能决定内线作战，不是打出去，一二〇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

蒋介石是否决心打延安主要决定于蒋对苏联态度，日苏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但我现应放在蒋决心打延安一点上来布置。

[1] 这是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电的主要内容。

致周恩来电^[1]

(1941年4月14日)

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1] 这是毛泽东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周恩来电的主要内容。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

(1941年4月16日)

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

[1] 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苏日中立条约时讲话的一部分。

《毛泽东全集》52卷

本书经由主编张迪杰先生独家授权香港中文版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 名：《毛泽东全集》第15卷
主 编：张迪杰
责任部门：《毛泽东全集》编辑委员会
编委主任：流 星
策 划：树 旺
出 版：润东出版社
承 印：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经 销：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 话：(852) 23500066
电 邮：1236688@enricheast.com
网 址：www.enricheast.com
地 址：香港九龙湾宏光道7号兴力工业中心5楼09室
顾 问：润东出版社有限公司印制顾问组
组 长：言 臣
装 帧：平 装
开 本：170mm × 240mm 特16开
页 面：552面
版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版
印 次：2013年10月1日 第一次印刷
 2013年11月1日 第二次印刷
印 数：500套
全集字数：2015万字
I S B N：978-988-12907-0-0
定 价：52卷 港币\$26,800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出版社联络更换

